大家小絮

风骨清华人

思念父母恩，感怀清华魂，追忆大师铭。

梅贻琦 蒋南翔 华罗庚 钱学森 钱伟长 钱三强 张维 陆士嘉 ……

春日飛絮的清華映景
孿子星座的動人故事
大師先輩的禮贊頌歌
峥嵘歲月的歷史見證

张克澄◎著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大家小絮

作者:张克澄

ISBN:978752170440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讀克澄著《大家小絮》

春日飛絮的清華映景
雙子星座的動人故事
大師先輩的禮贊頌歌
崢嶸歲月的歷史見證

余壽文 戊戌春日於清華



余寿文为《大家小絮》创作的书法作品



张维与陆士嘉在去欧洲的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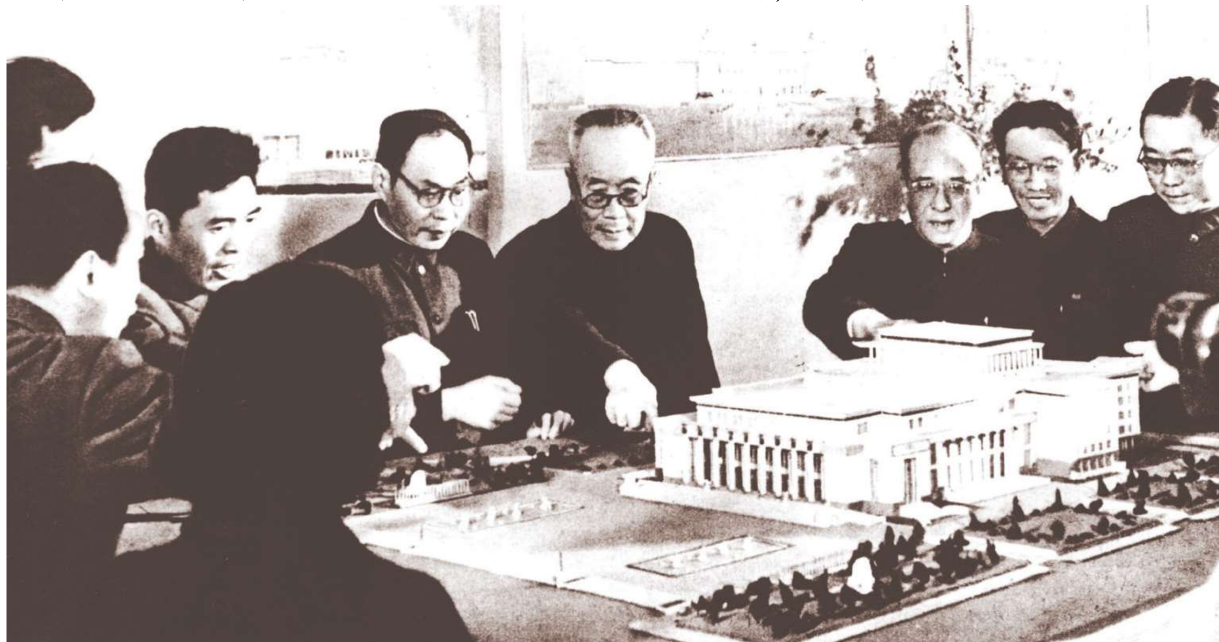


张维与陆士嘉在南京中山陵音乐台合影（1937年）



全家福

前排右起：陆士嘉、高晓松、张维、高晓江、张克群，后排右起：高立人、张克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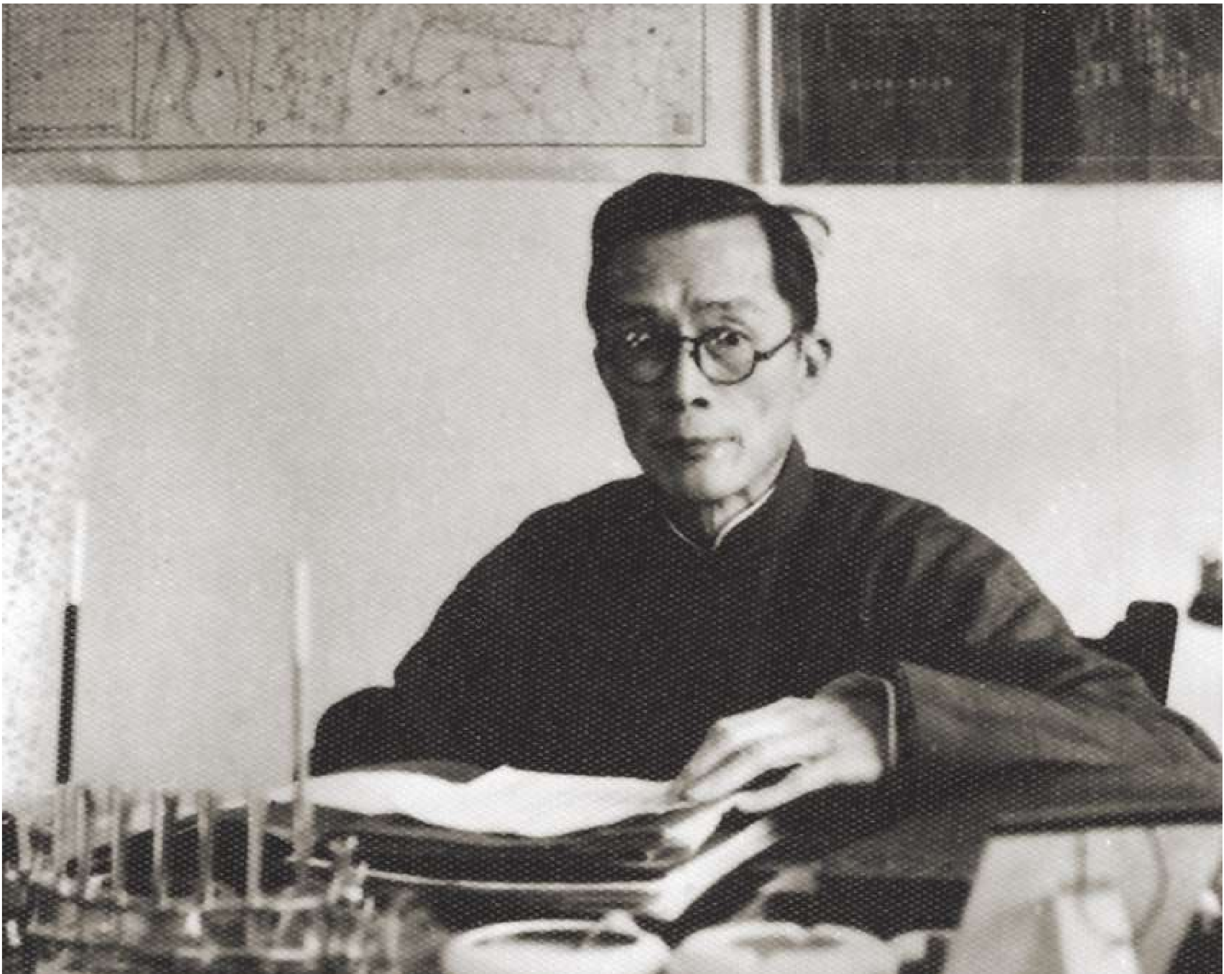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的部分领导人，右一为张维



青年时期的华罗庚



中年时期的梁思成



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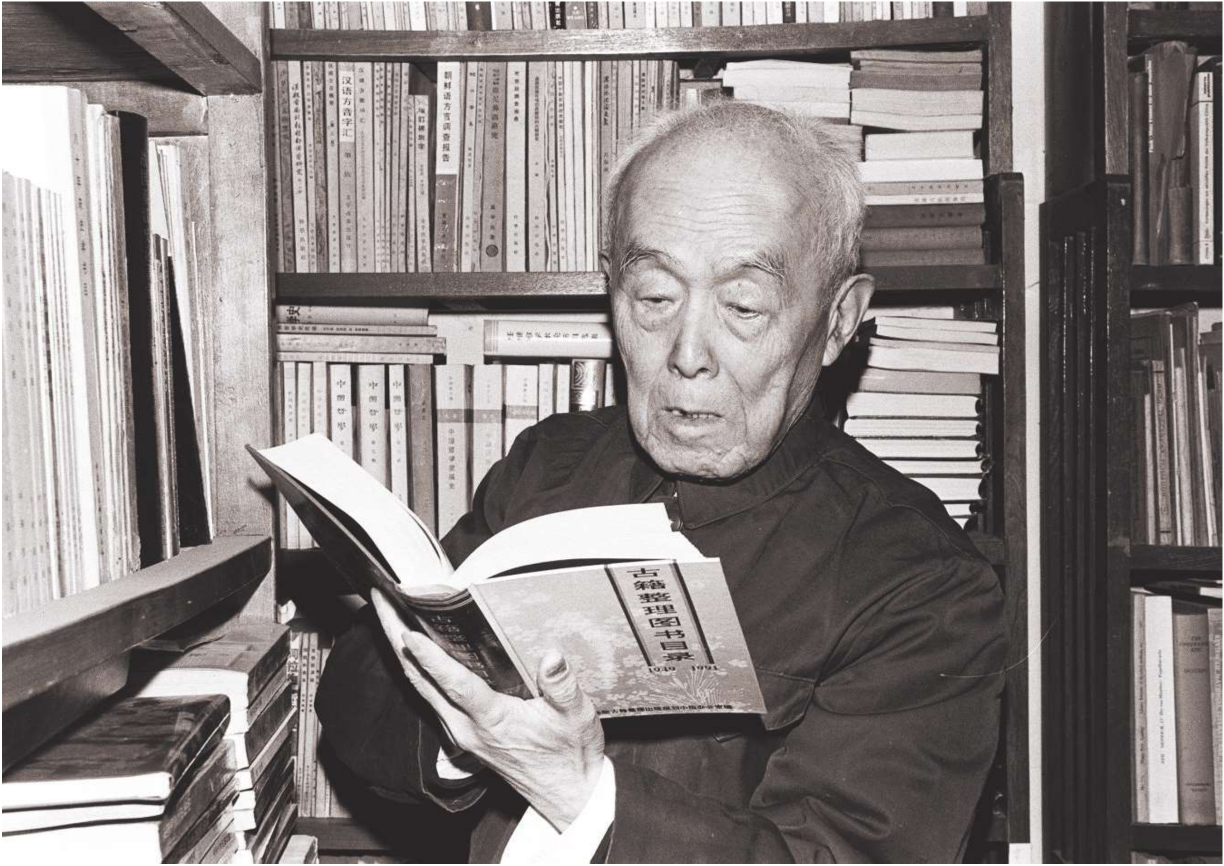
陈陈（右）和刘西拉（左）在家中练琴



袁传宽（右）和樊矾（左）



吴良镛在指导学生



一生热爱读书的季羡林



周培源



张克群（右）与张克澄（左）（1951年）



张克澄（右）与孙立哲（左）

推荐语

克澄的书，从一位清华教授子弟的视角，讨论了清华园的文化传承，从侧面展示了“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清华精神。

——方惠坚（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张维学生）

张维先生、陆士嘉先生德才双馨，是20世纪中国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不忘初心的后辈将永远怀念他们。

——叶宏开（清华大学原纪委书记，张维学生）

接到此书，当日读至夜深，学习双子星座大师风范！从数段小絮中演映出大千世界，从大师礼赞中看到了峥嵘岁月。

——余寿文（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教授）

这是一段深刻的回忆，也是一本珍贵的史料。

——潘际銮（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小故事见大精神。这精神，是清华精神——爱国奉献，追求卓越。读完，才知道张克澄如此有才气。

——林泰（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久违的感动！从晚9点到凌晨3点，一个人“趴”在客厅的沙发上，只为读一本书：《大家小絮》！感恩克澄兄给予的感动，字里行间，无数大师在张维、陆士嘉的陪伴下，款款地走来了。为清华人文精神的传承发展鼓与呼！书中，道不尽的是“大家小絮”、家国情怀！

——徐林旗（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首席课程研究员）

接到克澄发小的书真的挺惊讶，年过七旬的他长年奔波于美国和中国两地，竟能笔耕不辍。看到书名，便猜到他叙记的是清华里的往事，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的人来说，挺吸睛的。书中的许多事把我又带回早年那些美好的回忆中……我们的父辈为了中国的崛起汇聚在清华园，那时的校长所称的“一百零八将”，便是指这批报效祖国的精英。写出来篇篇都是戏。

——戴慧远（张克澄幼儿园、小学同学，其父戴志昂，其叔祖父戴季陶）

推荐序

这是围绕清华园写的一本书。它描写了清华园里大师的高风亮节，以及“力学双子星”（作者父母）的音容笑貌。它感情真挚，细节生动。例如：

母亲留学闯关故事——使世界大师转变了态度。

父亲惜才爱才心情——热心举荐一批青年才俊。

钱三强、赵九章、华罗庚三贤围桌猜谜——华出上联，三强韩赵魏；又巧对下联，九章勾股弦。

林同炎先生的“浦东情”——提出浦东开发的第一人。

蒋南翔校长的“三阶段、两点论”——精辟概括。

钟士模先生的家教秘籍——“做题，首先要读懂题。”“多问，要问到老师都答不上来。”

从这些小絮里，可以领略清华大师的大智慧，可以聆听历史深处的回声。

我是清华园的常客（1948年从清华毕业后，当了70多年的“园丁”），又是陆、张两位恩师的爱徒（1948年师从陆先生，1956年师从张先生）。

我今年93岁了，戴着老花镜，细读“小絮”书。

我的印象是——三个“有意”：初读，有意思；品读，有意义；回味，有意境！

末了，还想另加一个“有意”：有意将此文聊充小序，可乎？

龙驭球

（中国工程院院士，土木工程和结构力学专家，《工程力学》主编）

前言

从2008年开始，回国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了。其间，经常拜访清华校友会，与校友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清华的历史及历史人物。

聊得多了，校友会发行的杂志《水木清华》主编王正就建议我把聊天内容写成文字发表。

我诚惶诚恐：市井闲聊，怎敢登高等学府的大雅之堂？

在经历清华百年纪念活动的风风雨雨，创作电视剧《水木清华》前后的点点滴滴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

从小生活在清华园，走东家串西家，见识了20世纪5080年代清华风物，认识了不少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星星点点的故事催人奋进，偶尔拿出来和身边朋友分享，都爱听。何不扩大范围，介绍给关心清华的人们呢？清华传统、清华精神，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在研究探讨，我也加入进来——抛砖引玉，希望引起读者对此一段历史的关心。这一系列小文章，就拟名为“大家小絮”，讲讲清华大家的小花絮。

朋友鼓励我，把自己在清华园的所见所闻，白纸黑字地写出来。这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录。从我特殊的视角描述出来，会是读者喜闻乐见的。

问之王正，前约还有效否？答曰“随时欢迎”。

于是有了三年之约。

每期一篇，共30余篇。

当时绝没想到，有一天还要将它们结集出版。

其中几篇，曾求教于漆丹老师。当年偶有交稿日近，却脑力枯竭，只得求教于快手漆老师，我只是在最后阶段做了些整理，使之符合我的风格罢了。漆老师亦非等闲之人，如今好评如潮的校园话剧《马兰花开》，是她带病一天一幕，在八天之内赶写出来的。借此机会，感谢漆丹老师相助之功！

是为前言，乞读者纳之，为感。

第一辑

忆念

父母像一本书，不到一定的年纪读不懂；当能读懂时，他们已远在天国。如有来生，我还愿做张维、陆士嘉的儿子。

说说母亲

“干妈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人！在她的人生字典中，没有自私，只有忘我。可惜，这样的人现在少见了。”

晶晶姐是母亲1946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收的干女儿，她的父亲孙德和[注]与父亲同为留德生、同在同济谋事。母亲和孙德和夫人很投缘，又因晶晶姐清秀乖巧，遂收她为干女儿。

晶晶姐把母亲在她作为访问学者再次赴德国时给她的信，翻箱倒柜找了出来。她把信递给我时，说了这番话。

短短几句话，引发我对母亲的回忆和长长的、无尽的思念。

母亲脾气极好，对人永远客客气气，说话轻声细语，在我的印象中她几乎没有发脾气的时候；即使要求我们或保姆帮她倒杯茶水也是如此，从提要求到欠身接过杯子一连串几个“请”“谢谢”。小时我想，犯得着对保姆和子女这么客气吗，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吗？母亲知道我的想法，总说：“要谢，只要帮助过你的人就应该谢，无分长幼尊卑。”

但是母亲的思想有点“左”，在荣誉和利益面前，总是一味地谦让，姿态放得极低。家里人针对这个特点，叫她“陆常左”，她听了笑笑，并不生气，却照样我行我素。

母亲的这种老派知识分子的印象烙在我心中，我觉得她活得就是她自己，非常自然。最近几年，因为写父亲的传记，大量接触熟悉他们的人，无意中获悉了母亲的一些事，原来她还有这样一面……

父亲的得意弟子黄克智的夫人陈佩英与母亲来往密切，陈阿姨和我们讲了下面这件事。某天她来找母亲，老保姆杨奶奶告诉她，母亲出去了，很快就会回来，请稍坐会儿，她听了杨奶奶的话，一边和杨奶奶聊天一边等候母亲。杨奶奶盛赞父母的为人，说张同志和陆同志这样的人是她这一辈子遇见的最好的人，每次发了奖金或拿了稿费总要按比例分一部分给她。这件事给陈阿姨很大震撼，她说对保姆好她能做到，但从自己的奖金和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来奖励保姆她想都想不到。末了，陈阿姨感慨地说："我这辈子最敬佩的人就是张先生、陆先生了，尤其是陆先生，作为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步，心胸真的很宽广，不简单。"

这件事，我这个儿子却不知。

……

二哥（堂兄）张克淳在讲家族历史时也提到了母亲早年的事。

在天津居住时，在每次随众人进祖母房间请安后，母亲总是低声问起他的功课来，这样他们聊着聊着就顺势走出祖母的房间。二哥的意思是，母亲在祖母面前不自在，借着说功课避开了。

唉，婆媳关系历来是中国人最敏感的一个社会话题，作为儿媳，母亲也概莫能外。

祖母是个非常有魄力的人，出身于挂过"千顷牌"(注)的河北籍氏，见过大世面。因为祖父早逝，祖母独自将4个年幼的孩子拉扯大，并相继把他们培养成大学生，甚至把父亲送往国外留学。在当时的社会，鲜有这般有能力和魄力的女人，祖母也因此在家族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由于多年操劳加上战乱惊吓，祖母在父亲留学期间瘫痪在床，大伯远在抗战后方，饮食起居全由大妈和两个姑姑照顾。父母回国后，因双双拿到德国名校的博士学位，被北洋大学(注)同时聘为教授，是该校历史上第一对教授夫妇。母亲是北洋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极

受师生瞩目。据母亲当时的学生回忆：“相比那些老夫子而言，陆先生的出现就像一阵清风吹拂着那些学生懵懂的心，她青春靓丽、亲切和蔼又有学问，像家中的姑姑、姨妈一样让人亲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不同以往的窗户……”

然而，学校归学校，家庭归家庭，祖母才不管你喝了多少洋墨水、拜了什么洋庙，只要是我家儿媳妇就要尽儿媳妇的职责。母亲毫不例外地和大妈、姑姑轮流值班，为祖母梳头、洗脚、洗澡、剪指甲等，这对于母亲来说不啻学术难题。面对此题，她没有抱怨，放下身段，尽职尽责，虽然有些笨手笨脚，倒也低眉顺眼。祖母尽管有些不满意，也未苛求。

周围不少人等着看笑话，洋博士伺候旧式婆婆，会是一种怎样的结局？然而笑话终未出现，母亲始终和家人保持和睦关系。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母亲随父亲一同应聘到清华大学为止。听说这些后我猜想，父母离开北洋来清华是不是有摆脱祖母的因素在内呢？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北洋大学母亲是教授身份，而当时的清华却规定：夫妇不能同时在校任教。因此在父亲被聘为机械系教授后，母亲就不能再被航空系聘为教授了。当时的工学院代理院长陶葆楷和机械系教授钱伟长非常清楚母亲的实力，他们想尽办法把母亲招揽过来，最后将其安顿在清华大学和资源委员会合作的水工实验室做研究员，母亲同时在航空系和土木系兼课。我和陶葆楷的儿子一般大小，小时候常去他家串门。每次陶伯伯看见我都要重复：“你父母厉害，德国回来的博士！”看来父母在学问方面确实让大家服气。

虽说同样是教书，但研究员和兼职教授与当时的教授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可以说，母亲从北洋来到清华是委屈了。共产党来了，解放了，立即破除了这条规定，母亲因此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扬眉吐气地走上了航空系讲台，此乃后话。

二哥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在我成年成家后，母亲有一次无意中说起祖母很封建。当时的我刚满月，父亲早起给母亲做好早餐，二人吃完一同去上班。这事不知怎么让祖母知道了，大怒，认为媳妇应该伺候男人，哪能让男人下厨给媳妇做饭？当然，祖母还是给了面子，没有为难母亲，而是把父亲叫进房间训斥了一番。一贯听话的父亲虽当面没有反驳祖母，但背地里却不以为然，该伺候媳妇还伺候媳妇，只是更加小心，不再让祖母知道罢了。

二哥说祖母旧式规矩甚多，训练得两个姑姑也是如此，后来又因为常年卧床不起，脾气变得越发无常。家中长幼在祖母面前顾忌很多，每天早晨请安后，照例就是请示日常琐事的处理。母亲无意纠缠于此，以关心侄儿功课为由，借此回避了这道程序。祖母因为一贯重视教育，对二儿媳这种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难为了我那老实的大妈，出身于挂过“千顷牌”的河北贺家，却一直跟在身边伺候瘫痪在床的婆婆整整18年。

来到清华园后的母亲心情舒畅。

据钟士模的二儿子钟道隆回忆：“张伯母笑声爽朗，人未到笑先闻。”我听完后很纳闷，因为自我懂事以来从未见母亲开怀笑过，道隆兄的描述和我的印象对不上。

最近求证晶晶姐，她也说：“干妈满面春光，永远都是笑盈盈地，我那时特爱和干妈在一起。”

我猜想，自“三反”“五反”开始，直到“文革”，父母对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经历了兴奋、积极、迷茫、不解、消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或许母亲自此丢失了她爽朗的笑声？“文革”后，母亲倒是常笑，但那是饱经沧桑后沉稳的笑了。

……

有个说法不知是什么时候传出来的，而且愈演愈烈——母亲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就连父亲在家有时也这样说：“你妈比我厉害，在

德国学术界她的地位很高，我跟着她沾光。”

盖因母亲师从世界流体力学鼻祖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是普朗特唯一的女博士生，也是其唯一的亚裔学生、关门弟子，她的师兄中有赫赫有名的冯·卡门、铁木辛柯等。如此说来，母亲在力学界学术地位确实很高。当她来到清华时，清华园里的一些大教授如周培源、钱伟长以及后来回国的钱学森、郭永怀、杜庆华等不是冯·卡门的学生就是铁木辛柯的学生，从学术辈分上来说，母亲是他们嫡亲的师姑。

我记得小时候只要遇见张光斗，他总是摸着我的脑袋说，你应该姓陆，叫陆克澄！

周培源的四女周茹苹回忆：小时候，对于父亲和母亲王蒂澂称呼“陆先生”很不理解。她父母对其他的朋友，都是直呼其名，像张奚若夫妇年长二人很多，但都以奚若、杨大姐相称；金岳霖——老金，陈岱孙——岱孙，吴有训——正之，梁思成夫妇自然以思成、徽因相称……称呼我父亲也是张维，但从来都客气称呼我母亲为陆先生……

按理说周老是父亲张维的老师辈，他在尊称母亲为陆先生的同时，偶尔也称父亲为张先生，父亲说是沾了母亲的光，也确实如此。

……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问我：“张伯母怎么那么厉害？我从小到大只见过她一个人敢对我父亲那样说话。没有第二人！”

嗯？

他说，有一次陪父亲钱学森来我家串门，在聊天的过程中母亲向钱推荐了一个人。母亲说了好一段那人的优点，钱学森听着，眯眯笑，不作声。母亲独自滔滔不绝，见钱没反应，很不高兴，站起来，几步走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说：“钱学森，人家都说你骄傲，我原来还不信，现在看来你真的是骄傲！”永刚被这前所未见的场面惊

呆了，却只见钱学森不急不恼，笑眯眯地轻声说：“那个人是不错，但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回家路上，永刚不解地问他父亲：“张伯母跟你急成那样，怎么不见你生气？”“老相识了，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气？我才不生气呢。”

母亲这么厉害？我没有在场不清楚，但我知道母亲在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中是有相当的威信的。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在安徽成立，我有幸成为建所元老，从去车站接人到安置桌椅板凳全都干，也常随物理奇才陈春先到北京出差。

有一天，领导派我随物理所的卡车去北京站办理图书资料托运手续。

车队调度告诉我，卡车上已经有其他随行人员了，为了赶时间，你先搭所里的小车到北京站吧，办完事后坐公交车回来。我毫无异议。

出得研究所大门，小车司机叮嘱我：这车是接马所长去北京饭店赴宴的，马所长一贯不喜欢人家搭他的车，万一怪罪下来，你别吭声，我来跟他讲。

果不其然，马大猷见车里有人，扭头就往家走。司机急忙追去，好说歹说，保证我不跟车回来，他才出来。他侧身进车时瞪了我一眼，气呼呼地坐进前座，一路上没再张口。

手续复杂，一切办妥已过了晚八点，天上飘起了雪花。我辗转换了好几趟车，回到家已是十点半。

母亲熬了姜糖水在等，说是已热了好几次，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大概说了一番，母亲说了声“这个小马”，嘱我赶快盖好被子发发汗，免得感冒，便上楼了。此日为星期四。

星期日上午九点，有客敲门。我应门时惊见此人乃马大猷！他见我也是一愣。母亲一边下楼，一边笑着说："眼熟吧？这是我儿子，是你们所的员工，前几天被你赶走的那个！他是去给公家办事，搭你的车，你摆什么谱呀，下那么大的雪，差点冻病了他！"

简单的几句话说得马大猷大惊失色，赶紧解释说真不知道，真对不起，等等。母亲也没再穷追不舍，问他："东西带来了？"

马大猷忙不迭地掏出一副耳塞。原来，父亲睡觉打呼太甚，母亲偶有抱怨。马大猷是研究噪声的，工作中常用到耳塞，听闻此事，连忙推荐德国耳塞隔音效果不错，并亲自送到家里来。

周一上班，马大猷到办公室找到我，进门就埋怨："你这个孩子，到物理所工作也不上我这儿报个到，害得我在陆大姐面前出这么大的洋相！"

……

母亲跟生人不苟言笑，于熟人却是很诙谐的。

有一次我随父母散步，碰见黄万里。母亲叫住他："黄万里，听说你因身体不适在跟着我吃一样的药？"黄伯伯不好意思地说是。母亲笑了："真跟我吃一样的药？我是女的呀！"

看着黄伯伯顿悟的表情，我一直憋着不敢笑。

还有一次季羡林来我家，送了父母一本他写的书，好像是关于梵文的。母亲翻看着，跟他开起了玩笑："季羡林，这梵文你到底学得怎么样？你可号称是中国懂梵文第一人啊，你说它是一，大家就跟着说是一，你说它是二，没人敢说是三，你可不能误人子弟呀！"

季羡林乐呵呵地表示，谨记、谨记！

母亲像一本书，没有到一定年纪读不懂。当我开始读懂她时，母亲却已经远在天国了。

深深地想念母亲！

1. 孙德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黑色冶金设计院总工程师，新中国冶金事业奠基人之一，父母留德时的老大哥。长女孙静远（小名晶晶）1936年出生于柏林，后被父母收为干女儿，北京科技大学退休教授。
2. 千顷牌，封建时期为奖励巨富、地过千顷者，官府赐牌，以示褒荣。——编者注
3. 北洋大学，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1951年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编者注

说说父亲

在父亲百年诞辰前，家人商讨来宾名单，吴良镛是其中之一。唯虑吴先生已届90高龄，又刚刚中过一次风，恐不惊动为好。见我划掉吴，妻子发表不同意见，毕竟是多年的同事、邻居，关系非同一般。她建议我试试，不可失了礼数。碰巧的是，转天我们就碰到吴家二公子吴晨。一听此意，吴晨满口答应回家请示老父，征求他的意见。

断没想到，当晚获吴晨来电，告知其父定会参加，并且转述原话："我这一辈子最敬重两位先生，一位是梁（思成）先生，一位是张（维）先生；张先生的事我一定出席，放心，不用来接，我自己到场。"

我和妻子呆了，此话怎讲？

梁先生是吴先生最敬重的人好理解，毕竟是业师；父亲和吴良镛既不是一个专业，也没有共同的课题，咋就成了两者之一呢？

纪念会当天，吴良镛在秘书的陪同下提前到达会场，且积极发言。当日活动程序紧凑，杂事缠身，我们没有机会请吴先生当面答疑解惑。一晃三年，直到2016年，因为写父亲的传记，我需要采访相关人员，方有机会再次接触吴先生。

在心头埋藏三年之久的问题终于问出。吴先生微微一笑，他从新中国成立前夕两人相识开始，说了四段记忆。

第一段是共事。1952年三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建设委员会成立，吴是副总规划师，父亲是负责清华工程的主任。吴对父亲的认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人能干，有本事，肯吃苦。清华工程在父亲的主持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第二段是在“文革”后期。当时父亲被并入清华校革委会任副主任，彼时虽然教学已停止，但有些不甘虚度的人还在默默钻研，吴乃其中之一。每有外宾来校参观，父亲必是主要陪同者，这时他总会带外宾去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展示一些精彩的篇章。一次，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教授带队来清华，此人为国际知名建筑师，父亲便将他们带到建筑系请吴良镛讲中国城市规划。那次讲解，图文并茂，内容全是吴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该教授一行深受震撼，自此，吴良镛进入了该教授的视线。回美后，该教授不仅向清华伸出了橄榄枝，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也将橄榄枝伸向吴良镛，邀请他去美国访问，同时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吴先生。可惜，当时尚处在“文革”期间，出国访问一事不了了之。

“文革”结束，父亲重任副校长，仍然主管教学科研和外事工作。1979年，他争取到了几个留德名额，吴良镛被推荐为首批访问学者之一赴德交流，为期一年。转眼一年过去，吴在德国留下良好的口碑，德方希望再续一年，但吴先生决定履行约定按时回国。就在打点行装时，他突然接到使馆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他被选为学部委员（院士）。

吴先生一脸懵懂地回国后，立即找到我父亲，果然，推荐人是父亲。

第三段是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父亲乃6个发起人之一，具有推荐权，便推荐了吴良镛，可首届工程院院士名单中没有吴良镛。转年，在讨论院士名单之际，父亲再一次在会上郑重推荐吴良镛，他的发言掷地有声：如果工程院不接受吴良镛为院士，那将是工程院的损失！这一年吴良镛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当时清华园里三位两院院士之一。

吴先生谈到这里，顿了一会儿，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一位当时在场的朋友很久以后告诉他的，并说当时张维先生很认真，说完这话后就离开了会场，留下大家讨论。

第四段记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吴先生搬到10公寓12号房，和我们家14号做邻居。这下两人的来往就更密切了。有一天，吴先生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写了一个大纲（共有十章），准备出书。他给父亲看，希望父亲提点建议。没想到的是，才过了几天，父亲便找到他，极为高兴地说这本书太有意义了，有新意又有自己的观点，建议他将每一章都写成一本书，越详细越好。吴先生听了以后很高兴，真的将第一章写成了一本书，在业界引起轰动。第二章内容也被出版成书，反应很热烈。可惜，后来太忙了，他至今没能将十章写成十本书。吴先生谦虚地说，愧对张先生对他的期望。

……

父亲常告诫我们：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父母常交换对张三李四的看法。我们小时，他们这种交谈用德语；等我们成年了，就用中文，也不避讳我们了。但我不记得他们在外面议论别人，尤其是父亲。

父亲自己不传话，也不喜欢听别人传话；遇到话不投机，父亲会很有技巧地转换话题；如果我们在场，那么事后他会复盘，分析一下并告诉我们这人哪里说得不得体，为什么不得体。

父亲朋友众多，自然有远近亲疏，他却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让人人都感到如沐春风。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我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像父亲那样，纵横捭阖、面面俱到，却常感觉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父亲在时，没能及时请教一二，终成憾事。

父母均从小就失去父亲，也因此从小尝遍人间冷暖。他们对于处于困境的人，常常感同身受，愿意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出手帮助他们脱困。

“文革”中某日，父亲去王府井外文书店找书，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与一疑似熟人擦肩而过。父亲转身跟了几步观察，确认那人是汪

道涵后，父亲从后轻拉衣袖，将他引入旁边小巷中，低声问何以如此落魄。汪告知因自己被定有叛徒嫌疑，停发了工资，目前靠每月20元艰难度日，才落得这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境地。在问明他目前居处后，父亲与汪分手。几日后，曾担任父亲在清华的助教的黄仕琦（曾任板门店中国代表团英文翻译，后在教育部工作）敲开汪的门，与他用英语聊了起来。不久后，父亲安排汪道涵去机械出版社当了外文翻译（父亲是《机械工程手册》副主编），每月可赚150元，生活可小有改善。

我和妻子曾就此事向黄仕琦求证。他告诉我们，当时父亲虽有心施以援手，却又担心汪道涵的英文多年不用捡不起来，特地交代他前去考察，得知汪的英文没问题后，才出面推荐的。

“文革”后，父亲有一次在上海出差，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打了个电话，汪立即安排在锦江饭店与父亲饭聊。这顿饭吃得父亲后悔不迭。饭间，汪的兴致很高，谈古论今，可汪的秘书进来好几回，不是有要件要他签字，就是有要事要他接听电话。父亲觉得自己闲人一个，以私犯公，十分不应该，早早就应感谢告辞。自此之后，再去上海，他再也没有联络过汪。

基于此次经历，在父亲80诞辰纪念会时，他坚持不让请在职的领导出席。我建议有几位关系跟他走得比较近、一直来往的，还是试试通知一下，来不来由他们定。父亲近于生气了，说不要为难他们，通知人家不就等于表示希望他们来吗？怎么能让他们为我浪费时间？副部长以上的，一个都不要请，他们有正事要忙，等我90岁、100岁时，他们也退下来了，再请吧。

……

1977年高考恢复，插队的清华子弟纷纷抓住这失而复得的机会报考。

某天，我在清华西南门碰到陈小悦，想当然地问他是否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了。他沮丧地告诉我他被录取到陕西师大了。

怎么可能？小悦从来都是我辈中的佼佼者，是永远拿第一的标兵，怎么可能考不上清华？

我请小悦到近在咫尺的家中细说。

父亲正好要出门，见了小悦，顺口问道：你报的哪个专业呀？

听说是被陕西师大录取了，父亲停下脚步，拉开的纱门又被关上。他坐到沙发上仔细问小悦，几个志愿都报的哪几所大学，什么专业。得知全报的清华，父亲立即叮嘱他：你不要去陕西师大报到，就待在家里等我的消息。

父亲立即去清华招生办公室，要他们查陕西考生陈小悦的录取情况。在确认没有陈小悦的材料后，他将此事通报了校长刘达，说明小悦是“文革”前清华附中预科的特优生，此次报考清华，被陕西省截留，并表示准备上报教育部，与陕西省交涉要人。刘达听后也认为此风不可长，支持父亲的做法。父亲遂亲带清华招生办公室的人去教育部交涉，派人拿上教育部的公函去陕西省要人。

几经交涉折冲，等陈小悦踏进清华课堂，已开学一个多月矣。

……

对子女的教育，父母似乎有分工：母亲负责人格培养，父亲则管智力开发和纪律养成。

姐姐和我，算是伶牙俐齿，这要归功于父亲的调教。

父亲认为学好中文和外语的先决条件是舌头，因此把舌头练溜了十分重要。他教我们的那些顺口溜，我至今没有忘记。

天上一只鹅，地上一只鹅，鹅飞鹅跑鹅碰鹅。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喇嘛端汤上塔，汤洒汤烫塔。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妞妞牵牛，牛拧，妞妞拧牛。

板凳宽，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

山前有个崔粗腿，山后有个粗腿崔，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崔粗腿的腿粗还是粗腿崔的腿粗。

山前有个袁圆眼，山后有个圆眼袁，二人山前来比眼，也不知是袁圆眼的眼圆还是圆眼袁的眼圆。

墩墩葫芦，压压葫芦，好汉数不了二十四个葫芦（深吸一口气）：一葫芦二葫芦三葫芦四葫芦五葫芦六葫芦七葫芦八葫芦。

…………

姐姐受的训练比我多，又传给了她的儿子，结果她的儿子高晓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加伶牙俐齿。

……

父母留学德国，受到严格的纪律训练，对规则极为重视。

就说排队吧，他们认为凡事要按先来后到才公平，无关年老年幼、官大官小、男人女人。

20世纪90年代，父亲看牙总找一位前门外的马大夫。马大夫手法好、收费合理，病人要起大早、排大队才能挂上号。他对父亲挺尊重，父亲可以随到随看不用排队，可父亲不愿接受这份情，坚持排队挂号。

有一次我回国，赶上牙疼，父亲就叫我和他一起去看马大夫。

我们早上6点出门，7点前赶到前门外拿了号，然后便到大街上去吃豆浆油条。

排得好好的，快轮到我们时（前面还有三个人），来了个小伙子插队，直接上前就买。父亲不干了，上去理论：

> 小伙子，你怎么插队呀？
>
> 插队？我从来就没排过队！
>
> 我这把年纪都老老实实排队，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不能排排队？
>
> 我就不排队，你个老不死的，管得着吗？
>
> 我就要管，你不排队，就不行！

眼看就要动手，我赶紧上去把父亲和小伙子隔开，开口劝小伙子排队。见父亲有人跟着，小伙子没再吭声，转到后面去了。

事后，父亲对我没及时制止乱插队很是不满。我跟他分析：跟这种人没道理可讲，万一动起手来进了派出所，再被得知是一个八十好几的两院院士跟一个二十上下的小流氓打起架来，还不立刻成了晚报的头条？父亲一想是这么个道理，也就没再说什么。但在我心中，这件小事使我深受教育，对父亲的敬意又增加几分。

我生性顽劣，小时候招猫逗狗常惹祸，也因此没少挨父亲打。

父亲是学力学的，知道怎么借力打力，他从不用手打我，大多是借助笤帚，倒着用，虽比不上新加坡鞭刑会留下终身阴影，但也够我喝一壶的。而且，父亲都是按家中规矩打我，要我自己上楼，脱好裤子趴到床上。他只负责锁好门，免得母亲干预，然后问：犯了禁令第几条，该不该打，按律该打几下。如果说得对，便立即执行，但一般都手下留情，减量伺候。

大概8岁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连得了几个2分，应对责问又不得体，把父亲激怒了。任母亲怎么拍门，父亲也不停手，这次我着实离新加坡近了些，屁股被打肿了。第二天上课，疼得我不敢沾座椅，只能靠着课桌站着。下了课，老师领着我回家，把父亲好好地训了一顿，说你一个大学教授，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打儿子？弄得父亲很没面子。老师走后，父亲拉着我的手向我保证，今后不会再打我了。从那以后，免了皮肉之苦，我也幡然醒悟，知道用功读书了。经此一役，我倒记下了一个成语：因祸得福。

如有来生，我愿还做父亲的儿子。这回，我要把他的本事多学上一点。

本分

从小父母就对姐姐和我耳提面命：做人要本分。至于什么是本分，怎么做才是本分，却从未具体解释过。现在回忆起来，父母的言传身教诠释了本分的内涵。

2001年年初，父亲到旧金山湾区住了一个多月，其间曾和我有过多次长谈。仿佛是交代后事，又仿佛是总结一生，以前很少议论别人的父亲，讲了他对很多人的评价。我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一点父亲的内心。

他说，自从他成为资深院士，不再有院士推荐权以后，前些年门庭若市、络绎不绝的各类学生不登门了，倒给了他时间想想事。名利这个东西很奇怪，很多人追逐了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其实人只要本本分分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把事情真正做好了，该有的总会有的，没有也不用太计较。“你妈妈和我，一辈子不巴结任何人，到头来，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衣食无忧、专于任事，也算是不虚此生啦。”

他又说，这些年老有人来请他做顾问，大多是冲着两院院士的头衔来的。“每月给你几千块钱，一年开上一两次会，到了会上又非让你讲话。有些事我根本不懂，又不在第一线工作，说错了让人笑话，不说又不行，只好讲讲原则，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把大多数都辞了，只留了几个自认为还多少懂一些的应应景，也算对得起那个顾问费。”他说。

一天晚上，他喊我到他房里，关上房门说有很重要的事交代。父亲告诉我，他最近在整理资料，准备过一两年趁身体和精力还好，写

写回忆录。父亲算了一下，在由他自己带出来的学生中，当了院士的，像黄克智、龙驭球等，有23个。如果加上学生自己认他当老师的，但他认为只是指导过没有手把手教的，像过增元，则是35个。我请他细细数给我听，他答应回北京写下后给我寄来。当时父亲身体健朗，能吃能睡，血压120/80mmHg（毫米汞柱），心跳68下/分，也没有糖尿病等老年病，还能时不时打打网球，连医生都说父亲能活过100岁。谁知人有旦夕祸福，父亲竟因急性传染性肝炎在几个月后就驾鹤西去！在父亲百年诞辰时，我们想把他提到的这些学生名单整理出来而不可得，至为遗憾。衷心希望父亲张维的学生或知情者能通过清华校友会或《水木清华》编辑部与我联络，补上这份有价值的史料。

有几件典型事例可以见证父母做人的本分。

共产党进了城，掌了权。当时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恰好与父母是故交，先后来清华看望他们。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姐姐张洁洵是母亲儿时的闺蜜，张洁清其时跟着张洁洵“三姐三姐”地叫母亲。刘仁与父亲是师大附中同班同学，刘仁在班里最年长，父亲功课好但年幼体弱，曾被同学欺负，刘仁常挺身而出保护父亲，因此结下了友谊。大事安定下来后，刘仁抽空就来看望父母，开导他们认识共产党，进而加入共产党。父亲是学土木的，刘仁希望父亲能到北京市当负责城建的局长，为新北京的建设出力。父母商量，觉得共产党打天下时自己没参加，坐天下时却来分杯羹，此事绝不可为，坚辞未受。

1955年11月7日刘仙洲入党，给父母极大震动，二人也开始积极向共产党靠拢。他们认为自己离共产党员的标准太远，需要好好改造思想，努力跟党走，争取早日入党。父亲经常向自己的联系人解沛基汇报思想，检讨自己的不足，请求组织的指导。1956年某日，蒋南翔问解沛基，张维怎么还没有入党。解沛基答，我们认为张维已达共产党员标准，但他至今还没写入党申请书，故无法履行手续。原来父亲认为自己离共产党员标准尚远，还不到申请的时候。经过解沛基反复做

工作，父亲才写了申请书。后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钱学森受命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申请把母亲陆士嘉调去当副院长，授少将军衔，此事已获批准，只待履行手续。钱与母亲当时工作的北京航空学院商调，时任院长兼书记武光坚决不放。母亲对老革命武院长极为尊重，又对这少将军衔愧不敢当，认为全军只有一位女少将李贞，李贞爬雪山过草地、身经百战、贡献卓越，而自己不过是多念了几年书而已，于革命毫无贡献，当不起这份荣誉，也无法开口向组织上请调。钱学森不死心，几年间几乎每周六都和蒋英来家里和父母聊天，坚持做说服工作。直到1962年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期间，母亲突发心肌梗死，经北京医院抢救成功，人保住了，却不得不离职休养了一年多。病愈后的母亲再不能像以前一样拼命工作了，钱学森的说服工作也就不了了之。

北航领导为了照顾母亲的身体和安全，决定配专车接送她上下班。母亲认为学院车紧张，自己坐公交车、走走路既节约了资源又锻炼了身体，推辞不受，北航却坚持要派。于是，每日早晨，北航的车准时到清华西南门等母亲。母亲则视而不见，过车不入，一路低头疾走，直奔蓝旗营31路公共汽车站，她后面则跟着一辆轿车。等母亲上了车，轿车一路尾随到北航站等她下车。到了那里，母亲当然更不会上车了。双方僵持了几个月，北航只好放弃了。

“文革”结束，科学的春天来了。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共172人，20多年后，很多人已过世，需要增选。第二批学部委员推选的名单出炉，母亲在列。这个名单产生的条件是有3位学部委员推荐，而母亲则由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等7位推荐而获选，父亲为避嫌没有参加推荐。得知这个结果，母亲没有与任何人（包括父亲）商量，给当时主持科学院工作的李昌写了封信，说自己年龄偏大(68岁），身体不好，能为祖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时间不多了，要求将自己的名额让给年轻人。李昌很快回信赞扬了母亲的高风

亮节，接受了母亲的请求。严老得知母亲此举，大为不快，把母亲狠狠说了一顿，说多少人想我推荐我都没答应，你怎么可以推掉呢，这是关系到中国科学水平的大事呀。多年后，母亲谈起此事，并不后悔，但承认自己考虑不周，算是小小遗憾吧。

母亲这样做，其实早有先例。1956年知识分子定级时，父母均被定为高教一级。母亲认为自己的学识和资历均在沈元、王德荣之下，不宜与他们同级。她申诉未果，便自降一级，坚持领二级教授的薪金，填表也只填二级。久而久之，大家也只好随她了。

这些故事，今天的年轻人听到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这样对待荣誉和地位的。作为见证人，我来讲一讲，权当给历史留下点记录，帮助后人了解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雷锋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他是真实存在的，雷锋的思想基础是绝对可信的。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父母是知识界的雷锋。

求学

母亲襁褓失父，因之被她的母亲（我的外婆）视为不祥之人，从此不待见她。母亲几乎没有得到过外婆的疼爱。然而她天资聪颖，为了获得外婆的关注，学习格外认真，每学期期末都能拿回一张第一名的奖状。而这时外婆能说上一句“不错，放在那儿吧”，她就快乐得像只小鸟似的。哪有今天孩子的幸运，念好了书在家里能像公主似的受宠。

渐渐地，母亲从学习中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她像只小蜜蜂似的在书本中采蜜，不再祈求外婆的关心。高中毕业时，母亲选择考大学，外婆却认为女孩子迟早要嫁人，念不念书无足轻重。母亲奋力抗争，坚持继续求学。母女俩僵持了几天，外婆见她实在是倔，又想想她一贯学业优秀，加上周围亲朋劝说，也就妥协了，但也扔下一句话，考得好也就算了，考得不好就准备嫁人吧。结果母亲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师大物理系，如愿以偿。

母亲大学二年级时，父亲考取了交通大学唐山学院土木系。父母的长辈本是世交，他们从小就认识，这时交往更密切了，几年之后，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两人除了谈情说爱之外，更多的是谈今后的打算。母亲在中学的时候就被居里夫人所吸引，暗暗立下做中国居里夫人的志向。父亲说这个志向太大，恐怕在中国难以实现，唯有出国留学！好呀，两人一拍即合。

可是，出国谈何容易！

其时，出国留学无非两条路。首选是官费或庚款生，可无论哪种形式的公费生都不对女生开放，任凭你成绩再好，学业再优也白搭；

其次就是自费留学，所费不赀，非殷实之家不敢问津。

母亲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两人商定大学毕业后先工作一段时间，这时期母亲攒钱，父亲申请考官费留学。

1932年，母亲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师大物理系毕业，接手了学长汪德昭在志成中学（今北京35中）的物理课教学工作。为了能多拿薪水，母亲不仅用心教书，而且不放过任何兼课机会，每月可挣120元，这在当时已经相当于一个大学讲师的水平了。拿到薪水后，母亲除了留下生活所需，其余大部分都交给外婆保管，作为将来出国之用。不仅如此，母亲还兼做家教，以便多攒些钱。

1933年父亲大学毕业，先做铁路工程师后回唐院当助教。1935年获悉清华留美庚款招生，备战后往考，却以第二名的成绩落第。盖因当年这个专业只取一名，该名额被他小学和中学同学钱学森夺走。

母亲得到消息后安慰父亲，别泄气，明年接着来！这样我也可以多攒一年的钱。

伯父张度对父亲说，你生下来就是老二，既然是老二的命，明年再考就选个招两名的科目。父亲觉得哥哥说得有理，第二年就报了力学专业有两个名额的第五届中英庚款，果然又考了个第二！这回第一名是唐院的同学。两次都败在同学手下，真是无巧不成书。

父亲考上庚款生，资金有了着落，母亲盘算着这几年攒的钱也够路费了，便通知外婆启用这笔钱。谁知晴天霹雳，外婆告诉她，这些钱已经给小儿子（我六舅）开诊所用了！母亲闻言急得团团转，既不能忤逆责怪外婆，又不能逼哥哥变卖诊所。她茶饭不思，火急火燎，眼看出国的计划就要泡汤。天无绝人之路，外婆的弟弟（母亲的舅舅，我的舅公）施今墨是名震京城的四大名医之一，他一向喜欢这个聪明上进的外甥女，常常鼓励她好好读书自食其力。获悉此困境后他慷慨解囊，资助了母亲800元路费，并承诺每月按时资助生活费。有了舅公的支持，母亲才得以和父亲同赴欧洲。这件事，母亲记了一辈

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断以各种方式还舅公的人情，却怎么也还不清。后来母亲决定对所有考上大学的子侄给予经济支持，也算是报答舅公的恩情。

1937年7月，在卢沟桥的炮声中，父母告别了战火笼罩的北平，经南京到了上海。8月7日，他们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当船缓缓驶出吴淞口时，望着日寇炮击下黑烟笼罩的上海，父母和同行的卢嘉锡等人个个脸上流淌着泪水，人人怀着学好本领早日回来报效祖国的决心，把眼前的这一幕永远地刻在了心上，终生未忘。

父母在巴黎与汪德昭、李慧年聚首，然后分道。父亲是中英庚款生，去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母亲则去了德国（这是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圣地）。

到德国后，母亲在柏林一面过语言关，一面考察各大学情况，看哪所大学适合自己。在这期间，她发现德国的航空工业非常发达，认为中国要想不挨打必须发展航空事业，遂放弃做中国居里夫人的想法而选择研究空气动力学。她打听到哥廷根大学的普朗特教授是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空气动力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她心想要学就学最好的，要拜就拜名师，决心拜普朗特教授为师。

她先是给哥廷根大学发去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师从普朗特的意愿。可没想到，信倒是很快就回了，却告诉她普朗特教授因为年事已高不再接收学生，信中还委婉地说普朗特教授的门槛很高，从来就没有收过亚洲学生，更别说女生了。

母亲本来想不行就换人吧，可一看后面的话，气就冒起来了，什么叫门槛很高？不就是怀疑我的水平吗？我偏要让他们看看中国女学生行不行！

带着这种心情，母亲来到哥廷根求见普朗特。

普朗特听说有个中国女学生坚持要见他，便请她进办公室谈谈。

当母亲将来意说明后，普朗特笑了："他们没告诉你我两年前就不收学生了吗？况且，这行对数学要求很高，东方人数学不行，女孩子就更不懂逻辑了。"母亲一听就急了："您没考过我，怎么知道我不行？"普朗特一愣，认真地看了看母亲："好，你过来！"他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说："这几本书，你去找来看，两个月后来考试吧。"母亲忙不迭地把书名抄下来，认真开始备考。

两个月后，母亲如约来到普朗特的办公室。普朗特一脸困惑："你是谁呀？我能帮你做什么？"母亲急了："您不是让我读您指定的书，两个月后来考试吗？我现在准备好了，今天就是来考试的。"老先生这才想起两个月前的事，随即拿了几张纸，写了几道题递给母亲："你去隔壁做吧，两个小时后交卷。"两个小时过后，老先生准时推门进来，拿过考卷认真看起来。老先生面无表情，母亲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等看完了，老先生抬起头轻轻一拍桌子："祝贺你，我收你了！"这是改变母亲一生的决定，也是母亲极大的荣耀。一向以严厉挑剔而著称的普朗特教授在关山门两年后重新收徒，收了他学生中唯一的外国人，唯一的女学生。

无巧不成书，母亲的小学同学钱学森在美国也选择了这行，师从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而冯·卡门正是普朗特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回国后，父亲曾开玩笑对他说，从学术传承上来说，士嘉是你实实在在的师姑。钱学森笑而不语，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很明白，母亲和他都是普朗特的传人，哥廷根学派的嫡系传人。

在普朗特教授的指导下，母亲学业精进，半年后获得了洪堡奖学金。洪堡奖学金的金额比父亲的庚款留学经费要高出近一倍。有了这笔钱，生活费彻底解决了，母亲立即去信施今墨，表示感谢资助，可以停止按月寄钱了。1942年，母亲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拿到了德国三等博士学位中的最高级——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母亲被选为全国妇联执委，所到之处，总要给女学生们讲自己这段求学经历，鼓励女生要自尊、自爱、自立，奋发向上，不惧权威，积极向学。

宗师

普朗特在收下母亲后，给她列了个听课名单——授课教师全是哥廷根大学的知名教授。母亲接过名单后一个问题也没提，回去精心准备，从W教授的物理课听起。

她早早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上课时认真听讲、埋头记笔记，下了课抬腿就走。

几堂课下来，W教授注意到了这位东方面孔的小姐，心中充满疑惑，讲课中不时看她一眼，分明是在问：你是谁，为什么来听我的课，你能听懂吗？

又一堂课后，母亲刚站起来准备离开，W教授叫住了她：

对不起，小姐，你是不是走错教室了？

这不是206教室吗？

是的。

西方人的教养使得他没有再追问下去，生怕由于自己的猜测冒犯了女性。又过了几堂课，W教授见母亲仍然如此，实在忍不住了：

小姐，你确定是来听我的课吗？

是的，W教授。

听到肯定回答后，W教授小心地追问了一句：我的课你能听懂吗？

母亲微微一笑：教授，您的课讲得很好，将我过去学过的知识重新梳理了一遍，我真的是获益匪浅！

W教授这才明白母亲早已掌握了这些知识。他不禁好奇心骤起：你学过？那你为什么还来听呢？

我的教授指定我来的。

你的教授是谁呀？

普朗特。

W教授听到普朗特的名字时大为惊讶，连连说：他又收学生了？哎呀，那我的课对你来说太浅了，太浅了。

从那以后，W教授对母亲多了几分尊敬，讲着讲着有时还会问她：“我没讲错吧？”

这段故事，我们姐弟俩从小就通过父亲的讲述耳熟能详。我们俩对这位从未谋面的普朗特教授产生了浓厚兴趣，曾缠着母亲问普朗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因我们尚小，更可能是当时的氛围令母亲不愿谈及她在海外留学的经历，我们对普朗特知之甚少，依稀中只知道他的名气很大。

没想到20年后，我却有偶然的机会亲眼见证了普朗特的威力。

这要从父亲说起。父亲1946年回国前，曾在瑞士时属BBC（布朗·勃法瑞公司，简称BBC)的一家公司担任理论设计工程师。在得知父亲决定回国时，公司颇为不情愿，要他推荐继任者才同意放行，父亲遂介绍钟朗璇（上海交通大学本科生，清华1936年留美庚款生）接替自己的工作。钟朗璇不负众望，到20世纪70年代初，升至该公司总工程师，而此时的BBC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蒸汽轮机制造商，能生产当时世界领先的60万千瓦蒸汽轮机。

此时，哈尔滨汽轮机厂正为生产30万千瓦蒸汽轮机攻关，遇到很多技术难题，在该厂工作的清华电机系毕业生向母校求援。父亲获悉情况后，想起了钟朗璇，遂写信向他求助。钟当即回国，与父亲接洽后做出了安排。当时中国还处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中，BBC不能直接派人去哈汽，就以与清华交流的名义，派了两位高级工程师来华，“曲线”帮助哈汽解决了问题。赴哈汽完成任务后，两位工程师回到北京向父亲辞行，约了晚饭，父母带我一同前往他们下榻的友谊宾馆。

宾主围圆桌坐定。父亲系主客，居中，两位工程师一边一位（我暂且用甲、乙称呼他们），乙的右手边是母亲，然后是我。瑞士分德语区和法语区，这二位都生长于德语区，席间与父亲用德语热烈交谈。出于礼貌，乙也不时用英语和母亲交谈几句。父亲意识到了乙的良苦用心，便告诉他们母亲会德语。两位略感意外，换成德语试探着和母亲交流。

这一交流，两位瑞士高工大为惊讶，母亲不但德语流利、纯正，而且技术上也懂行，便问母亲是在哪里学得如此学识。父亲这才想起介绍，忙说：“她是普朗特的学生！”

两人就像是触了电，腾的一下同时站起来。甲绕过父亲几步过来一把抓住母亲的手，乙也转过身来和母亲握手。这还不算，握完了手，甲示意和我换位子，两人一左一右将母亲夹在中间，这顿晚宴的主客立即换成母亲了。

我在一旁看傻了，怎么变得这么快，就因为母亲是普朗特的学生？

得知眼前的这位中年妇女就是普朗特唯一的女弟子张陆秀珍时，他们连连称奇，说早就听说过普朗特教授晚年收过一位东方女学生，一直不知详情，今天能在这里相遇实在是三生有幸。

读者必然会问，陆士嘉怎么又成了张陆秀珍呢？

原来，母亲本叫陆秀珍，上中学时觉得这个名字太俗气，自己改为士嘉，意思是要成为最好的战士。出国了，护照上却仍是陆秀珍。所以，在普朗特的学生名单中，查不到陆士嘉，只有前面还冠以夫姓的张陆秀珍。

这顿饭持续了很久。饭毕，甲又提出，可不可以等他去楼上取相机？照相时，甲、乙簇拥着母亲，毕恭毕敬。直到我们上了车，他们还隔着车窗拼命向母亲摆手，不停地重复：幸会幸会！

父亲在车上乐呵呵地对我说："我早告诉过你们，你妈比我厉害，这下见识了吧？她在欧洲学术界比我有影响。"我将信将疑。

但，父亲的话绝非虚言。

普朗特于1953年逝世。为纪念他对力学的巨大贡献，从1957年起，德国航空航天学会(DGLR)和应用数学与力学学会(GAMM)在每年一届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年会上，都邀请一位国际著名的力学家做纪念普朗特的报告，其中许多是普朗特的学生和同事。这样的报告到2009年时，已进行了52次，时间跨度之大、数量之多，史无前例。

普朗特的传人，每年都要出一本论文集，把他们这一年的最新成果编辑成册。几十年下来，这些论文集成为空气动力学界的权威著作，因此普朗特传人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母亲是普朗特的嫡传弟子，难怪这两位瑞士高工如此礼待母亲。

在我国，据我所知，除了母亲外，普朗特传人还有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郭永怀、庄逢甘、杜庆华、张涵信、崔尔杰等。

从那以后，我对普朗特充满了梦一般的崇拜，期待有一天和母亲静下来好好聊聊她的老师。孰料，自己早早出国，母亲又走得匆匆，这场原计划的聊天终成憾事。

在父母离世后，我赎罪般地寻找父母的记录。季羡林是父母留学德国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在他的留德日记中到处都是父母的踪影。

《留德十年》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是描写盟军大轰炸后的一个上午：

> ……从远处看到一个老头，弯腰屈背，仔细看着什么。他手里没有拿着笤帚之类的东西，不像是扫玻璃的。走到跟前，我才认清，原来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朗特教授。我赶紧喊了一声："早安，教授先生！"他抬头看到我，也说了声："早安！"他告诉我，他正在看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看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这一段短墙的。他嘴里自言自语："这真是难得的机会！这是我的流体力学实验室里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我陡然一惊，离开又肃然起敬。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老教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普朗特，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首富

民国时期的清华有个旧规定，即夫妇不能同时在清华任教授。这个规定不知何时定下，出于什么考虑，为此我们查了很多资料。我们发现此规定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初逐渐形成，估计跟当时北京学校罢教有关。那时的北洋政府常年用兵，动辄把教育经费挪作军费，以致教育部拖欠教师薪水，连鲁迅都抱怨生活的困顿。以北京大学李大钊等人为首的教师，在北京八大学校联合起来罢教，抗议政府拖薪之事。因清华是使用美国庚子退还款办学的，不在教育部的管辖范围之内，不受拖薪的影响。因此北京各校教授纷纷以在清华兼职而为计谋，清华的富足和优越突显之。有文字记载，当时的清华教授薪水养活一家十余口人绰绰有余，工作三五年下来在城里置办一套像样的四合院不在话下。为平衡清华教授与非清华教授的收入差距不要过大，清华遂规定夫妇不能同时在清华任教授。

我的父母张维、陆士嘉应算是清华历史上第一对教授夫妇。

父亲1947年由北洋大学土木系转入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授，母亲原本是北洋大学航空系教授。对于父亲转入清华，母亲虽然支持，但碍于清华规定，母亲无法同样进入清华担任航空系教授，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幸亏清华工学院代理院长陶葆楷求贤若渴，协调母亲在水利部和清华共建的水工实验室做研究员，编制属于水利部，同时在清华航空系兼职做教授，授空气动力学课。

这个安排恐怕是当时的最佳安排，父母和学校皆满意。

仅仅过了一年半，1949年年初北京解放，共产党立即废除了清华的这一规定，母亲名正言顺地当上了航空系教授。由此，父母成为清

华历史上第一对教授夫妇。

在1952年教授定级时，父母同时被定为教学6级，按供给制的标准，每月发若干小米。其时，周培源4级，梁思成5级。

到了1956年实行薪金制，重新定级，教学6级以上都转为高教1级，即1级教授，月薪360元（党员教授为345元）。

母亲此时已随航空系调整到北京航空学院，当她得知自己和资深的周培源、梁思成、王德荣、沈元同被评为1级教授时，颇为不自在。她又知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的北航党委书记武光行政7级，比自己工资还少时，更加不安。她向领导提出降为2级，未获同意，自此便坚持只领2级的薪水，填表也只填2级。坚持的时间长了，填的表越来越多，知道的人越来越少，母亲终于达成目的——学院渐渐按2级教授对待她，她也安心了。只有原始档案无法更改，还是高教1级。

其他在20世纪50年代夫妇皆为1级教授（或研究员）的，我不知还有没有。就我所知，钱三强、何泽慧，张文裕、王承书都是夫1级妇2级。母亲坚持不肯拿这第一，是不是有不愿出这个头的原因？我当年年纪小没想起问明白，现在后悔也没地方问了。

1956—1986年这30年，在大家都靠工资生活的年代，清华园里一家两个1级教授加起来有每月700余元的收入，在当时一家四五口人靠每月几十元生活的时代，这有点引人注目。

“文革”后期，有一阵我天天泡在王迺壮家，看他画画，听他聊天。我和王先生成了忘年交。王先生乃中央美术学院1953届毕业生，从徐悲鸿学素描、吴作人学笔墨、李苦禅学色彩、刘海粟学气魄，得大家之真传，加上自己体会，其画讲究境界，极为大气，当时一幅画就已能卖到几千元。我颇为羡慕他有这一手绝活，而他却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富人。而且，王为人颇豪爽、低调。后来我赴美求学，临行那天早上，他来家里亲手交给我800美元，说是为我壮行，放下就走了，令我至今难忘。

一次，我又去看王迺壮作画。闲谈时，他言之凿凿地说我家是清华首富，有22万元存款什么的。闻言大为惊讶下，我回去问母亲是否为真。她听了哈哈一笑说：“要真有那么多倒好了，咱家是有点存款，加起来有个五六万吧。不过，你们别惦记，我跟你爸早商量好了，你们将来得靠自己。”我的妈呀，这可是一笔大钱呐，要让我自己攒，得多少年哪？

家里似乎不差钱，父母对我们姐弟在钱上却很抠。姐姐张克群上清华时，每月生活费23元，我上汇文高中，每月8元。当然这些钱绝对够花，我还能吃上想吃的各种北京小吃。那时，正宗的四川饭店的担担面，二两一碗，素的只卖一角二，浇上肉末一角四；一盘香肠一角，一杯啤酒一角；两碗担担面加一盘香肠、一杯啤酒，绝对能让一个人吃得饱饱的，不到五角搞定。今日听来，倒像是天方夜谭了。

母亲因为出国留学时得到过我舅公施今墨的援助，一直感恩于此。成家立业后母亲一方面孝顺舅公，在生活上照顾他，另一方面继承舅公的心愿，支持家族子弟求学。因此，父母两边的亲戚但凡考上大学者，母亲一律每人每月支付25元生活费。表姐在学校谈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家经济困难，母亲见他人实在，也给他每月25元生活费。当然，表姐这个男朋友后来成了我的表姐夫。

姐姐张克群质疑母亲：我这亲生的怎么比他们还少两块钱？

母亲说正因为你是亲生的，所以才少给两块钱。

父母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入党的党员，每月二人自觉各交100元党费，还按月给姑姑和其他亲戚一些补贴，如此下来家里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样宽裕。母亲每天记账，在月底结算，关于柴米油盐的费用花得合不合理，是不是超出预算了，都要和杨奶奶讨论调整。

杨奶奶是我家老保姆，从父亲重新工作时，就到了我家帮忙。杨奶奶人好，爱干净，做事利落，做的饭菜可口，嘴又严，从不在外说三道四，深得父母的信任。家里的日常采买基本交给了她。杨奶奶老

了之后，她的家人要接她回去养老，父母和她商量，你在这里习惯了，不用回去了，我们给你养老。杨奶奶觉得叶落归根，还是回家为好。

她回去之后不久，父亲感觉有些不放心，特意派姐姐去看望杨奶奶。果然，杨奶奶和儿子、儿媳生活得并不愉快。在村口，杨奶奶听说姐姐找她，大喊："仙女来了！"于是她又回到了我家。

有一次，黄克智夫人陈佩英来我家，和杨奶奶唠起了家常。杨奶奶感慨父母待人真诚，没拿她当外人。她说，每次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只要发了奖金或稿费一定按比例有杨奶奶的一份，因为杨奶奶操持了这个家，使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

我好喝啤酒，那时的啤酒很不好买，常常缺货。看见有卖的，我就会顺便装一网兜骑车带回家存着。父母规定如果只是我一人喝，那么我得自己负担，月底要从月费里扣掉这笔费用；如果是跟父亲一起喝则算"公款"。于是我常盘算如何忽悠父亲，而他不常上当。有时母亲会帮我劝父亲："喝两口吧，今天菜不错！"

均贫富时代的"清华首富"已成历史，忆起恍如隔世。近日有演艺界人士豪掷两亿结婚，媒体竟如蝇逐臭，令人顿生"今夕何夕，传统安在？"之叹也。

白金

二战接近尾声，盟军从德国西面迫近柏林。父亲离开柏林到哥廷根和妻子及女儿团聚，租住在母亲师兄玻尔教授家。

盟军一踏上哥廷根，归心似箭的父母以及共患难了几年的刘先志夫妇和季羡林立即着手准备回国。父亲联络到了在瑞士的短期工作，也拿到了签证。

玻尔夫妇设宴为父母饯行。席间，玻尔教授提起时局不胜悲观：战争即将结束，德国也许将不复存在……父母想不出什么话可以宽慰他，气氛一时很压抑。少顷，玻尔太太捧出一个绒布包放在桌上，忽然掩面啜泣，弄得父母手足无措，不知发生了什么。玻尔揽住太太的肩膀说，盟军有令，德国人不许持有贵金属，我们可能被抄家……这是我们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白金，原来是供儿子长大了读书用的，现在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恳请你们把这些白金带出德国。如果德国能平安度过这个劫难，大家都平安，那么你们再设法还给我们，要是德国亡了，要这白金也没用，就算送给你们了吧！

父母一听这话就蒙了，这突如其来的托付让他们一时反应不过来。这么多白金，这是一笔巨款呀，责任太大！母亲陆士嘉素具侠肝义胆，心想，既然赶到点上了，人家有难，这个忙必须要帮，不就是带点白金嘛，将来若真如玻尔教授所说大家平安，再想办法还给他们便是。父母交流几句，便接了过来。那白金共1.75公斤，沉甸甸的。

父母带着这白金出了德国。途经瑞士、法国、越南，漂洋过海出关进关若干次，竟一路畅通无阻地回到了中国。

战后的德国虽没有灭亡，却被苏、美两大阵营人为分成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互不往来；后来又建起了柏林墙，更是咫尺天涯。中国和民主德国属一个阵营，哥廷根在联邦德国属另一个阵营。父母和玻尔教授彼此不通音信，无法物归原主。东西倒是带出来了，却成了父母的心病。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10年过去，到了1956年。这年，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霍夫曼教授访华，照例由父亲接待。借此便利，在聊天时，父亲便询问霍夫曼教授：认识玻尔教授否？不承想这位教授竟告知玻尔教授现在是联邦德国科协主席，他们彼此不但相识，而且不时在西柏林开会见面！父亲大喜：“我这里有些玻尔教授的旧物，请你带回去转交给他，可以吗？”答复出奇地痛快：“没问题！”竟连带什么东西都没问起。

父母赶紧分别向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汇报此事，清华接谈的是何东昌，北航是武光。双方答复完全一致：好事，这展现了中国人做事有始有终的诚信，应该物归原主。

不过数月，父亲便收到了玻尔辗转寄来的信，信中不仅感谢父母送还白金，还承诺如果父母将来送女儿（姐姐在德国出生，而他们不知后来有了我）去德国留学时，那么他们愿意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

压在父母心上的大石终于落地。

有知情的好事之徒在“文革”中将此事用大字报揭出，给二人扣了一堆帽子——特务、卖国、走私，不一而足。

海关总署来车来人将母亲从家中带走。到了办公室，一位季科长开门见山：“陆教授，您曾经托人将白金带出国，有这回事吗？”

母亲点头承认。

季科长接着说：“您入境和出境时都没有申报，按照海关规定，这属于走私行为。”

母亲一听就急了：“我还觉得这是学雷锋做好事呢，怎么成了走私了？”遂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详细。末了她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白金本来就是人家的，我们不过是代人保管。你们看该怎么处分我吧？”

季科长笑着解释：“您误会了！我们请您来，是想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没有要处分您的意思。我们好奇的是，您是如何避开海关的火眼金睛的呢？”

母亲松了一口气说：“东西是人家的，心里没当回事，过海关时既没想过申报也没觉得是走私，一点都不紧张。我想那位霍夫曼教授也是同样的反应。”

季科长反应过来了：看来外宾这里是个漏洞，要加强管理！

在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父亲担任了首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中国委员，常去巴黎开会。有此便利，父亲萌生了重访德国（联邦德国）建立中德文化交流的想法，经汇报争取，终于成行。

父亲到访，玻尔教授在家中宴请父亲，并把自己的弟子全部叫到家中作陪。劫后多年重逢，见面时两人百感交集，紧紧拥抱，老泪纵横。玻尔并没有马上向学生们介绍父亲，而是先牵着父亲的手走进地窖，取出了一瓶年份最久远的1842年的摩泽尔葡萄酒。学生们一片惊叹，这可是教授的镇窖之宝，这么多年来只闻其名、未谋其面！

玻尔教授亲自开瓶，给每人倒上一点，然后举杯郑重地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说到的诚实的中国人，张！今后不管他有什么要求，你们都要尽力帮助！今天，让我们为张干杯！为德中友谊干杯！”

学生们这才知道父亲就是那个玻尔教授口中常常念叨的、多年后归还白金的中国人，其夫人还是大名鼎鼎的普朗特教授的学生。诚实、大义从此成为父母身上的标记，在德国学术界迅速传开。

20世纪80年代，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率团访问联邦德国。父亲知道后，请他到家里来一趟。何行前事多，一时抽不出时间，他心想回来后再见面也不迟。

待何访问归来，到了家放下行李便急匆匆赶来我家。进门就连说：“张先生，我真后悔走前没来，差点误了大事。”原来，何一行在联邦德国参观访问时，多次遇到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敏感单位，但它们都不对中国代表团开放，令他们十分扫兴。闲聊时，德方领导问起既然是教育界人士，张为什么没来？机灵的何东昌立即意识到父亲在德国的影响力，马上说：“张维先生原是要来的，因为事情多脱不开身。我是他早年的助教，他嘱咐我向德国的老朋友问好。您认识张教授？”那位一听，态度大变，马上说：“我是玻尔教授的学生，是联邦德国现任的科协主席。联邦德国好多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都是玻尔教授的学生和朋友，老人家交代我们，张的要求，我们都要尽力帮助。既然您是张的朋友，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吧！”此后，何一行打着父亲的招牌，畅通无阻地完成了访问。

父亲听了，笑眯眯地从屋里拿出一个信封说：“我本来写了这份名单要交给你的，可惜你走前太忙，没能带上。”

何东昌打开一看，正是要参观单位的负责人名单。他幽默地说：“张先生，我这部长头衔可没您的面子大啊！幸亏我反应快，不然好多地方都看不到，这趟就可惜了。”

宋健听说此事，在率中国工程院代表团访德时，坚邀父亲同行。访问一路顺畅，颇有收获。

20世纪90年代，父亲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半年，考察研究工程教育。其间抽空去麻省理工学院闲转，本不想惊动任何人，不意在图书馆见到几本好书，爱不释手，遂致电师大附中学弟林家翘，欲请他代借，却无人接听。情急之下，向馆员索查教员名录，冀能找到熟人施以援手。突见一玻尔教授名字，即致电询问对方与哥廷根之玻尔教授可有关系，对方告之是其儿子。父亲大喜，亮明了身份。小玻

尔闻之，立即奔来相见，不但帮忙借了书，还和父亲一起吃了顿饭，他告诉父亲自己来美留学的费用正是用的那些白金。

随着父母相继去世，故事本应到此结束，然而余绪仍在。

2002年10月，清华工业工程系的郑力教授和几位同人访问亚琛工业大学。到达当天，便有亚琛工大的一位老教授请他们一行到当地一家历史悠久的餐厅举行晚宴。餐厅非常漂亮，又有历史感，大家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老先生来了就一脸惊讶：“张在哪里？”但也没多说什么。席间，老先生还向郑力等介绍了亚琛的历史以及亚琛与清华的关系，讲了不少我父亲的故事。事后才知道，那位老教授是把张伟当成张维（英文译名相同）了！

绝招

新中国的科学外交，离不开周培源的贡献。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被选中协助周老做这方面的工作，长达近40年。这跟他能熟练掌握英德两门外语，有很大关系。

父亲在师大附小、师大附中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他在交大接受全英文教学，后又考上1937年第五届中英庚款生，去帝国理工学院，一年念完了硕士，英文应该说是过关了。

当父亲去德国探望未婚妻（我母亲陆士嘉）时，在柏林遇到了他一直感兴趣的、国际上先进的薄壳理论研究权威特尔克教授。他非常渴望能在德国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和从事相关研究，遂向中国驻德使馆询问，作为庚款生，能否转学到德国来。使馆工作人员查明父亲确是中英庚款生，二话没说就帮他办了手续。于是他就在德国留下，后来读完了博士又工作了几年，直到二战结束才回国。人留在德国了，其他的事就是写信给英国导师说明情况，写信给留在伦敦的同学卢嘉锡请他帮忙把东西寄到柏林，等等。这种在今天看起来超乎寻常的大事，在没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20世纪30年代末，却只用了几十分钟、几张邮票就办妥了。

人留在德国，语言成了头等大事，找老师练德语自然不在话下。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何能尽快熟练掌握，就看自己的招数了。

父亲上街买了张柏林地图，先在图上找到自己的住处，然后把住处附近的几条街道、街名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在脑子里，就开始上街进行自己的德语练习了。

请问，××街怎么走？

先生，您能告诉我××街在哪里吗？

太太，这里是××街吗？

对不起，我要去××街，是这前面拐弯吗？

谢谢您，先生，今天天气真好。

谢谢太太，您这衣服真漂亮……

一条××街，来来回回能问出好多问题，问完了张三问李四，问完了一条街再问另一条街。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问路、问时间、问天气……只要敢张嘴，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是老师。碰上热心人，还会纠正父亲的发音、句型什么的。

能张口了，回到家，只要房东老太太闲着，父亲就跟她练，厨房里的东西，见什么问什么，叫不出名的就连指带比画。一回生二回熟，吃喝拉撒这点东西，慢慢难不住他了。

专业名词怎么学呢？逛旧书店。有不会的词他就问店员，店员大多有问必答，渐渐父亲也能问到点子上了。

从小一直是班上年龄最小、功课最好的学生，16岁就考上当时国内最好的交通大学的父亲，勤奋自不在话下。听、说既然上了路，读写再加把劲，他的德文水平一年之内就从白丁进步到基本可以和特尔克教授口头简单交流、读写大体无障碍的程度了。

多年后，父亲经常陪同周培源和洋人打交道。每当洋人惊讶于父亲的德文程度，周老总会得意地介绍自己的助手："张教授的德语，比德国人还好！"虽是戏言，却多少反映了父亲的德语水平。

当然，问路也要有技巧。首先你得让人乐意。有时候碰到一些脾气不太好的或者心里有事的德国人，还得哄人家高兴。如果是带着孩子的女士或先生，那么父亲一定会先赞美他们的孩子是多么活泼可

爱，这时候孩子的父母大多都是笑盈盈地。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父亲碰到一个绝对是德国人的家伙，刚一开口，那家伙拔腿就跑，莫名其妙。

其次，一定要找对人。如果你找了个不会德语的高鼻子蓝眼睛，算你白搭，甚至可能会遭到白眼。父亲后来跟我们说，就在那段时间他练就了如何辨别欧洲几个主要民族的本事，他说鼻子是一个主要观察部位，还有就是眼睛和头发的颜色。通过不断总结，他基本能判断出一个陌生人来自什么地方。

我对此感到怀疑，认为父亲有夸大的嫌疑，直到后来与父亲的学生吴季松无意中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是真的。吴季松曾三次陪同父亲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有时候转机在候机室闲得无事，父亲会跟他们玩一个猜其他旅客是什么人的游戏，十有八九父亲是对的。

吴季松补充道："别小看这点，张先生的这个绝招往往能到起关键作用。国际组织中也是存在互相抱团的，谁跟谁是一伙我们有时也搞不清楚，尤其是犹太人，他们进入到各个领域，而且希望把控局面。一旦我们和别人竞争席位，判断谁是犹太人就很重要。有了张先生这个绝招，我们基本能把对方的来头搞明白。"

听到这里，我又想起，20世纪50—60年代及80年代初，父亲作为中国科协主要成员曾几十次参加国际会议，这与他的外语水平有关，也与他善于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有关。父亲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气氛搞融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为下一步工作做好铺垫。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科协支持父亲竞选世界工程师协会联合会副主席职位。当时，这个职位中国人还没涉足，需要有6个该组织中前主席或副主席的人推荐。这对于刚加入该组织的中国科协而言确实是个挑战。

一天我去楼上书房，见父亲正在写信。我刚要离开，他放下笔跟我说："我正在竞选世界工程师协会联合会副主席，我本来就打算随

便一试，如果人家支持我，我就去竞选，如果没人理我，就算了。初步一试后我很容易地拿到了4票，我想我可以去争取争取。剩下的两票我心目中有四五个人选，我打算给他们每人写一封信探探口风。其中最没有把握的，是一个美国人。这个人很热情，活动能力很强，他要是支持我，我的希望就会大增。但是我跟他只有一面之交，给人写这么个信，让人推荐，有点贸然。可我不想放弃，这家伙能量大，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没想到时间不长回信就来了：“张，我非常支持你，而且我肯定投你的票，我到现在都记得你在肯尼亚的机场给我讲笑话时候的表情。你给我讲的那个笑话，是我现在兜里笑话中的No.1（第一名）。我每次想要活跃气氛的时候就讲这个笑话，肯定会获得满堂彩。我对你印象太深刻了。我一定要推荐你。”

那一年，父亲很顺利地当选，是首位坐上这个位置的中国人。

20世纪50年代初主张学习苏联，时为清华最年轻教授的父亲恶补俄文，很快就达到能读写的程度，有力地配合了苏联专家的工作。由于无苏联街可逛，比起德语和英语，他的俄语口语程度不高。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首任中国委员，常去巴黎开会。法语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他感到不会法语在工作上有许多不便，就下决心学习。这时他已年过花甲，身份也不同，自然无法再拿份地图上街去练习。父亲便自己制作了好多单词卡片，每20个一扎，用橡皮筋捆起来放在兜里，见缝插针地学习。一段时间后，基本上能自己用法语解决简单的衣食住行问题，不用翻译老跟着他啦。

妙手

熟悉我家的都知道，我母亲陆士嘉的舅舅是施今墨。施今墨乃民国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在西医刚传进中国时，他就主张并运用西医看病；其思想之开明、医术之高超，名震京华，政要富贾纷纷找他问诊。他是已知的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看过病的唯一一位中医。

施今墨疼爱他好学的外甥女并且资助她留学德国终成器——母亲成为我国第一代流体力学家。母亲和父亲于1946年回国后定居北平，双双执教于清华园。通过母亲，施今墨大夫及其弟子便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华本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超收部分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最早的校医是西医。

梅贻琦当年的秘书沈刚如，没有随梅去台湾，因为懂中医，便在清华校医院做了中医师。从此，清华园里便是中西医兼用。

在我记忆中，施今墨来清华给刘仙洲和李寿慈看过病，现在想来还真有意思。

我不记得当年他俩得了什么病，只记得施今墨号完脉后分别给他俩开了方子，其中给刘仙洲的方子中有一味药叫“铜绿”。方子中特别注明，此铜绿如此获得：取光绪年铜钱至少三枚，埋于云南昆明郊外一尺深地下4个月后，取出并刮下铜绿入药。

也许开方子时刘仙洲并没细看，也许他注意到了但没好意思贸然请教，反正在看清楚药方后他想不明白了：为什么非要云南的铜绿？为什么一定要用光绪铜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刘仙洲执方子来家中问我父母，我父母再问施今墨，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方法，岂不是迷信？施今墨答曰，此乃他年少在云南学医时所得，所以仍沿用原法。至于是否可用其他铜钱埋在其他地方，要试过方知。但此方并非常用之方，没有机会试验。古人传下之方，当然需要在今世变通使用，但是在没搞清楚如何变通之前，如果旧方有用，必有其合理之处，还是不要轻易变更为好。

刘仙洲闻言，惊叹施大夫的科学素养之高，没想到一个中医大夫竟然有如此严谨的科学思维！这更加坚定了他对施今墨的信心。刘仙洲依方服药，结果证明疗效颇佳。

光绪铜钱的故事在清华园里被人们津津乐道。

20世纪60年代末期，落户在东北松辽平原的姐姐怀孕了，因有前两次意外流产的经历，所以这次她格外小心。舅公施今墨知道后对她说，你来，我给你保胎。喝了舅公的药后这胎儿果然安稳，一天天在姐姐肚中茁壮成长。终于要到日子了，姐姐到医院做产前检查——胎位不正，有难产风险，做剖腹准备吧。姐姐一听害怕了，愁眉苦脸地回到家。

舅公一听是这情况，笑眯眯地说："准备三根艾条，灸脚下两个穴位，每次20分钟，睡前连灸三天。"

姐姐一听这哪跟哪呀，胎儿在肚里，灸的穴位却在脚下，隔着半个人，行吗？

但是舅公就是舅公，谁叫舅公是大夫呢！

连着三天，临睡之前，我母亲掐着表给姐姐艾灸。

第一天过去了，没有丝毫反应；第二天过去了，胎儿的头部仍朝上；到了第三天临睡前，姐姐对母亲说："我看就算了吧，已经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虽说妇科是舅公的长项，为保险起见，我还是准备做剖宫产吧。"

母亲是搞科学的，做事向来认真："既然你舅公说连灸三次，咱就把它做完，这不还不够次数吗？"在母亲的坚持下，姐姐灸完了第三次。

临睡之前，姐姐对母亲笑道，明早听我的消息。

半夜姐姐起夜，习惯性地用手摸一下肚子，这一摸不要紧，那个硬邦邦的头没了！下去了？她惊叫起来，母亲被惊醒了。什么时候头下去了？转了180度，真是神了！

这个胎儿就是高晓松。晓松因此得意：知道我为什么聪明？打娘胎里就受到名家的调理！

施今墨年岁大了，来清华的时候就少了。在他的众多弟子中，尤以其大女婿祝谌予最得其真传。祝谌予不仅传承了他的医术也继承了他的医德。

1966年，我在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读高三，每两周返家一次。该年4月，我在校内生病。校医诊断为重感冒，开了药，嘱多喝开水多休息。我老老实实在宿舍里躺了个把星期也不见好，好不容易挨到周六回家。

周日，大表姨夫妇（祝谌予夫妇）从城里来串门，父母照例留午饭。饭桌上，我病歪歪食欲全无，母亲解释说患重感冒，食欲不佳。表姨父仔细看着我，令我伸出舌头，又拨开眼皮看，一挥手："跟我上楼！"

我跟他进了厕所，嘱撒尿。表姨父弯下腰细看马桶里的尿液，然后"嗯"了一声下楼。回到座位，表姨父郑重地告诉父母："这不是重感冒，是肝炎！最近城里肝炎流行得厉害，他一定是传染上了。"为慎重起见，他建议父亲马上带我去验血，查肝功能。

父亲不敢怠慢，带着我去了校医院。拿回结果一看，转氨酶3900多，是急性黄疸型肝炎！表姨夫对我说："你现在正处于传染期，得马上住院隔离！"见我有些紧张，他笑道："不用紧张，吃我的药，

包你好。记住，到了医院，他们给你开的西药，你全别吃，吃了，我的药就不灵了，还会留下后遗症——肝硬化。”

这天，表姨夫一直忙到天擦黑才离开。

我住进了清华校医院肝炎病房，校医院书记张寿昌早就耳闻施今墨、祝谌予翁婿俩的医术，对祝大夫的要求很尊重，同意我住院期间只服家里送来的中药。两周过去后，我的转氨酶降低，恢复正常。和我同屋的是两位在清华协作的工程兵军官，比我早来两星期，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看我吃中药，也要求改方案。他们服药后效果同样神奇，两周后出院。

此时肝炎悄然降临清华，校医院肝炎病房人满为患，病情大有进一步发展之势。张寿昌从我们三人身上看到中医奇效，遂与祝大夫商议，请他来清华协助治疗。祝谌予时任北京中医学院（今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长，慨然允诺，并在清华校医院开设了中医肝炎门诊。自此，祝谌予奔波于东直门与清华之间，直到“文革”，大家忙于革命，治病退居末席方罢。

经过祝大夫的一番治疗，病人纷纷痊愈，肝炎在清华园得到了抑制。为防患于未然，祝大夫又提出在各个学生食堂用大锅熬中药，组织学生早晚到食堂必喝。说来也神奇，清华再也没有人染上肝炎，躲过了当年北京的这场灾难。

1966年的清华在校生，你们还能回忆起：在火热的大字报没开始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食堂门口大铁锅里每人必喝的那碗茵陈汤吗？

故事还未结束。当年表姨夫许诺我说不留后遗症，此言不虚。与我同时得急性黄疸型肝炎采用非中医疗法的人，不少后来转成肝硬化。而每当医生为我体检碰到我柔软的肝部时，总是疑惑于我曾经患过急性肝炎，怎么恢复得如此之好？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

“文革”中，清华大批教师在江西鲤鱼洲得了血吸虫病，肝脏受损，父亲的学生万锦堃就是其中之一。父亲爱惜他，将他介绍给祝谌予。万锦堃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迟迟没有去，父亲就到祝大夫那儿把方子抄了回来。方子分干、湿两类（一种针对大便干燥，一种针对大便溏稀），系祝谌予根据多例为清华教师治疗经验总结得来。父亲不清楚万锦堃属哪种，将两张方子都转交给他，嘱按情况斟酌使用。

30多年过去，万锦堃说他始终珍藏着这两张方子和老师的便条，每每念及，心中便涌起阵阵暖意。

“文革”期间，祝谌予遭到不公平待遇，一家6口被迫挤住在两间小屋中，但他仍用休息时间在家中给找上门来的病人看病，并坚持下来。19年中，他在家中接待过的病人达5万人次，平均每天7人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分文不取而且拒收礼物！

1966年初，祝谌予已被内定为301医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首任中医科主任并负责筹建中医科。命令未及发表，“文革”来临，胎死腹中。他于1975年到北京协和医院任中医科主任，晚年又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北京市主委，忙碌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在家中的义诊始终未停止，来者不拒，直至离世。

清华子弟毕可纫只要一提到祝大夫就激动不已。毕可纫的父亲是清华老图书馆长毕树棠。抗战期间，毕树棠衔校长梅贻琦之命留守清华园与日寇周旋，是梅贻琦信得过的人之一，为清华立有大功。这在日后却成了毕树棠的罪名。

1973年10月中旬，饱受冤屈的毕老先生突发脑溢血，所幸抢救及时，命保住了，却半身不遂。毕可纫夫妇竭尽全力将父亲接回家，定期从校医院拿点药安慰父亲那颗绝望的心。日子就这么凄惶地过着。

又是一天取药日，毕可纫遇见了张光斗夫人钱枚茵。钱听说毕树棠的病情后摇了摇头，建议她另想办法。毕可纫也摇头，说我们现在

这个情况能有什么办法？能拖一天算一天吧。钱将毕拉至一边，悄悄地告诉她：“你去找陆先生！”

陆先生就是我母亲陆士嘉。

毕可纫夫妇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我家，应门的正好是母亲。

母亲态度很和蔼，听完他俩的介绍后转身上了楼。毕可纫回忆说她一看见陆先生转身就知道父亲有救了，陆先生没有嫌弃他们，她上楼安排去了！那个温暖的背影永远刻在她的心上。

果然，等了一阵，母亲从楼上下来，交给他们一封信，嘱马上去找祝大夫。

两人欣喜万分地来到医院。祝大夫一边看信，一边听他俩介绍病情，最后点点头说：“事不宜迟，马上治疗。”

毕可纫夫妇连连说：“您看哪天方便？我们把父亲送来。”

祝大夫挥手拒绝：“老先生年岁已高，这种病不宜搬动。还是我去吧！”

两人惊得目瞪口呆。

转天晚上，祝谌予带着儿子祝肇刚登门，直奔病人，一眼没看家属精心准备的水果和点心。此时是11月中旬，距离毕树棠发病正好一个月。

都说中医见效慢，毕家做了长期服药的准备。谁知效果惊人，中间只调了一次方子，到1974年元旦前后，老先生便能坐起来了。鼓舞人心啊，接着喝！又过了一个多月，到农历新年时，毕树棠便能架着拐杖行走了。前后不过三个月！

此事轰动清华园，毕可纫说那段时间她家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有看奇迹的，有打听祝大夫的，也有直接来抄方子、照方抓药的。方子虽被抄走了，却没听说有吃好的。

辨证论治，一人一方，量身定做，中医就这么神奇！

施今墨幼子施小墨，从清华附中毕业后考上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先学西医，再随父亲研习中医，几十年下来，于治疗肿瘤、糖尿病及不孕症方面颇有心得，并带了徒弟若干。其中一个，姓吴名有朋。

吴有朋大学学的本是推拿，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拜在针灸国医大师贺普仁门下。贺的最大成就是将以前仅见于医书、失传了1000多年的火针，经多年揣摩试验，恢复应用于中医临床。该法对于一些特定病症有奇效。见吴有朋宅心仁厚，贺师遂将此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经几年修炼，吴有朋掌握了针灸的妙门。难得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为补自己在方剂方面的不足，又辗转投到施小墨门下学习。此时的吴有朋，已是一名远赴南洋行医数年，凭银针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诊所，日进斗金、声名远播且年仅25岁的单身贵族，他重新回到提皮包、抄方子，且没有收入的学徒生涯，一学就是三年。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有几人能做到？吴有朋说："人要舍得。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如今，吴有朋已成施小墨学术传人，已在同仁堂坐堂多年，虽不敢说手到病除，但有效率能达八成，病患应接不暇；他跟着师父继承了施门和清华的关系，为不少清华人解除了病痛。

何东昌被帕金森病折磨了很多年，我从国外回来去看他时，几乎不敢相信一贯精神健旺大名鼎鼎的何部长，我所熟悉的何叔叔，竟然被病魔折磨得让人不忍卒睹。痛心之下，我去找吴有朋，问他能不能针灸治疗，他说以前没接触过，要容他想一想。

两个月后，吴告诉我，他最近跑图书馆查了不少资料，又和贺老讨论过，对帕金森病有了初步想法，如果何东昌及家属能够接受，他愿意试一试。

何东昌信中医，更相信施门弟子。在他的同意下，吴有朋每周一次上门诊治。真的是针过见效，每次针灸之后何东昌就觉得好受多了，连续几周下来，何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何夫人李卓宝阿姨提出既然针药有效，能不能治治他的前列腺？这是目前困扰全家的大问题。

至此我们才知道，因为前列腺问题，何东昌频繁起夜，到了厕所又尿不出来，折腾十几分钟尿出一丁点儿，躺下不久又要起来，反反复复，最多时一夜折腾达17次！两个看护阿姨加上李阿姨，三个人整夜不得休息，加上病患，四个人皆疲累不堪。吴很谨慎，说回去跟施老商量后再说。

吴回来后和师父施小墨讨论了几次，结合针灸，开出了一张可同时治疗几种疾病的药方……奇迹出现了，那几天，我每隔一两天就电话问候李阿姨，李阿姨如实相告：第一天何东昌破天荒地只起来两次，第二天和第三天4次，最长的一次是7次。电话中李阿姨很知足，不停地说谢谢。

过了几周后，何东昌的起夜稳定在两三次，帕金森病所致的肌肉、关节僵直也减轻许多，何东昌又能用筷子吃饭，拿笔写字了，甚至有一次自己穿好衣服坐在书房里看书，而在此之前他穿衣要靠家人帮助，得折腾半天。更可喜的是，大便秘结的问题也大大舒缓，以至于有一天晚饭后，何出了口长气说："终于吃了顿饱饭！"原来他怕便秘，已经一年多没敢吃饱饭了。何东昌的底子本来就不错，经过中医这么一调理，逐渐好转，直到他搬家离开清华，没再出大毛病。

前面说过，施今墨乃民国时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其他三位，为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

1956年2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宴请参加大会的几位医学界委员。席间，他笑着问坐在两侧的施今墨和张孝骞：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呀？施今墨知道主席这一问，看似玩笑，其实含有深意，是关心中西医团结，连忙回答："主席，我们不是冤家，我们是老朋友啦！"主席闻言，欣慰地笑了。

施今墨此言，并非虚应。他与张孝骞的友谊，要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948年12月，施今墨接诊一位沈姓年轻病人。其病已年余，开始只是下肢无力，继而发展成走路困难。施今墨切脉时，发现其关、尺两部沉涩无力，加之患者双腿温度异常，肌肉弹性下降，辨证为脾肺两虚，肌腠失养。他遂提笔给张孝骞教授写了一封请求会诊的信，要徒弟持此信陪该患者去协和医院，请张教授看看是否属于“进行性肌萎缩”。张孝骞接诊后，对患者仔细进行了检查，确诊为就是西医所定义的“进行性肌萎缩”。他告诉随患者同来的施今墨的徒弟：“病人尚处于疾病的初级阶段，临床体征并不明显，施先生仅凭物理诊断的细微变化，就能判断出这么严重的疑难大病……你回去转告施先生，改日我定登门拜访。”

事后方知，张孝骞早就从好友黄家驷处听说，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设有西医课程，他甚至还看过该院的西医教材。张孝骞因此对施今墨的中西医汇通主张很是钦佩。以此次沈姓患者为契机，此后施张两人便经常交往、互相会诊。张孝骞还介绍其儿媳找施今墨调理她的妇科病。施今墨则把自己的爱徒介绍到张孝骞门下，学习西医。

施今墨说：“无论中医、西医，其理论正确，治疗有效者，皆信之；反之，摒弃不用，可也。”他本人从事中医工作，但思想开明，绝不排斥西医，与黄家驷、林巧稚、诸福棠、孟继懋、姜泗长等西医名家皆是好友。

由于父母的关系，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医，了解疗效，因此对中医十分信任。但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自从一百多年前西方医学传入中土以来，颇有一些国人视老祖宗传下来的这门学问为异端，把洋人洋法奉为圭臬。尤其是近些年，中医药及针灸在西方渐渐普及，却在自己的母国遭到口诛笔伐，真是咄咄怪事。难道要等到某一天，中土的黄种人先吭哧吭哧学英法德俄日文，再费力用外文跟着

海外的黄人、白人、黑人，学针灸、学号脉，被老祖宗从地底下钻出来打脸么？

或许，希望就在吴有朋辈的身上，有他们承上启下，中医将大放异彩。

病除

舅公施今墨自“文革”初期被抄了家，便搬到了建国门外的灵通观，算是有了个安身之处。虽只有三居室，他仍辟出一间，坚持接诊，为病患服务。母亲自幼丧父，姥姥也在十几年前过世，她只剩下我舅公这唯一的至亲。眼看舅公落难，她放心不下，可又自顾不暇，就嘱我常常过去看看，向她报告。

我那时在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上学。学校在崇文门外火神庙，今我家住郊外清华，每天骑车穿城往返。那时年轻，“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倒也不觉累。因此我便隔三岔五跑到舅公家里转转，有时也混个饭什么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不管病人有多少，时间有多晚，舅公那永远不疾不徐的声调和挂在脸上的笑容。那发自内心的慈祥的笑，我相信见过这笑容的人会永志不忘。舅公一生救人无数，下面的两件小事，是我亲历，权充妙手二证吧。

初夏的一天上午，门铃响处，踉踉跄跄闯进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是舅公的徒弟丁福生。他没等气喘匀，就急急请舅公救救他姐姐。而他姐姐呢？此刻正躺在某医院的产床上，命悬一线！由于难产，他姐姐羊水也流光了，医生要剖腹救大人，可他们是大人小孩全要保，还不肯剖腹。百般无奈，只好来找师傅救命来了。

舅公听他说完，不疾不徐道：“我给你个方子。但是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一步都不能差。”徒弟唯唯。舅公念完方子，又叮嘱道：“抓了药，你亲自煎好，她喝了以后两小时应该重新有羊水，4小时左右生产。要是过了6小时还没动静，我就没办法了，赶快剖宫产。”丁福生刚出门，舅公又把他喊回来交代：“一定要到同仁堂去抓，方子不能离开柜台，也不能让人有记方子的机会。抓完药你就得把方子毁

了，不许留。她吃下药后，你一小时打一个电话回来报告，记住了？”丁福生仍唯唯，奔出门去也。

后来，某医院上演了一幕“舅公妙手回春，众医目瞪口呆”的大戏。我曾问过舅公为什么要把方子看得那么紧？他微微一笑：“福生姐姐的脉我看过很多次，心里有数，才敢不号脉就开方子。这方子只对这人、这事有用，还不敢打包票。一人一药，换了人就不能用，用在别的病人身上就得出人命。药铺和医院的人不知道这些。同仁堂是想收我的方子，但是这个方子不能传出去；孩子生下来，在场的西医也一定会要这个方子，要是传出去，更不知误了多少人了。误人还得说是施某人的方子，坏了我的名声。”

姐姐张克群是梁思成的学生，1967年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在分去了大庆油田之后，她很快融入工人之中，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一对山东夫妇，和她特别要好。男的叫徐阳山，8级木工；女的叫张平，4级焊工。两口子均40上下，郎才女貌正当年，家庭和睦，一儿一女，不但干活是人人都称赞的好手，处事更是有口皆碑，整个大庆油田怕也找不出第二对来。许是老天爷看他们日子过得太完美了，偏偏生出事来，让张平得了一种怪病。这病啊，肚子老痛，人瘦得皮包骨头，但看遍了东北的大小医院，花钱无数，还是无法治愈！人折腾半死，也查不出是什么病，这药那药吃了不少，统统没用！姐姐热心，夏秋之间，介绍她来北京找舅公诊治，让她住在我家。

这天，我陪着张平去舅公处，说明了病情。搭上脉，舅公闭上了眼，又反复切了左右手的脉，缓缓对我说道：“你带她明天早上再来一趟吧，早点儿来。”带着一肚子狐疑，我们隔日一早又去了。一进屋就傻了：满屋子的人，全是舅公的徒弟，他在北京的年轻徒弟全来了！见我们到了，舅公发话了：“你们挨个儿号她的脉。要好好体会，好好记着。这个病，我活了80多岁，这是第二回碰到。第一回是我十几岁学医时碰到的。你们也许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这个病。我昨天之所以没给她瞧，为的就是叫你们今天都来见见这个病人、这个

病。”徒弟们开始一个接一个轮着号脉了，舅公靠在躺椅上慢慢解说：“她这个病，是肚子里长了虫子，绦虫。但是这条绦虫跟一般的绦虫不一样，叫短膜壳绦虫。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医院都治不了她的病，都当普通绦虫治了。她身体里的绦虫跟普通绦虫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头有个钩子钩在病人的肠子上，进到肠子的营养，全叫它吃去了。这虫子得了营养，就开始长身子，每年长一节，越长吃得越多，所以病人就越来越瘦。杀这个虫子不难，用山道年即可。可是有个问题，你用药轻了，杀不死它，只能把它的身子打掉，头还钩在病人的肠子上继续长；用药重了，连病人都杀死了。所以这个病能治，但去不了根。这山道年呢，也简单……”舅公转头叫张平：“你记住我这个方子，收好了。你到河北×县×村（老人家说得很具体，我忘了）去买那儿的南瓜子，5斤就够。拿回家，炒熟了，就当瓜子嗑着吃。一个月吃完。我算着你肚子里的虫子从小跟着你长大，应该跟你年龄差不多，得有40多节。从吃药算起20多天以后，虫子就会开始打下来了。你从第20天起就用便盆解大便，然后用棍子拨着数打下来虫子有多少节，直到数不着为止。大概得两个月左右。到时候你给我写封信报告一下打下来多少，我要看看。”舅公喝了口茶，接着嘱咐：“虫子打下来后，你身体就会好起来，人胖起来，脸色也会缓过来。但是这绦虫的头还在，等它缓过来，还会慢慢再长。等它长到20多节了，又会影响到你的身体。那时你用这个方子再治一回。这一辈子，可能还会用到这个方子几回，你一定要收好。”

几个月以后，张平从大庆来信了，虫子打下42节。

谁想到，此故事近日还有续篇。

2018年秋，张平的二女儿辗转找到了我。兴奋之余，她携年已八十余岁的张平来京，参加了施老遗孀96岁的寿宴。说起当年施老的救命之恩，张平涕泪横流，并说当年的方子她还留着，回去一定翻箱倒柜找出来，送给施小墨研究。

经过数月辛苦，在2019年年初，张平终于将方子找到。我们准备安排个献方活动，为此故事完美收尾。

第二辑

钩沉

为那狂飙的历史，为清华知识分子，借我之眼，做一注脚。

万字号

听说过“万字号”吗？

20世纪60年代初，清华大学在校学生首次突破万人，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万人学校之一。校长蒋南翔借由中国人首次登上珠穆朗玛一事，在清华大学大胆提出培养“科学登山队”的想法，针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将优秀生分成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是那些勤奋好学，成绩优秀者。这些学生在班级表现突出，可谓百里挑一。鼓励他们多看参考书，多做习题，将他们作为未来红色工程师的培养对象。

第二梯队是成绩优异者。除了会念书，他们爱好广泛，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系里崭露头角，可谓千里挑一，号称“千字号”。系里为他们增设选修课、自修课，将其作为研究生的培养对象。他们毕业后大多留校，将来往教学科研方向发展。这是种子选手。

第三梯队也是峰顶，是极个别的超优生。他们出类拔萃，凤毛麟角，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钻研有着异乎寻常的能力，可谓万里挑一，为校级“因材施教生”，号称“万字号”，这可是作为科学家领军人才苗子培养的。学校为他们单独“开小灶”，蒋南翔校长亲自为其审定教学计划，允许跳班，可以提前毕业，指定教师专门开课辅导，在生活上有特殊照顾。

一时，“万字号”成了万人瞩目的对象。

祁力群赶上了这趟班车。

祁力群1962年毕业于百年老校——扬州中学，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喜好数学，自学过微积分，是班上的学习骨干。因成绩好，引来团支书的嫉妒，压着不让他入团。好在那时候上大学对此还没有特殊要求，作为群众的祁力群也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进入大学后，祁力群发现班上同学各个都很厉害，相比之下自己那点曾引以为傲的知识微不足道。好学上进的他开始偷偷用功，常常为了想看的书跑出很远。那时候可去的地方不像现在这么多，看书的地方不好找，他最常去的地方一个是图书馆，另一个就是僻静的生物馆。

第一次数学摸底考试，老师为了给来自全国的“高才生”一个下马威，题出得很难，很多同学不及格，而祁力群却得了满分。他一下子被老师记住了。

第二年，全校举行数学竞赛，大二的祁力群也参加了，和高年级的同学一比高低，结果他拿了全校第一。这一次他出名了，学校来人找他谈话，谈他下一步的学习目标，谈如何完成研究生课程等，还派专人辅导他。祁力群在一片懵懂中成为校一级的“因材施教生”，人人瞩目的“万字号”。

人选确定后，校长蒋南翔召集座谈，参加的学生不是“千字号”就是“万字号”，祁力群是这些人中年龄最小的。

会上蒋校长说道：“清华有三支队伍，一支队伍是辅导员队伍，这是一支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双肩挑的队伍，是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第二支是体育代表队、文工团队伍，清华的张立华拿了亚洲自行车比赛第二名，我们要不断取得好成绩，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第三支队伍，也是最主要的队伍，在学术上我们要出第一流的人才，出中国自己的科学家。”

校长讲完话后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提，自由畅谈。

祁力群听懂了校长的意思，他知道自己该朝哪方面努力，可想起自己至今还不是团员，现在提倡又红又专，隐隐有些不安。祁力群举手提问："请问校长，什么是又红又专？我理解'专'是努力钻研学好数学，'红'是什么？我现在还是群众，入团了是不是就代表'红'？'红'，要红到什么程度？我还需要入党吗？"

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现场开始一片肃静，继而出现交换意见的低声，看来大家对祁力群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

蒋南翔沉吟了一下说："'红'就是爱国，'专'就是把书念好，用你的知识为国家服务。对你而言，可以不要求入党！"

就这么简单？不仅同学们不相信，就连祁力群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

祁力群后来回忆道："蒋校长的回答让我一下子放下了包袱，我想这个简单，爱国我是没问题的。回到班里后，那些团干部却不高兴了，说怎么爱国就行了？我们要做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准备！"

若干年后，当年的辅导员、后来的清华党委书记方惠坚老师解释道："蒋南翔有个'三层楼'说法。第一层楼就是要求学生都做到爱国，这是最基本的。高一层的要求就是接受社会主义。当时与港澳台还未恢复往来，你可以要求港澳台的学生爱国，但是不能要求他们一定接受社会主义，但是对我们的学生来讲，大多数能接受社会主义。第三层楼就是共产主义。愿不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这个是稍微少数一点的学生能接受的。这就是'三层楼'概念，三个境界，到现在我们还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他为什么说爱国就行？因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次座谈后，祁力群放下包袱全情投入到数学王国，系里安排他提前修完高年级课程。为配合学习，"万字号"比其他同学多出两个借书证；不仅可以多借书，还能进到老书库查阅资料；要知道，当时的清华，只有正教授才有资格出入老书库哪。

19岁的祁力群像鱼儿游进了大海一样欢畅。

学校为了帮助他进步，安排他下乡、访贫问苦，了解中国的状况。一同下乡的学生中有书念得好的，也有干部子弟、文工团成员、体育代表等，祁力群和大家相处很好。大三的时候他入团了。

“因材施教法”从开始执行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终止，五年间共遴选出三个“万字号”。他们是：数803的祁力群，力501的苏铭德，汽7的李文昌。“文革”爆发后，该方案被批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从此终止。

三个人各有特点：

祁的数学概念清楚，是1964年获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

苏在力学上涉猎很广，尤其对流体力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超强的理解力；

李的语言能力极强，掌握了俄、日、英、德4门外语，皆能熟练运用。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学能力强，学习进度远超其他同学。

当时清华共有12个系，三个“万字号”数力系占了两个，这让兼任系主任的父亲张维既高兴又感到责任重大。他格外关注这两个学生，不时谈起他们。我也因之记住了这两位的大名。

天有不测风云，事情并没按既定轨道发展。

“文革”一来，一切停摆。父亲既是“黑帮”又是“反动学术权威”；蒋南翔更是跌入人生低谷，先是在教育部烧锅炉，后又发配到清华机械厂铸工车间抬铁水包。“万字号”也不再享有特权，各奔前程。祁力群被分配到兰州炼油厂，第一年进车间当工人，第二年到了自动化研究所，但是与他喜爱的数学无关；李文昌被分配到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只有苏铭德“文革”前毕业后留在数力系，专攻湍流。

无书可读的祁力群迷茫了，他想念清华，想念徜徉在清华图书馆的分分秒秒，他更想念鼓励他攀登科学高峰的蒋南翔校长。

有一年借探亲之机，祁力群途径清华，探知蒋南翔下放到车间劳动去了，祁力群不敢去看他，怕惹祸，更怕给他添麻烦。就在祁力群闷闷不乐的时候，在荷花池边竟偶遇刚从校医院看病回来的蒋南翔！激动得差点无法自制。可是蒋南翔已经不认识他了。当祁力群报上自己的名字后他很干脆地说：“你跟我来，去家里！”

进屋后，祁力群劝他承认错误，以期早日恢复工作，因为报纸上都在批判蒋南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蒋南翔表示愿意检讨自己的错误，但是坚持认为工农兵教育制度有问题。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蒋南翔拿出一封写给主席和总理的信给他看，信中有一句“犹有驰骋千里之志，战士暮年，犹有补过报国之心”，这句话让祁力群铭记终生。身处逆境，仍怀报国之心，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战士抱负，让他对蒋校长始终充满敬意。

1977年秋，“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布结束。祁力群听闻蒋南翔重新出山担任天津市委常委，立即写信问候，蒋南翔收到信后让他速来天津见他。

我问祁为什么要给蒋写信。

答曰，蒋校长懂知识分子。

果不出所料，蒋南翔听说祁力群想回到科研队伍来时，当即拿起电话打给父亲，要他帮助安排。

父亲此时已回到了工作岗位，重新担任清华副校长，见到这个昔日的“万字号”自然非常关心，详细询问了祁力群的经历和近况，告诉他，清华正需要年轻人接上“文革”造成的断层，建议他回清华做教学和科研。祁力群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同意回清华做赵访熊教授的助手。

要想从兰州调回北京并不那么简单，蒋南翔深知其中的难处。1977年10月蒋南翔趁到北京参加林枫追悼会时，抽空打电话给我父亲，要他通知高景德、李寿慈和祁力群到其下榻宾馆谈话。父亲放下电话后连忙写一张条子交给我，要我火速骑车到清华甲所去找祁力群（临时住处），让他马上去见蒋。

最后，历时一年之久，直至惊动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祁力群一家四口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清华。

回到清华后的祁力群一头扎进了数学研究中，父亲提醒他要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写论文没问题，可写英文论文就不那么简单了。

黄克智回忆：“有一次去张（维）先生家，看见他正给祁力群一字一句地改英文论文，一点架子都没有。”

祁力群不负众望，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获得了去美国进修的机会，1984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解非光滑非线性方程组的半光滑牛顿算法，于2003年被国际权威数据库评为十年内世界上被引用率最高的数学家之一，这一人数总共仅二百多人。他在2005年提出了高阶张量特征值概念，该概念在物理、超图谱理论等方面得到应用。

2016年9月我们赴深圳大学采集父亲的材料，校友总会的田星燕帮助联系上了当时在香港理工大学任讲座教授的祁力群。他和夫人专程从香港赶来深圳与我们相见。

暌违多年，祁问我，还记得你给我送条子的事吗？搜尽脑海哪里还有印象？“文革”中，父母谨慎，常写条子嘱我送到有关各家，送的太多，早记不得啦。祁遂讲出旧事，引发了我的回忆。

祁力群感慨万分：“若没有清华师长的关心爱护，难以想象今天的结果。所幸没有辜负蒋、张两位校长的期望，始终坚持攀登科学的高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尽自己绵薄之力。”

噩梦

“文革”于我，是场噩梦，也是人性解密、善恶解读。

1966年“文革”初期，父亲既被定性为“黑帮”又是“反动学术权威”，不知根据什么。银行户口就此被冻结了。母亲不甘心，找出一张600多元的定期存折，嘱我去清华储蓄所取50元试试。填好单子交进去，眼看着第一关审核、第二关复核过了，等着放款，不料却有第三个人，一手拿着单子，一手在另一张纸上顺着捋。我正在胡思乱想：还有手续？忽见那人站起来问：“谁取张维的钱？”我急忙举手，只听一声断喝：“张维的账号冻结了！别想蒙混过关！”顿时四周一片静默，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真恨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

噩梦自此开始。

这年的8月下旬，我从城里回来，家里一片狼藉，客厅里散乱着书，一上楼就见父亲被两个红卫兵用棍子按着头弯腰站在走道上，其他红卫兵正在各屋翻箱倒柜，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再去那边看看！”定睛一看，竟是一个近亲！逢年过节他常随他父母来我家做客，乖巧懂事，被我父母称赞有出息。我俩年纪相仿，他来了之后便钻进我房间俩人神侃。见我回家，他头一偏，装着没看见，匆匆带着人离开了。父母早年在德国的所有照片及幻灯片（还是彩色的），记录着他们的青春回忆，放在小手提箱中，因此劫而永不复见。母亲每忆及此，便痛不可言！

不久父母便每月只得生活费，入不敷出，母亲开始琢磨变卖点物品换钱。可家中但凡值钱的东西，诸如工艺品、相机、电视机，甚至

父母从德国带回来的不锈钢餐具，几经抄家，早已不知去向。母亲一向不戴首饰，家里也没金银、外币，举目四望，只剩下书；可“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越多越反动”，想卖也没人要。

这时接到“造反派”的命令：腾地方。原来一家独住的小楼要搬进另外三家。

家具往哪儿搬？看着满满的家当，母亲几乎崩溃，父亲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高兴，家具能卖钱！就这样，席梦思床架、沙发还有樟木箱子等陆陆续续被贱卖，暂缓了家里的经济窘况。

俗话说，坐吃山空，何况区区这点钱！

一天，父亲小声对我说，咱家没钱了，你和我一起找找吧。他带着我搜遍了楼上楼下，终于在楼下一堆杂物中找到一元钱。我们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父亲举着那一元纸币，沉痛地说：“克澄啊，这可是咱家最后的钱了！今后，要是能有那么一天，咱家又有了钱，可要省着花，千万不能忘了今天哪。”

几十年过去，情况早已今非昔比，此景却刻在我心中，闭上眼就能看见当时的那一幕，屁股仍能感受到当年水泥地上的凉意。

可堪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的，是儿子谨遵他们的教诲，虽然生活好了，也绝不乱花钱、臭摆谱。

1968年年底，为响应毛主席号召，我去山西插队，临行前向仍被“造反派”关着的父亲告别。父亲瞅准一个机会对我说：“你记着，我要是死了，就是被人害死的！我绝不会自杀，一定要等着看到结果。”

我人在山西，始终放心不下母亲的心脏病和父亲的命运，趁着春节回北京探亲。

那时吃饭是要粮票的。为了控制城市人口流动，各省市配发自己的粮票，出省则需要全国粮票。农民没有粮票，需要时只能到当地粮

站用原粮按比例换。

一大早，我就拉着拉拉车（北京叫排子车）冒着冬日晋南的晨霜上了路。车上麻袋里是105斤小麦，几个小布袋分别按比例装着小米、绿豆、高粱等，可以换来100斤全国粮票。公社粮站在翟店村，离我们村十里地，虽是土路但地势平坦，倒不算太远，紧赶慢赶总算在粮站8点开门前排在第五位。

8点整，锁开了，却不让我进，要等管事的到门口来叫。只见不断有人进去，跟管事的说上几句，那人一招手，他的车就进去了。如此这般，太阳升到头顶了，我还排在第五，肚子却开始不安分了。原以为中午可以打来回，便没带干粮，这可怎么办？我请教排在前面的大哥，咋是这么个规矩，这队咋不管用呢？大哥说是得送烟！我素不抽烟，送啥牌子好呢？大哥又说至少得是海河牌的。唉，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

买了两盒海河烟（每盒两角六），硬着头皮进了院子，一边恨自己没出息，一边凑到管粮员跟前，递上去，嘴里学着当地人，说出让我今天想起来都脸红的话："请抽颗烂烟！"

这位身穿制服、行政28级月薪26元的大员，上兜里露着烟盒，两耳上面架着两三支烟，斜瞄了我一眼，深吸了一口手里的烟，转过头，把脸凑到几乎碰到我脸的距离，缓缓地把烟喷到我脸上，伸出夹烟的右手拨开我递上的烟，轻轻地、耳语般地说："对不起，不会抽烟！！！"

那一刻天旋地转，彻底颠覆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挨到下午5点，粮站关门了，我才进步到第三位。

一路上，我暗下决心，不管今后发生什么，绝不再让人如此欺负，也绝不欺负人！

回到村边，天已全黑了。肚里没食，拖着的车似千斤重，腿软得像面条；头上星星在闪，眼前金星乱冒。

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家里已经没有我住的地方。我和父母三人挤在楼上那间屋，聊到半夜才睡下。刚躺下不久，楼下传来敲门声，是查户口的。来人拿着户口本，上下打量了父亲好一会，方才开口问道：

谁是张维呀？

我是。

那人又打量了父亲好一会儿，鼻子里哼了一声，哦，你就是张维。又指了指我：

这是谁呀？

我儿子。

在哪儿工作呀？

山西插队。

回来干什么？

他妈妈身体不好，回来看看。

有介绍信吗？

有。

看了一眼介绍信，那人冲着我厉声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妈妈有国家照顾，不需要你这类孝子贤孙，赶快回山西抓革命促生产去！马上给我回去！"

一向温文尔雅的父亲待来人走远后，爆了粗口："他妈的，这个王八蛋！装不认识我！原来离八丈远就跑过来巴结……"此人是"文革"前清华的校卫队长！

父亲随大批教师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那里是血吸虫疫区，在田间劳动的人大多染上了不同程度的血吸虫病。父亲是“特嫌”，只配喂猪，不准下水。虽然酷暑难耐长了一身痱子，却幸免于难没得血吸虫病。

干校因血吸虫病难以为继，撤回北京，父亲被派押运行李，搭闷罐车走走停停，一周才到达。时值盛暑，又闷又热，父亲的痱子更加严重，背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脓疮，回到家只能趴在床上哼哼，母亲和我隔一会儿就要用温毛巾给他擦去脓水，折腾得一夜不得安宁。

干校在北京郊区继续办，父亲的背疮疼痛难忍，如何干得体力活？我自告奋勇去找小组长请假。此人乃父亲的学生，留校当助教，过去常来家中请教，和我很亲近。有这层关系，又是情非得已，我想请假应不是难事。不料他听了我的申述后，却把眼一瞪，手指着我厉声喝道：“你回去告诉张维，明天早上6点准时到停车场集合，一分钟都不准迟到！”我万没料到他会如此发狠，一时不知所措，事后还心惊肉跳了好长时间。

正不知此情此景何时是个头，1971年父亲突然被宣布“解放”，任革委会副主任。

这突如其来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让父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事后很长时间二人才知道，此事得缘国务院成立科教组，钱学森、迟群同为组员。两人此前不识，交谈时钱问迟，你在清华工作，张维怎么样了？迟完全不知张维何人，反问道，你和他很熟吗？钱回答，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来往也多，他能有什么事啊？见有钱作保，迟回到清华就着人查张维何许人也，遂被解放。

迟群见父亲的第一面，非常惊讶：“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我还以为你80多岁了呢！”

1972年，尼克松要访华。学校通知和我家合住的另三家紧急腾房，说尼克松会来清华看望张维。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面面相觑，这

是从何说起，又该跟谁去解释？不容置疑，校务部门送来10斤“大白”，让把屋子刷白；又开了介绍信，让去北郊木材厂买家具，要求把家布置妥当，不能给国家丢脸。

前车之鉴，母亲担心哪天又被紧急腾房，买回的家具除了沙发外全是折叠型的。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多亏家具能折叠，几年后，吴仲华和李敏华二人的大儿吴明娶妇，借去使用，搬来搬去十分方便。

结果不用猜也知道，尼克松压根没来。

辗转听说，谢静宜不知从哪儿得的信息，说我父亲和尼克松是同班同学。父母不禁哑然！他们从未留美，同学从何而来，难道对方连父母的履历都没看过？

1975年，邓小平重出主持工作，各方面工作都有起色。清华革委会却天天开会研究如何整人，父亲很反感，不愿与其为伍，便找我大爷张度商量对策。大爷建议：“惹不起躲得起，你就说自己思想改造得不彻底，要求向工人阶级学习，下到车间去！”父亲依计而行，打了报告，下到清华设备厂劳动，直到“文革”结束。

当然，人性不总是恶的，恶中遇善，难能可贵。

父亲得背疮后去校医院治疗，因是“反动权威”“特嫌”，医生、护士都躲得远远的，没人给他看病。同“黑”的校医院原院长、一级教授、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谢祖培正被罚扫地，悄悄给父亲使了个眼色，低声说5点以后再来吧。父亲会意，如期而至。谢祖培引父亲到无人处给他处理了患处，后又按此换了几次药，父亲病痛基本解除。父亲将此事记了一辈子，到晚年和我提起，还感念不已。

“文革”已由中央文件定论，却不断有人为它“招魂”。特写此文，为“文革”中的清华知识分子，从我的视角，做一注脚。

推车

“文化大革命”的荒谬，未经历的人，无法想象，经历过的，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文革”狂飙一来，文教界首当其冲。蒋南翔时任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乃“彭罗陆杨”之首、北京市原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的爱将，分属在劫难逃。自1935年“一二·九运动”始，蒋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彭领导下工作，文教工作又接受陆定一的领导；“文革”一来，彭真、陆定一立即被打成“黑帮”，蒋南翔难脱干系，也成了“黑帮”。蒋挨斗时，组织者总不忘把彭真、陆定一等押来陪斗，是实实在在的难兄难弟。

父亲自1952年年底蒋南翔任清华校长始，此时已在他领导下工作近14年了，对蒋的教育思想、工作方法都十分服膺，尤其对蒋殚精竭虑，把清华从院系调整后只剩几个工科系和几个理科教研组，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带到“文革”前有12个系，创建了无线电、自动控制、工物、工化、数力等尖端系，设立了几十个新专业，创建了辅导员制度，培养了大批骨干教师和优秀学生，是十分佩服的。

目睹清华批斗会上彭真、蒋南翔等被斗时的状况，父亲最担心的是他们接受不了昔日人上今日人下的巨大反差而寻短见。

我时为高中生，学校在城里，每日骑车往返，父亲就吩咐我去教育部看看那里的批斗会。教育部的批斗会相当文明，按部就班、有问有答，我挤到台前仔细观听看，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颇为有趣。比如，彭、陆、蒋等人台上一字排开，彭真、陆定一本是陪斗，却似主角。批判人照本宣科念一段，便要彭真：“老实交代你反毛主席反党

反人民的罪行！”彭真遂抬头大声辩解：“我不反毛主席，我都是请示了毛主席，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吗？”然后就是照例遭到批判人大声呵斥，带领台上台下群众振臂高呼“打倒”。蒋南翔则是另一种态度，任你大呼小叫，我自一声不吭，听之任之，绝不抗辩。如此这般，一小时左右，所谓批斗会就宣布结束。

这边话音刚落，那边蒋南翔直起身拔腿就走，绕到台边下了台阶，穿过人群出了礼堂直奔教育部后院疾去。我见状，大惑不解，急忙三步并作两步拨开人群跟踪而去。只见蒋冲进后院锅炉房，推起运煤的独轮车至院中煤堆前，放下车抄起铁锹飞速将小车装满，把锹往煤堆上一插，回到独轮车后方，两手抓住车把，抬头挺胸运气，推起车一路小跑稳稳地送到后院锅炉房。卸下这车，未及喘口气，又去装上一车，这回却送到了前院锅炉房。我甚是奇怪、不解，经向别人打听，原来，教育部共有三个锅炉房，用着三个供煤工。现在辞了三人，让蒋南翔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工作的繁重、忙碌，可想而知。这批斗会占去了一个多小时，难怪蒋南翔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了。

我回家跟父亲一一报告，他大为放心：蒋南翔还能顾得上锅炉房，可见身体、心理没问题。

1975年，邓小平整顿初见成效，有传言蒋南翔要出来工作了。迟群在大礼堂前清华全校大会上点名：“蒋南翔来了没有？”蒋从人群中站了起来。迟群大声说：“蒋南翔，我在这里替你辟个谣吧——教育部有张部长、李部长，也不会有蒋部长；就是有蒋部长，也只是和你重姓！”蒋南翔默默地站着，如同当年批斗会上，一声未吭。

大礼堂前绿茵依然，历史和迟群开了个玩笑。不过几年工夫，教育部又有了蒋部长，而且不是重姓!

回想起这段40年前的往事，怎能不让人产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

2013年10月，蒋南翔100年诞辰，我获邀参加了在江苏宜兴举行的蒋南翔铜像揭幕式。

宜兴乃人杰地灵之乡，徐悲鸿、周培源等名人辈出。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蒋南翔在高塍镇的儿时玩伴虞兆中，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门。虞后来去了台湾，再后来做了台湾大学的校长，提倡通才教育。他们幼时就学的学校为了纪念曾掌海峡两岸顶尖大学的这两位教育家，特地在校园里为他们立了铜像。一条街上出了两位大教育家，家乡人很自豪：高塍镇不但出紫砂壶，还出大文人。

仰望着阳光下的蒋南翔铜像，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白云苍狗，世易时移，孰贤孰奸，青史无欺。有形的铜像固然巍峨，但在我心中，蒋南翔双脚抓地，抬头挺胸推小车的形象，比眼前的铜像更高大！

今日打虎，那些披上虎皮就口吐莲花、满腹经纶，一旦阶下，则捶胸顿足、供友揭朋者，何其猥琐，真枉为人也。三字经首字就是“人”，人没写好，整本如何开篇？追金逐色一开始，即已在人字前加了一“小”字，布下了败局。所谓“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自投”，是也。

1952年蒋南翔到清华任校长前，有一段小插曲，今天拿出来说说，也许能为他的为人，增加点注脚。

院系调整后，党中央要加强高等学校党的领导，选派一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分配到全国重点高校。

首先考虑派到清华的，是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李昌，为其安排的职务是副校长。组织上找他谈话之后，李昌未接受。蒋南翔当时也是团中央书记，排位在李昌之前。李昌不肯来，接下来就找蒋南翔征求意见。蒋当即表示，清华是我的母校，为母校服务，吾所愿也，职务高低不重要，欣然接受了安排。

名单报到中央，讨论的时候，毛泽东认为，蒋南翔到清华大学可以当校长。于是，当蒋南翔到清华大学报到时，就是校长了。

这段插曲，蒋南翔从未与人谈起，清华里几乎无人知道；是几年后人们为了写蒋南翔的传记，搜集资料时才查出来的。

以此观之，是不是可以说，蒋南翔集革命者和中国传统文人正气于一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实学人之楷模。

不忘初心

2017年7月23日美西时间22时58分，我在洛杉矶家中忽接刘春阳微信：我父病危。我心一紧，刘冰叔叔96岁高龄，且卧床不起经月，虽然心理早有准备，但仍然盼老人家熬过这一关。此后我分分秒秒关注北京的动态，希望有消息又怕有消息。零点48分再接春阳信：已去世。我闭上眼睛，阵阵心痛；春阳再来微信：机器上显示北京时间14时52分。

斯人驾鹤仙去，往事一幕幕重现，历久弥新，无法忘怀。

1956年夏天某日，我在新林院操场见一眉清目秀的男孩独自一人在沙坑玩沙子，便上前询问："你是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你？"男童答曰："我叫刘春阳，刚随父亲刘冰从团中央搬来。"一听是新来的清华子弟，遂自我介绍："张克澄，家住小河对面胜因院23号。"当时我9岁他7岁，我是春阳在清华认识的第一人，自此我们便成了发小。

一年后，新盖的公寓落成，刘家搬进9公寓36号，我家搬到10公寓14号，均在楼的最西头，隔新栽种的核桃林南北相距仅60米。鸡犬之声相闻，天天互动往来。春阳与我均好游泳和乒乓球，节假日我们总是结伴到体育馆打球或到清华游泳池游泳，暑假更不时骑到颐和园横渡昆明湖，甚至一日两次。

其时，刘冰家于我无异于自家的延伸，除了吃饭睡觉，我有很多时间都泡在那里，有时顺便延伸到刘冰家下面的常迥家。春阳下面的妹妹弟弟，也犹如胞生，被我们呼来喝去，毫无芥蒂，我们常常坐在屋里东南西北瞎聊，弟弟只有趴在床底下听的分儿。现在想来，如此

行事，真是无礼至极；当年清华园里有我这么一号，爹妈管也管不了，说了也如耳旁风，他们又忙得自顾不暇，只要我不生事惹来抗议，也就任我逍遥了。

或许同理，刘冰苗既英夫妇对我们的活动也从不干预，几个小的有我们两个大的镇着，也安分不少；我出入刘家犹如自家一般。直到“文革”，这种神仙生活方告结束，我和刘冰开始有了正式接触。

严格说，第一次接触发生在“文革”前一年，其时我正闹着要去当铁道兵。

中苏分裂，苏联停止对中国的帮助后，中国决心自己搞两弹，为了防止苏联从背后捅刀子，开始大三线建设，把重要工业设施向大西南转移。父亲和李国豪被请为成昆线的顾问，1965年夏秋在工程兵和铁道兵领导的陪同下，他们到四川、云南调研考察。在西南的大山里转了几个月。回来以后父亲讲了很多解放军战士为加快工程进度舍生忘死的故事，说成昆线桥连洞洞连桥，几乎每个隧道口都有烈士墓；施工之艰巨，工程兵铁道兵官兵之英勇，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那个时代，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反复看了几遍的我本就燃烧着英雄情结，父亲的一番话更是激发起我当铁道兵的决心，我想把一腔热血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6年春节，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来家里拜年，我缠住他要去当兵，当即获允。

父亲在旁边一句话没说。

没过几天，刘冰来家说要和我单独聊聊。

他先夸奖我要去当兵，有志气：“现在全国学解放军，用实际行动学习解放军，很好。”然后话题一转，说党教导我们，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解放军需要知识青年，祖国建设更需要知识青年；你书念得不错，应该先参加高考，让祖国挑选，如果能考上大学，考上清华，就能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我对老革命一向崇拜，听他苦口

婆心一番劝导，也知道他必是父母搬来的救兵，可当兵是我打小的愿望，好容易有了机会，哪甘心放弃？我嘴上不说，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情愿。

未几，“文革”进入实质阶段，高考停了，刘冰和我父亲相继靠边站，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崽子自然也就被剥夺了当兵的资格，此事遂告寝。

“文革”开始后我和刘春阳同病相怜、无学逍遥，更是常常泡在一起。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我和春阳在他家里收听。刚刚开播，刘冰和胡健恰好从北京新市委开会回家。一进家门，我告诉他电台里正在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他听了一愣，立即坐到进门的单人沙发上，示意我们噤声，一动不动一言未发，静静地听完，抄起衣架上的外衣，留下一句“今天晚上不要等我”，径直去了甲所（当时清华大学党委所在地）。第二天我从春阳处得知刘冰一夜未归。

从这时起我开始注意大人的想法了。

1967年3月的《红旗》杂志，点了“蒋刘高胡何艾”[注]。当刘冰翻开杂志，亲眼见到这份权威杂志上白纸黑字点了自己，将杂志扔到床上，站起来一把抱住我，默默流泪，嘴里喃喃地对我说：“我不反毛主席，我没反毛主席呀！”

我当时愣在那里，身体僵直半天反应不过来。对呀，从刘冰进清华的日子起，我就听父亲说他是一个老革命，怎么可能反毛主席呢？

那些日子，我陪在刘冰身边，听他细细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自此，直到他的暮年，我听了足有上百次；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总像是初次听到；每次，都带给我心灵的震撼。正是从刘冰一次次从不走样的叙述中，我认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必然性、坚韧性，体会到刘冰作为革命者80年不变的初心。每次聆听，于

我都是一堂生动的传统教育课，百听不厌。可以说清华园的孩子里，最贴近刘冰内心也最得他信任的，就是我了。在那最黑暗的日子，只有我陪在他的身边。几次重大历史事件，我都是亲历者。

在清华园，有机会接触大量中国不同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碰触他们用知识救国强国的爱国之心；通过同学的父母，又有机会接触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斗的革命干部，大大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

我根据自己观察体会，将革命干部分为两类：草根与精英。

所谓草根，意谓他们参加革命的初衷，是基于反抗环境，改善自身生活条件。

而精英，恰与草根相反，他们原本处于当时环境和条件都很优越的社会上层，却因为追求社会公平公正，放弃了这些，投身环境和条件都艰苦得多的革命，而且终身不悔。

刘冰和蒋南翔等，属于后者。

刘冰自述，他在河南伊川的老家，乃是方圆百里的富户，他乃抱养的独子。他母亲笃信佛，遍行善事：春日施种冬日施粥，粥棚常常一搭数十丈。

13岁那年，刘冰在县城门口见到要饭的冻饿而死，联想到自家粮食堆成山，深感社会不平而萌生革命思想，在学校里开始接触进步师生。16岁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自愿放弃优裕生活，进入革命圣地延安的刘冰如鱼得水，视艰苦为甘饴，从不以此为意。

进城以后，条件好了，刘冰也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计较吃穿，完全看不出他的大地主少爷背景。

刘冰的坚忍，非常人所及。

“文革”中，蒯大富一派曾把刘冰抓起来关了很长时间。放回来后，我发现他下巴上伤痕累累，细问之下，大吃一惊：原来团派对刘

冰体罚，要他高举双手背靠墙整夜站立，到了后半夜，实在困得不行，无法坚持，他就开始用手拔多日未刮的胡子（怕自杀不给刀片）！每拔一根，连血带肉，便因疼痛刺激可清醒几分钟。如此，第二天一早，监管人员见到刘冰胡子全无、下巴淌血，惊问下方知是他忍着剧痛一根根薅掉的。团派头头又敬又怕，担心再关下去弄出更大的事不好交代，就放人回家了。我问他痛不痛，他说实在太困，倒也不觉太疼，说时还笑呵呵的，令我佩服不已。

刘冰乃慈父。

1968年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底，我随所在的学校分到山西稷山插队，春阳分在山西昔阳。得知我们的去向后，刘冰说，稷山是个好地方，抗战时他在晋南任青救会主席，常去；而昔阳，条件远不如稷山。接二连三的政治打击一度使刘冰绝望，他认为自己这辈子翻不了身了。看着春阳尚未发育完全的身板，他那颗慈父的心涌现出来，对我说："春阳从小跟你一起长大，跟着你我放心，如能申请春阳跟你一起去稷山插队最好。"我明白他的意思，向学校去申请，意外获得批准，于是春阳和我共赴稷山战天斗地。

年余，刘冰"解放"，重返领导岗位。刘春阳转回河南老家不久便当了兵，退伍后到清华力学系工作至今。黄克智90华诞庆祝会就是春阳协助操办；转来转去，60多年了，我们还在清华园里延续着友谊，知者无不感叹这段佳话。

刘冰的原则性极强，同样是常人不及。

为庆祝清华百年，漆丹和我计划拍电视剧《水木清华》讲述清华早期历史，请刘冰担任顾问，帮我们把关。他听了介绍后欣然同意，表示只是原则上支持，有困难可以找他解决，具体问题还是请何东昌把关，因为何对清华那段历史的把握比自己更准确。不久后，刘冰向前去看望他的刘延东、陈希和胡和平介绍了我们的拍戏构想，希望他们也给予支持。《水木清华》因此顺利起步。

剧本创作一波三折，先是出师不利浪费了几个月，再换人又遇到自认行家要演绎清华历史的主儿。不得已，我们只得请此人走路，漆丹自己上手。谁知该人自信过头，到处告状说我们剽窃他的成果，要与我们打官司不说，还找到刘冰门上，自报家门说是兰州大学的毕业生，作为《水木清华》的顾问，请老校长主持公道，制止我们的“恶行”。刘冰听完陈述，义正词严告诉他：“张克澄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了解他，相信他不会做出你所说的事！你说的事，我一点也不信，我也不承认你是我的学生。你拿上这些材料，马上走，以后也不要再来我这里。下次再来，我就要报警了！”事后，老人家打电话告诉我整个过程，鼓励我不要怕，要想做成一件事，大小事、各种人都会遇到，要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克服困难，把此剧拍好。

《水木清华》拍摄、后制、播出的漫长日月，每次探望，刘冰都要详细询问，帮助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直至最后在中央电视台8频道播出。

80年的革命历程，刘冰很长时间处于历史的旋涡中心，经历了常人难以碰触的许多事件，也为晚辈带来许多思考。晚年，他常常跟我讲述革命历程中的所知、所见，涉及中国现代史的很多人和事；有些事涉敏感，更多的是睿智的深思，我略加介绍，也许对后生晚辈能有所启迪。

刘冰曾多次跟我谈起反右。次数虽多，观点却始终没有改变，从“文革”时起，直到他90余岁高龄，每次谈起这个话题，观点高度一致。

他认为，清华反右，教授里有些人是冤枉的。而在学生里抓右派，则更是扩大化的错误，是蒋南翔没顶住压力，被迫执行的，而他和其他人也没有勇气提出反对意见，任由错误发生，是有责任的。

他告诉我，当时，右派是个筐，谁都可以往里装人，却没人有胆量往外捞人。他虽然觉得有些人不该划右派，却始终没有表示意见，很对不起他们。

在学生里划右派，更被刘冰认为是根本性的错误。他说，学生的世界观还没有定型，即使认识上有问题，也应该给他们自己改正的机会；划了右派，把他们改错的机会剥夺了；戴上右派帽子，一辈子都毁了。

基于这种认识，后来在主持兰州大学工作期间，刘冰一贯主张给学生留纠错余地。事后证明，曾经犯过错误的学生，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他说，这就是从反右中吸取的教训。还告诉我，蒋南翔很后悔当年没顶住压力，在清华学生中抓了右派，使一些好苗子夭折了。

参加建党90周年庆祝会回到家，刘冰很兴奋地告诉我们他的位置是台下第二排1号。我问他第一排是不是老红军？如果是，那么这样安排，他就是老八路的1号。刘冰想了一下，说他没注意，也许是吧。我接着嘱咐要好好保养身体，争取建党100周年时坐到第一排1号位；他听了连连说好，很高兴。见此，我又添了几句，说参加党的十八大开幕式回家吃饭时，宋平高兴地说要争取参加二十大；他儿子冲口而出："那你就过100岁啦！"老人家瞪了儿子一眼："怎么，你觉得我活不到？"儿子赶快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对刘冰说："到时候，宋平在台上，你台下正中间，就是党史上的一段佳话啊。"刘冰眼中闪出光，显然认可这个愿景了。

宋平身体依旧硬朗，刘冰却先走一步，此景未能实现。

在刘冰最后住院前不久，某天清早我路过他家，便拐过去放下点新鲜菜，到卧室道个早安，见他刚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刮胡子。我蹲在旁边等他结束，打算问候一声就告辞。他看了我一眼，"嗯"了一声，又继续刮了足有五六分钟才结束。我以为当天有活动，他才这么认真，他却说并没安排，每天早起都要刮好胡子，这是对自己和别人的尊重。极大的震撼！中国共产党就是由这样一批做事一丝不苟的人组成的，对事业的负责首先是从自己做起的。

80年的奋斗，80年的坚持。

留给我们晚辈的，是无限的思念，是学习的榜样。

---

1. “蒋刘高胡何艾”即“文革”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副书记刘冰、高沂、胡健、何东昌、艾知生。还有一位李寿慈，未被点名。

第三辑

师友

时至今日，一旦忆起，闭上眼，仍能回想起那些音容笑貌和精彩的故事。

“三钱”

在中国说起“三钱”，几乎家喻户晓，都知道是指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但“三钱”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三钱”，而不是“四钱”“五钱”呢？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三大战役即将开打，国民党已似强弩之末，中共中央迁到了河北平山的西柏坡，运筹给国民党最后一击，要“进京赶考”了。此时，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是时候考虑将来建设国家的人才了，要准备一份高级知识分子的名单。周恩来立即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范长江着手准备这样一份名单。范长江接受任务的同时，向周恩来建言：周副主席，你得“三钱”，即可定天下呀。“三钱”之说遂不胫而走，传遍天下。

1963年，筹备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范长江与父亲一起住在友谊宾馆朝夕相处，他多次提到此事，感叹当时尚不知道钱临照和钱令希，只知“三钱”，总理一问，脱口而出。不然，也许就是“五钱”啦。“五钱”均是吴越钱镠王后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故事，需另文展开细说。

“三钱”与清华均有深厚渊源。按年齿，钱学森居长(1911年），钱伟长次之(1912年），钱三强最小(1913年）。三人都是叶企孙的学生。

钱学森在上海交大本科学的是铁路工程，考取了1934年清华庚款留美名额后，叶企孙让他转学航空，并让他住在自己家中补课，指定专人辅导，又安排钱学森去工厂实习，一年后赴美，方成就此后佳话。钱伟长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因叔父钱穆为国学大师，进清华时本

是学文的，为了抗日报国，弃文转理。其中故事，是另一篇文章了。钱三强也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后来还和同班同学何泽慧结为连理，夫妻同在居里夫妇手下研究，又生出一番故事。

钱学森用清华庚款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定期有书信给学校报告进度。拿到硕士学位后，转去加州理工(Caltech)，投在冯·卡门门下开始了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攻读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清华梅贻琦校长立即聘他为副教授，薪金亦定为最高级；由于抗战时期中美之间交通困难，钱学森经学校批准便没回国就此职。抗战胜利，梅校长再发教授聘书给他，希望网罗钱学森到清华旗下，交大、浙大也加入此番竞争。1947年钱学森短暂回国，鉴于国内形势，经仔细衡量思考，与蒋英结婚后返美再赴加州理工，终未就职。直到1955年，钱学森夫妇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回到祖国，1957年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钱学森才真正在清华任教，但无清华教授头衔。

2009年某天，饭间闲谈，钱永刚说起，老人家感叹："不想要的教授头衔倒是有一堆，想要的人家不理你。"便要我向清华领导问问，以前曾经被梅校长聘过教授，还算不算数呀？未几，陈旭老师要我转告，经研究，立即续聘钱学森为清华大学教授，拟安排个仪式由顾秉林校长将聘书当面交到本人手里。转告钱永刚商量结果，对方决定暂缓，把此事放到钱学森百年诞辰庆祝会上作为其中一项办理，为庆会添彩。结果因老人家年底辞世，终未能将聘书交到本人手中，列入履历，成为遗憾。

钱伟长在抗战开始后，随清华到了昆明，从西南联大毕业，与郭永怀、林家翘一同考上第七届中英庚款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读博。拿到博士学位后，也转到加州理工投在冯·卡门门下开始了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和钱学森成为同事。钱伟长于1947年回清华任教授。

加州理工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是国际上研究喷气式飞机及火箭推进的重镇，其中的气动小组又是重中之重。该小组最初的4位成员全

是中国人：组长钱学森，副组长钱伟长，组员郭永怀、林家翘。若论清华从何时起可称为世界一流大学，至少能前推至此吧。

钱三强从清华毕业后，经严济慈推荐，考上留法庚款，到巴黎居里实验室，在居里夫人的女儿手下工作。几年后，钱三强在清华同班同学何泽慧从德国赴巴黎与他结婚，二人共同发现了铀的三分裂现象，跻身国际知名的核物理学家行列。1948年钱三强回国到清华任教授，直到院系调整，他去了中国科学院担任原子能所所长。

所谓无巧不成书，“三钱”恰与我父母各有渊源，生出许多故事。

钱学森与父亲在师大二附小和师大附中均是同学，在交大则为不同校区的校友，后来均攻力学，又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晚年写过一篇小文《同窗同行同志》记叙了他们跨越80年的友谊。母亲与钱学森是小学同学（钱从二附小转到一附小后），后留德师从号称“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的普朗特，为其关门弟子。而钱学森赴美师从普朗特大弟子冯·卡门，遂成故事。

为写父亲的传记，我和太太漆丹及清华电视台的陈鹏翔遍访尚能联系上的父亲故旧。2016年秋，在上海交大采访刘西拉时，得知曾任初教-6、强-5总设计师、运-10副总设计师的程不时1947—1951年在清华航空系就读时是母亲的学生；立即联络程并登门采访。

程讲了许多后，向我求证在“沈飞”流传多年的故事：钱学森到北航，总是在门口下车，步行入校，次数多了，人问为何？钱答曰，我师姑在此，不敢造次！

我告之，很喜听此景，但绝不可能。理由很简单，我从未亲耳听到过。钱、蒋常来家里拜访，也爱开玩笑，称呼师姑的机会很多。我曾目睹过两次，父母和钱、蒋聊起普朗特和冯·卡门的往事，说起他们的渊源，父亲催钱学森“叫师姑，叫师姑”；钱只是微笑，并未张口叫。

退一步，如果说钱学森对母亲有超过对旁人的尊重，应该是没错的。有两事旁证。

一是钱的学生庄逢甘，按辈分算，应叫母亲师奶的，虽已极有成就，每有事来，张口必说“请教陆先生”，对母亲极为恭敬。

二是钱永刚跟我讲，某次他陪父亲来我家看望母亲。聊了一阵，母亲提起她向钱推荐的某人，未得到使用，是怎么回事？钱说，他实际上没有你说的那么优秀。母亲闻言，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走了几步，隔着茶几，指着钱的鼻子，大声说：“钱学森！人家都说你骄傲，我看你就是骄傲！这么优秀的人你都看不上眼？”永刚此时完全傻了，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有人敢这样跟父亲大声说话，更别提敢用手指着鼻子指责了！偷眼看他父亲，更奇怪了，钱居然微笑着，既不辩解也不回话！僵持了片刻，没有答案，母亲也冷静下来，二人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回程路上，永刚问他父亲，张伯母这么说你，你怎么一点也不急，也不解释？钱学森微微一笑：“我才不在乎呢，我还不知道她？从小就这样，这不算什么，我也不会生气。她喜欢的那个学生，书可能念得不错，但是工作能力没有她说的那么好……”

钱伟长回清华，一人开结构力学、弹性力学两门课，极受欢迎，但负担颇重；得知我父母回国到了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即和陶葆楷（中国环境保护奠基人）一起力邀父母来清华，才有了后来钱、张分教结构力学和弹性力学这两门课，隔年换，据说曾称一时之盛。钱、张讲课风格迥异，学生动辄几百人，成为清华园内一景。据父亲的爱徒之一卢谦告诉我，那时父亲和钱伟长在同一间办公室，桌子头对头靠在一起，相对而坐；考学生时，常常是一个人提问，另一个人打分。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政治原因，钱伟长从极为活跃转为沉寂，钱家与我家的来往也减少很多。

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随之而来的就是旅美华裔学者的返乡高潮。清华原就是留美预备学校，旅美人数众多，自然回来的也

多。此后来看望父母的，不绝于途。其中大部分人和钱伟长也相熟，因此，他常常陪他们来家中，钱家与我家的来往因之又多了起来。

张捷迁来我家吃晚饭那次，刚好我在家，是钱伟长和董寿平陪着来的。大家聊得差不多了，刚要上桌，电话响了，父亲去楼上接，因嗓门大，我们在楼下把对话听得清清楚楚——是谢静宜，问父亲在干什么，要他立刻去什么地方。父亲解释有外宾，钱伟长和董寿平也在；谢转而要求钱、董立刻就去，父亲继续陪外宾。父亲下楼传达了谢的指示，钱、董无奈地走了，大家开始吃饭。过去20分钟，电话又来了，还是谢静宜，要父亲立即就去，父亲无奈，顾不上和张捷迁解释，道了个歉，放下饭碗骑上车走了。

这一天，是"文革"中著名的一个节目，叫"考教授"。

父亲赶到大礼堂，晚了40分钟。到收卷时，还差最后一题没做，他跟监考争辩，应该给他延长时间，把题做完，未获同意只好交了。后被迟群告知得了84分，却是第一名，他回家还说，要是让他延长点做完最后一题，能得100。

许多年后，钱伟长说"考教授"他本人在清华是第一。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以此为题，考据一下，钱伟长与张维，倒底谁是第一，断个历史公案？

钱三强夫人何泽慧留德时曾和我母亲短暂合租同住。相叙之下方知何父与我外公是结拜兄弟，外公和太外公被阎锡山杀害后，何父曾长时间定期寄钱资助外婆。父母战后回国路过巴黎，与钱何夫妇及汪德昭李慧年夫妇重叙友谊，这友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中，父母与三强一家并无太多来往。我们逢年过节去中关村串门，总是固定的那几家，也不包括他家。

"文革"初，有一阵三强家的大女钱祖玄和儿子钱思进与我来往很多，尤其是祖玄，隔三岔五来找我。从小父母就非常尊重子女的隐私，不过问我们的私事，有事找，不管门是否开着，一定先敲门后问

话。也因此，当母亲有一天突然直接问“你是不是和钱祖玄在谈恋爱”时，我感到非常惊讶，立即否认。又过了几天，母亲把我叫去重提此事，并郑重告诉我，要是真有此事，也不会有结果，因为我父亲绝不会同意。我更惊讶了，追问为什么，母亲才讲了如下缘由。

1949年前后，两家关系极好，来往频繁。自从1950年三强随郭沫若访苏，就彻底接受了苏联模式，赞成办科学院，建立各种科研院所。科研院所集中一批科研人员专司科学研究，高等学校不再搞科研，专司教学。父母年幼接触的是美式教育，出国受的是英、德的熏陶，尤其欣赏德国教育，对苏联模式不了解，但知道苏联教育基本上是从德国学去的。另外，从本身实践中，父母感觉英、美大学教学科研不分家的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对三强鼓吹苏联模式很不以为然，认为以他的声望，鼓吹苏联模式，会误导决策层，把中国的教育方向引偏。二人见面就辩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终于随着中国科学院的建立而发展到不相往来的地步。“现在你和钱祖玄、钱思进又来往，等于解开了两家的心结，是好事，但是要发展成恋爱，恐怕你爸爸和三强都难以接受。我给你讲这些，是让你了解过去的事，具体怎么办，你自己掂量吧。”母亲说。

知道了这些往事，再去钱家，自然就有所进退，和钱祖玄、钱思进以及二女钱民协的交往，反而更顺畅了。“文革”后期，由于共同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长辈们又恢复了来往。

父亲对于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分家弊大于利的观点，终生未变。在蒋南翔的支持下，自1956年担任负责教学科研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以来，父亲一直在清华推行教学科研不分家，鼓励教授带学生开科研课题。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在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华罗庚的倡议下，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等于间接承认了苏联院校分家模式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毕竟，历史的答卷比领导的认可更苛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今天，鼓吹全盘学美的，甚嚣尘上。其与全盘学苏何异，前车可鉴。

一段佳话

记得那是1973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妈妈带着我去找钱学森伯伯。因为事先在电话里已经约好了，到钱宅敲开门之后，蒋英阿姨直接将妈妈和我带到钱学森伯伯的办公室。

一进门，就看见钱学森伯伯伏案在写着什么，秘书在旁边忙着。

钱伯伯一点没客套，笑眯眯地招待我们坐下，同时问妈妈："士嘉，什么事这么神秘呀，要当面说？"

妈妈笑了笑说："我找你给我儿子走后门来了。这事你可一定要帮忙啊！"

钱学森笑呵呵地看我一眼，问妈妈："什么事？"

妈妈说："你知不知道科学院物理所在合肥建了个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克澄刚到那儿工作。"

钱学森笑着说："是高原(注)的那个项目吧？那我知道，讨论的时候，我也参加了。"

钱学森转脸问我："具体是什么事情要我帮忙？"

我说："我们站刚刚成立，百事待兴，现在最缺的就是图书、杂志、文献资料，要找国防科委情报所求援。"

钱学森大笑，说："行，没有问题。我们搞的是不可控热核反应（氢弹）。可控的那些资料本来也没什么用，可以都给你们。星期一一上班，我就安排这件事。"

下星期某天上午9点左右，科学院物理所的大喇叭突然响了，广播找人，叫陈春先和我赶快到所会议室，有急事。

陈春先带着我匆匆赶到物理所会议室，所领导正和五个军人谈话。见了我们，军人们立刻站起来向我们敬礼。经过自我介绍，知道了对方是国防科委情报所的所长、政委和几位业务领导。大家围桌而坐，国防科委情报所所长开始介绍情况：

所里接到国防科委钱、朱二位副主任的批示，要他们全力支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合肥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建立图书资料室的工作，特别是在图书方面……所里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决定动员全所全力以赴贯彻首长指示。现在是来找我们听取意见，研究如何配合我们开展工作的。

国防科委情报所的所长念了钱学森的批示，大意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合肥新建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我国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大事……你所要全力支援……批件最后署名钱学森、朱光亚。

他们说这是他们建所十余年来，第一次接到科委领导的批示，而且是两位副主任同时批示，所以所里极为重视，专门开会研究此事。

物理所领导讲了几句话后，陈春先发言。

陈春先从国际上受控热核反应研究的现状，苏联的托克马克、美国的普林斯顿大环等，说到我国在这方面的情况：中央领导下大决心，在目前人员、物资都紧缺的情况下，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在合肥建立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在这个国际最前沿的科研项目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目前最缺乏的就是图书资料。知道国防科委情报所有这方面的资料，希望他们能够支援。

国防科委情报所的所长、政委当即表态，只要是他们所书库里有的，我们需要，随便挑选，无偿支援！

过了几天后，陈春先带着我们到国防科委情报所。情报所工作人员打开了书库，让我们随便挑选。只要有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图书资料，就立刻挑出来，放到一起，打包待运。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前后找出8 000余本（套）图书资料。这成了受控站第一批宝贵资料，是不折不扣的及时雨，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合肥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的馆藏，而且保证了受控站在建站伊始就能立即开展科研工作，为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走在世界前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里，钱学森批示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两位副主任的批示又是怎么回事呢？

事后妈妈问了钱伯伯方才得知，原来事有凑巧，钱学森批示完给情报所的相关文件后，秘书拿了文件正要出门，迎面碰见了朱光亚。

朱光亚问他："你拿的什么文件？"

秘书介绍了前因后果。

朱光亚听后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很有意义，陆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我也签个名吧。"

于是产生了这份由两位国防科委副主任共同签字的批文，成就了我国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

---

1. 高原，1936年清华水利系毕业。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

缅怀

2017年刚过了12天，就传来李佩阿姨仙逝的噩耗。从去年9月她入院，华光（华罗庚幺子）就和我商量探视的安排，终因怕打扰她的静养而未成行，只是隔三岔五打电话打探消息，得知她情况每况愈下，心中暗暗伤神，祈祷上苍保佑老人家能一如既往，挺过这关，延年益寿，却终成遗憾。

父母与郭永怀李佩夫妇早年并不相识，因钱学森，也因同为中英庚款学生的关系，彼此早就互相知道。密切交往则从他们1956年回国就开始了，一直延续下来。加之他们在中关村13楼的住所，恰与父母的至交汪德昭、李慧年家是同一门洞上下楼。父母与汪、李、钱学森及蒋英因同为师大附中校友的关系，来往密切；有此地利之便，加上郭永怀在清华力学班的工作，访汪时，父母也常常顺便与楼上的郭永怀分别讨论力学班及空气动力学方面的问题。郭永怀牺牲后，父母每次去13楼汪家，也会到楼上看望李佩。直到汪家搬去南边新楼，这种探访才渐渐少了。因年纪尚小，我那时只是跟在父母身后，怯生生地叫声郭伯伯、郭伯母而已，谈不上什么个人交往，与他们的女儿郭芹则因那个年代的男生女生之分，几无来往。

母亲的导师，号称“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的普朗特，著有《流体力学概论》，被学术界视为经典。钱学森、周培源、郭永怀和母亲都认为有必要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经大家商量，由郭永怀负责从英文版翻译。此事刚刚开了个头，郭永怀不幸牺牲，母亲不得已接手；为了翻译质量，又要参考德文原版，工作量巨大。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因心梗险赴黄泉，经长时间休养好不容易恢复工作，但血管逐渐硬化，脑硬化更是达到最高的三度；医生警告她，不能用脑，不可看书

看报，甚至连电视也不能看！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干、什么也不让我看，我岂不是成了废人了，除了等死什么也不干，那还活着干什么？她忍着头疼心痛，每天坚持上下午各至少两小时翻译。半年下来再去检查，脑硬化降成二度了！医生夸母亲保养得好，母亲得意地告诉医生，就是因为没听你们的，我坚持看书工作，才降下来的，说明生命在于运动，不能消极等死呀。说得医生连连点头称是。

历经数年努力，该书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出版，母亲得到稿费4 000元，还要扣税。母亲争辩，说翻译这书花了这么多年，你们按最后一年收税，太不合理了。人家拿规定给她看，说就是按出版时的稿费收税，没有例外。扣完税，母亲马上给李佩送去800元，说是郭永怀的那份，李佩再三推辞，母亲坚持。李佩后来多次提起此事，在北航纪念母亲一百周年诞辰的座谈会上，又特别着重地把故事说给大家听。

父亲走后，我常约上华光去看望李佩，听她讲父辈的故事，百听不厌。有时在李佩、李慧年和何泽慧三位老太太之间当通信员，帮她们传话送物，使几位90高龄上下的老人解决相思又难以见面之苦。20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建立的中关村糕点部制作的西点，是老人们的最爱，每次探望，松花蛋糕、蝴蝶酥和苹果派总是大受欢迎。

父亲在时，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天津看望回南开定居的陈省身夫妇。见面第一件事，便是递上专程买来刚出锅的天福号酱肘子。陈是美食家，对世界各地美食颇有研究，他们聊天除了科技方面的新人旧事，探讨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父亲走了，我继承了这个任务，每次回国前，必去买上糖尿病人也可吃的See's Candies（喜诗糖果）特制花生糖，再加上刚出锅的天福号酱肘子，去天津献宝。有一回，陈省身遗憾地跟我说：“回国定居，我们把旧金山湾区家里的东西都留下了，包括齐白石的画什么的，我都不在乎，唯有伯克莱加大给我定做的那把刻有我名字的木圈椅，没有一颗钉子，连诺贝尔奖得主都没有，想带回来，飞机不给托运，你能不能想个办法给我运回来

呀？”我听后就留了个心。没多久，湾区朋友黄伟要搬家回国，用集装箱运家具，我赶紧联络陈伯伯，让黄去他家取了那把椅子，最后真给运回来了。

姜泗长的老三姜宪有辆大车，我们就商量择日给老人家送去。李佩听我说起要去天津送椅子，马上问是不是开车去。得到肯定回答，她表示要一起去看看陈，安慰安慰刚刚失去夫人的老人家，原来她跟陈夫人郑士宁是要好同学。

顾虑陈省身毕竟是九十岁上下的老人了，怕他太伤感，话题并未过多聚焦于陈夫人郑士宁离世的消息，大家聊的大多是往事。吃午饭时，为了转换稍显沉重的话题，我想起最近听来的据说是侯宝林考华罗庚的故事，就问陈想不想听。陈大感兴趣，我便介绍，第一道题：1+1=？陈沉思了足有一分钟，才开口：“那要看等于是怎么定义的了。”等了片刻，我问，您想知道正确答案吗？陈答想，此时我看了一眼坐在我右手边的李佩，她也流露出期待的眼神，等我说出“2”时，陈一愣，嗯了一声。我又问了第二道题：“1+1什么时候不等于2?”陈的回答更让我想不到了：“那更要看等于是怎么定义的了。”等了更长时间，我又问，您想知道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吗？陈又答“想啊”，听我说出“算错的时候”，陈大师长长地“嗯”了一声，李佩则拍了我肩膀一下，说：“你这孩子！”

回程，李佩问我怎么想问起这么个题目，拿老人开心？我解释说不是的，此题乃一北大教授告知的传闻。他特别说明，此题于一般人，并没什么，绝大多数会回答“2”和“算错的时候”；要是拿去问数学家，往往会想得很复杂、很深奥，会有出人意料的答案。我是想验证一下是不是如此，没想到真的越是大科学家越把问题往复杂里想，真有点意思。李佩听我这么一说，倒也释然了，还引申说，他们整天研究的都是世界难题，绝想不到你们问的问题是小孩子的智力游戏，要是拿这问题去问钱学森、华罗庚，没准也是这个结果。

我把这故事讲给华光听，他颇为同意。读者诸君若是不信，不妨拿身边数学家一试。

此行的另一收获是发现李佩也是美食家。陈省身家厨师做的鱼，两人评论起来头头是道，由此鱼说到彼鱼，从怎么挑，进而怎么做，整个一套吃鱼经，听得我津津有味。这跟电视剧《走向共和》开头李鸿章吃鱼那一套，应该有得一拼。

自此，华光和我再去看李佩时，除了问问题，听她讲老科学家的古，又多了个吃饭的节目。她点的菜，多是清淡精致的南方菜，三言两语的点评，常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她与“三钱”都相熟，尤其是钱学森和钱伟长，在加州理工学院时他们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经历，当时年轻的中国知识精英在美国是怎样读书生活的，这些没能从父母口中听到的故事，被李佩娓娓道来，听在我们后生晚辈耳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李佩90岁以后，我们就开始为她庆生。开始只是华光和我们夫妻参与，后来钱永刚、周如苹、钱民协和柳怀祖也曾加入过。

2012年那次比较特殊。清华校友总会郭樑出面将地点定在清华丙所，胡和平、郑哲敏和张涵信及我们一帮晚辈参加，挺热闹，老人非常高兴，说了不少话，照了相，清华校友通讯还发了消息。

李佩曾告诉我们，她生日其实是1919年12月19日，为了读书，虚报成1917年，后来将错就错，没再改回来。照此推算的话，老人家应该是98岁头上走的。

李佩阿姨人走了，但她的形象，将长留我心。

附

永远的玫瑰

作者 漆丹

我在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时候看到一段回忆录：1939年夏，世界青年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李佩代表中国大学生出席了此次会议。在会上，她用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控诉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的残害、对中国教育的迫害，她的发言引起了大会极大关注，许多国际友人纷纷向她询问详细情况。那几天，李佩很忙，忙着向不明真相的人们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事实。

大会即将结束，临回国前的一个晚上，她在旅馆准备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敲门声，门外站着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

李佩知道这三人是日本人，这几天不时地在自己周围转，他们想干什么？

正当李佩想着该如何应对时，那个女生向李佩解释了他们的来意：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他们听到的宣传和这正好相反，这几天他们了解了事实，为死去的中国人民感到内疚，为中国的大学不断迁移感到抱歉，为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感到羞耻……他们流下了真诚的泪水。李佩震惊了，放下民族隔阂，温柔地安慰着他们，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回去后告诉大家真相，停止屠杀！三人鞠躬退下。

此时的李佩像一枝亭亭玉立的玫瑰在巴黎吐着芳香。

200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中关村特楼13号李佩的家中访问了她。

您当时是怎样被选上中国大学生代表的？

我是北平贝满女中的学生，这是一个教会学校，我在学校参加了他们青年互助会活动，接触到了学校以外的很多事。昆明遭到空袭后，有很大的死伤，基本上都是平民，我们自发地组织了“空袭救护队”，学了一些简单的包扎、急救等医学知识。昆明有一个教堂，神父是美国人，他为了免遭轰炸，在教堂上挂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大到日本飞机能看到它，临时医院就设在这个教堂里，这样我又和教会联系上了。当时世界青年大会要在巴黎召开，教会里来了两个组织会成员，他们知道我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看到我除了学习外，每周还有很多活动，比如教当地妇女认字，组织年轻女工们唱歌、跳舞、演戏等，他们鼓励我代表中国大学生参加会议。

去那么远，会耽误学习吗？

因为会议是在暑假期间，和上学时间没有太大的冲突。但是我还是要征得学校的同意。我向我们系主任陈岱孙先生请假，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心里也很紧张。陈先生看了我的申请后，非常支持我，希望我把中国的大学生状况告诉大家。

就您一个人吗？还有其他同学吗？

没有，就我自己和教会的人一起去的，机票是他们出的。可是问题又来了，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当年我从家里逃出来时，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来到昆明后依靠贷款和兼职生活，基本只够吃饭，没钱添新衣服。

那怎么办？

我要去巴黎的消息传出后，有个女同学借了一件旗袍给我，很合身也很漂亮，是丝绸的，总算体面地把这事对付过去了。

您说您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为什么要逃？家里不同意您出来吗？

我父亲是唐山开滦煤矿高级工程师，我们家住在天津租界。卢沟桥事变时我已经是北大经济系二年级新生，正在家里过暑假。我家离八炮台不远，我站在阳台上亲眼看见南开大学被毁的过程，烧了三天三夜，火光冲天，痛心得很。那时候外面很乱，谣言也多，我每天看报，很想知道北大发生了什么、我们还能不能上学。后来，三校南迁的消息传来了，父母不希望我出去，更不同意我去长沙，那一年我没走成。在家里待了快一年，觉得不能这样下去，我和另两位好朋友商量偷偷跑出来。

有路费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自己没有钱，家里肯定是不敢指望，我只有向朋友借。

我对他说，我给你写一张借条，你拿着这张借条去找我父母，他们看见条子一定会还你钱，如果他们万一不给，等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时间还你。

结果怎样？

我借了200元法币，嘱咐朋友不要急着去我家，等我走远了再去。我的朋友真的按照我说的做了。我父母到处找我，看见字条很生气，

钱还是给了，但是等我到了昆明后给他们写信，他们既不回信也不给我寄一分钱生活费，我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此在外面飘荡。

李佩这枝温室里的玫瑰走进了大自然的怀抱，接受着冰雪风霜的考验。

第一次出远门，害怕吗？

一路上我们三个女生很紧张，都是第一次出门，确实有些害怕，但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我们都是以向昆明前进的原则做判断。记得从天津出来的时候，我们去买船票，本想买3张去香港的筒仓票，可是筒仓票已经卖完了，售票的船办打量我们说："你们3个女学生能住大筒仓吗？"

大筒仓？那可是男女混杂的地方。我们面面相觑，非常犯难。不买吧，不知道下一趟航程是哪一天，万一家里追上来了怎么办？买吧，在家都是大小姐，哪见过男女混杂的情况？正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个船办还真不错，出了个主意："你们要是能凑出80元钱来，我就和船务打个商量，让他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你们。"我们三个赶紧点头，如数递上了钱。

您是在西南联大认识的郭先生吧？

提到郭永怀，李佩微微一笑：我和他原来都是北大的学生，他是物理系，我是经济系，大家各忙各的，几乎没有交集，但我听说过他，真正认识是到了美国之后。

那个下午我们谈了很多，她更多地愿意谈西南联大，那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

去美国留学您是自费还是公费？

那时中国的公费不对女生开放，家里没那么多钱，我还有几个弟弟妹妹都靠我父亲的薪水养活，况且我也大学毕业工作了，不可能再用家里的钱。1940年我毕业后去了重庆，因为教会的关系，认识了国际红十字会驻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邀请我到重庆办事处工作，用红十字会的钱救助那些无助的人，一直到抗战胜利。在红十字会工作期间我得到了国外一笔基金的援助，就这样我去了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

您很幸运！

李佩这枝历经风霜的玫瑰在世界舞台绽放。

李佩话并不多，基本上有一句说一句，不加修饰，对于美国生活她没有太多的描述，认识老郭，相恋，理所当然地结婚、生女。

和老郭结婚后她也自然地认识了老郭最好的朋友——钱学森。

谈到钱学森，李佩多说了几句："他很会做菜，我们到他家，蒋英打下手，钱学森掌勺，味道很好，难得的家乡味。周末，出去郊游，基本上是钱学森安排，包括带吃的和选餐厅，大家都满意。"这合适的味道一直相伴终生。

李佩的家庭后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变故，中年失去老郭，老年失去独女，她把这一切痛都藏起来，此时的她就像一枝玫瑰干花，无声无息地工作，不叫外人看到她的内心深处。

李佩90岁以后，丈夫和我商量给老人过生日，我们一共给她过了4个生日。

2011年我们邀请了沈克琦先生，他当时是西南联大校友总会北京分会会长，携夫人张欣前来为学长李佩祝寿。来祝寿的叶铭汉先生（叶企孙侄子）、吴佑寿先生（李佩的妹夫）和潘际銮夫妇，他们都

是西南联大的校友，见到他们，李佩尤为高兴，一向波澜不惊的表情也乐开了花。

我们还邀请了联大的一些老子弟，他们有的是在联大出生，有的和李佩一直有较多的往来，都是熟人。他们是：周培源的女儿周如苹、华罗庚的儿子华光、钱三强的女儿钱民协、柳大纲的儿子柳怀祖。这几个晚辈围着李阿姨亲热地叫着，让李佩应答不过来。

同时，清华校友总会和科大校友总会获悉消息后也派人参加。那天的李佩是我认识她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有了头年的经验，第二年我们早早准备。这次钱永刚（钱学森之子）听说要为李佩过生日，他踊跃报名并建议邀请郭永怀的高足郑哲敏参加。2012年，正值郑哲敏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一件大喜事，我们一并为他祝贺。郭永怀的另一位高足张涵信得知消息后主动提出不要忘了他，只要他在京一定前来为师母祝寿。

有了这两位前辈及老学长坐镇，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出面携《校友通讯》总编孙哲在清华丙所设宴，时任清华党委书记胡和平也出席了，还有几位老子弟：钱永刚、华光、柳怀祖、钱民协和我们夫妇。大家围坐在李佩周围，李佩神采奕奕，我们都说她能活到100岁。

那天我送她一条红色披肩，老人很喜欢，轻声对我说："真好看，只是我老了……"钱永刚接过披肩为她披上："披上就年轻了，永远年轻！"那一刻，李佩就像一枝久未灌溉的玫瑰遇到了雨露，滋润极了。

到了2013年，老先生就不太愿意我们张罗了，说上一年搞那么隆重，她觉得不安。在华光和丈夫的齐声保证下一切从简，最后在清华甲所六号厅为她祝寿，一共6人，5个旧人，新添了周广业，他是西南联大周先庚先生的儿子。那天我们主要谈的是西南联大的人和事，李佩说周先生的课很精彩。

到了2014年，老先生不太愿意出去吃饭了。外子买了一个蛋糕和华光到家里陪她说了一会儿话，坐了一会儿权当就这么过了。

我们最后一次去看她是2015年9月份，听华光说老先生身体不太好，腿无力，不能正常去力学所上班了（时年96岁），我们一行三人来到她家。

李佩坐在椅子上不能起身，力学所派专人看护她，移动都是护工阿姨抱，好在她瘦小，护工阿姨不太费事，她也不是那么受罪。谈话中间来了一个中医为她针灸，在里屋针灸时我一边为她按摩一边和她说了有十几分钟话。她最后对我说："这个针灸很有效，听说华光最近腿脚不好，让他先别走，在这儿扎完针后再走。"

语气还是那么不容置疑。李阿姨，您心中装着的全是别人！

2017年1月12日，李佩走了，我们知道，老先生去天堂找她的老郭和芹芹了，愿她一路走好！

“幸运号”航船

黄克智，著名固体力学家，1927年出生。2018年，他过完91岁生日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算起来，从20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整整工作了71年。在退休仪式上他骄傲地说：“我不仅实现了清华老校长蒋南翔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而且超出了21年！”

许多人问：黄先生，您是怎样做到为祖国健康工作71年的？

他沉吟了一下：“答案只有一个，我有一个贤内助，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黄先生的贤内助就是老伴陈佩英，遇见她就等于搭上了“幸运号”航船。

故事要从1950年初春开始说起……

那年，黄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师从我父亲、固体力学家张维教授；同宿舍舍友陈耀松，杭州人，攻读流体力学专业研究生，师从陆士嘉教授。

巧的是这俩人的导师张维、陆士嘉是一对夫妇，20世纪40年代留德归来的博士，也是清华园里的第一对教授夫妇，俩人不仅业务水平高，为人也很真诚，因此带出来的学生习性相近。

因为这层关系，黄克智和陈耀松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同学，关系却近似乎师兄弟，感情十分融洽。

在这万物复苏的日子，陈耀松托黄克智去接一个人。谁呢？妹妹陈佩英。她从杭州来北京考大学，投奔哥哥；正赶上哥哥有事走不开，接人的任务理所当然地就落在黄克智身上。

后面的故事想必大家也都能猜到，俩人见面彼此都有好感，陈佩英在清华园里暂时安顿下来。初来乍到，姑娘想家，心情不好，小伙子常去陪她，主动帮她复习功课，一来二往，黄克智和陈佩英相爱了。

1951年秋，陈佩英如愿考入了清华大学，黄克智也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助教。可生活不是童话，黄那时薪水微薄，加之身患肺结核，在北京又有一个妹妹需要他照顾，经济非常紧张。所幸陈不嫌弃他，他们俩就在这种紧巴巴的条件下度过了三年的恋爱时光。

到了1953年，黄的父亲退休，没了收入，全家决定投奔黄。黄克智当然没有意见，却担心陈佩英是否能接受这个大家庭。

没想到黄去征求陈的意见时，她毫不犹豫地说道："当然可以，这是你的父母呀！"可她有所不知，黄当时也不敢告诉她，那可是个大家庭啊……一行人浩浩荡荡从火车上下来，行李堆满了站台，他们依次是：外婆、父亲、母亲、两个妹妹加上原来已在北京的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一个侄儿以及婶婶！原来，黄的叔叔已经去世，婶婶无后，按旧例随夫家生活。一大家子人一个都不能少，齐刷刷地来了北京。大大小小9口人，这在当时也是清华园里最大的家庭了。

陈佩英当下就傻了，好一时才反应过来。黄克智一看她的表情，顿时感觉：完了！这婚事肯定是吹了。9张嘴呀，哪个姑娘愿意背负这么一个大家庭？

然而让黄没有想到的是，陈佩英没有嫌弃他，因陈在冷静后仔细一想，这也是没办法，但凡有路谁也不会选这一条，既来之则安之吧。1955年黄克智被选拔去苏联进修时，陈同意了黄的求婚。说结婚，其实就是登记而已，在黄克智出国前几个月，没有买一件新家具，也没有做一件新衣服，两张床一拼就是新房，按现在的流行说法，绝对"裸婚"。

在出国的三年期间，黄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支配，作为妻子的陈佩英没有碰过黄的一分钱。走后的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也是由陈佩英独立抚养。她每月工资48元，独自带着孩子，偶感经济困难，好在她有个坚强的娘家后盾，哥哥、父亲不仅每月给她寄钱补助，而且还叮嘱她："家里再困难，也不要告诉克智，要确保他在外安心学习。"她的父母在婚前教育她：结婚以后，绝不允许跟公婆、姑嫂吵架。

这样的家教使得陈佩英和黄克智父母家人共同生活近20年，没有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一直和睦相处。而且在经济极度困难、家庭成员又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做兄嫂的，把4个弟弟妹妹一个个都送进了大学，又为外婆、父亲、母亲一个个养老送终，安全地将这辆沉重的大车拉到了终点。

他们的三个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长辈的言传身教给了他们最好的营养，想不优秀也难。

每每谈到这些往事，黄先生就会情绪激动地说："我要感谢我的老伴，她是一个贤惠又能干的妻子；感谢我的岳父、岳母开明慈爱的教导，是他们使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把老家安顿好以后，黄克智夫妇也已步入中年，育有三个孩子。黄因为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家里基本由夫人主事，孩子的教育自然也落在她的身上。

三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十分优秀。老大清华大学毕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老二北京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老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拿到美国的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的。对此，黄先生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客观地说："孩子们取得的成就主要是老伴的功劳，如果按百分比计算，我只能占20%，老伴要占80%。"

在家庭教育上陈佩英有自己的一套，她总结主要有以下4点：从小不宠惯孩子，让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身教胜于言传；坚信“勤奋才能多产，耕耘才有收获”；共同扶持、有情有义，才能成就幸福人生。

……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确实如此。尤其是母亲，孩子从小在母亲的怀抱中长大，和母亲有着天然的感情。由无知到认知世界，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如果不注意引导和教育，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会走偏，一旦形成固定模式，就难以纠正了。因此陈佩英非常注重在孩子幼时对他们进行是非美丑的分辨和教导，对孩子的错误行为及时坚决纠正，绝不为了博得孩子一时的高兴而迁就。

幼时打好了基础，大了就顺心。有很多人羡慕他们，说他们的孩子不仅书读得好，而且还团结、友善和孝顺。

……

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陈佩英深信身教胜于言传。她在孩子的教育上从来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要求孩子做到的事首先父母自己要做到。

平时两个大人时间都抓得非常紧。每天下班回家，除了做饭和基本家务劳动外，没有时间闲聊或打牌，吃过晚饭以后，立即投入工作。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回家自觉地先把每天的功课复习和预习完成。他们在上小学时就知道，如果晚上有球赛，必须提前把功课做完，才能看电视。所以作为父母的二人从来都不需要逼迫孩子做功课，鼓励孩子们每一点细小的进步，鼓励追求上进。反观有些家长，好像也很关心孩子的学习，嘴里不停叫着孩子们要念书，要做功课，而自己却在麻将桌上、电视机前不肯下来，这样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好孩子？在孩子们面前也不可能有威信。

小儿子黄永强在小学4年级就开始跟着电视广播（陈琳主讲，从26个字母开始）学英语。原本黄克智是可以教他的，但黄发音不够标准，怕影响孩子将来的英语不够纯正，因此决定让他跟着电视学习。而在这学习过程中，黄作为父亲每天下午陪着孩子听广播，这一陪就是整整4年。每天早晨上学前只要还有5分钟的多余时间（因为他计算好从家到小学是8分钟），就必须背诵几个英语单词。所以永强的英语特别好，发音没有杂音。高中时第一次参加托福考试，在北大考场，与诸多研究生同考，他居然名列第一，离满分只差几分。因为这个突出的成绩，他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被美国的中学选拔走了。17岁的孩子来到美国一所没有中国学生的学校，离开亲人的寂寞，离开祖国的陌生生活，他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在美国高中，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让美国的老师、同学刮目相看，为中国人争了光。高中毕业考大学时，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个美国顶级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最后，他选择了斯坦福。为什么选择斯坦福呢？因为姐姐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哥哥是哈佛博士，他说我要选一个和他们不一样的学校试试。

对于他的选择，黄克智夫妇表示理解与支持。

三个孩子中，老大是女儿，在那动荡的年代，毕业于清华附中。当时教授的子女被歧视，同班7个出自清华教授家庭的学生，分配工作时不是理发的、卖肉的，就是卖粮的。幸亏赶上一个政策，因为黄先生常出差，家中还有一个小弟弟，大姐姐可以留在北京帮着母亲照顾家里，这样就将她分配到清河毛纺厂做挡车工。挡车工的工作很辛苦，每天要在纺织机前来回行走70华里(35 000米），下班后耳也聋，腿也肿，累得要命。这些体力上的困难还能克服，最要命的是上夜班，下班回家正值半夜三更，几个女孩结伴从清河骑车回清华，提心吊胆，作为家长的黄克智夫妇不听到开门声是睡不着觉的。

女儿工作一年后，黄克智考虑此非长久之计，提出要她全面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将来可能的高考。这个想法，在当时盛行“读书无

用”的氛围中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但黄克智坚持认为：掌握科学知识永远是有用的。机会一旦来了就不会等人，只有自己准备好了等待机会来临。

于是，漫长而又煎熬的复习开始了。黄克智亲任辅导老师，帮着孩子一门一门课复习，每天不间断，平时女儿上白班还好说，一旦轮到上夜班那就成了一种煎熬。有人说，上夜班就算了嘛，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黄克智夫妇俩却坚信，只有把学习当成了常态才能养成终身习惯，不能因为客观原因而有所选择或放弃。

为了帮助女儿渡过这个难关，夫妇俩索性不睡觉等着她回来，夫人做好吃的准备着，女儿一回到家后，吃口东西父女俩就开始念书。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孩子只有十七八岁，白天强负荷劳动，回家来脑袋都快炸了，还要读书；而大人辛苦到半夜，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谁也不轻松。几十年过去，夫妻俩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都还禁不住感叹：那个时候，夫妻俩只要有一个人意志不坚定就会中断，坚持就是胜利！就这样，一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功课已复习完，就剩化学和电学，因为这两门课对黄克智而言都是外行。

不久，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来辅导化学和电学，为了让孩子参加高考确有把握，黄先生硬是自己先学习一遍再来辅导孩子。就这样，父女二人抢先了一步，女儿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

1991年黄克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当时院士制度刚恢复，绝大部分学校都没有一个院士。于是有几所大学提出愿出高薪聘请他去挂名，待遇十分优厚，每年只要去两个月，不仅年薪是清华工资的十几倍，还提供一套永久居住的房子。这对于一个长期生活清贫的家庭而言不啻“脱胎换骨”，但是黄克智谢绝了。他认为，作为清华人，清华培养了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全部回报给清华。所以他当院士以来，从没有在外校兼职挣过一分钱。

大儿子黄永刚子承父业，在国际力学领域站稳了脚跟，国内许多大学纷纷聘他去兼职。同样，黄克智夫妇说服他，只要父母还在清华，你必须要服务于清华。于是他推掉几个大学，也包括他母校的邀请，进而为清华的力学专业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

很多人说黄家孩子有出息主要是遗传基因好，实际并非如此。绝大多数孩子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关键是勤奋。

黄家大儿子黄永刚在高考前一年，就不看任何电视节目，自己找了许多经典的数学题来练习。每天晚饭后他要做几十道课外代数题，由于这份努力，最后他轻松地以力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大。从小养成勤奋努力的习惯，直到现在他功成名就了，时间还是抓得非常紧。这位美国西北大学的冠名教授，2017年被选聘为美国工程院院士，2018年又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每年要来清华指导工作六七次，从没有受时差的影响，到了北京就干活儿，非常皮实。

去年黄克智九十寿辰时，老伴总结他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读书研究，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黄永刚接下来补充说他比父亲还早一小时，每天早上三点就起床……

黄克智的研究生杨卫院士到美国去考察，每次必去探望黄永刚。杨卫有看电影的爱好，黄永刚总是开车把他送到电影院后就自己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等电影结束后再去接他。杨卫说起此事，表示：“我在黄永刚面前感到惭愧！”

黄永刚能有今天的成就，并不是他比别人聪明多少，而是他比同龄的孩子付出更多。这正体现了“勤奋才能多产，耕耘才有收获”的真谛。

……

黄氏家庭教育自始至终贯彻一个“情”字，有了情才能有帮助别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形成“义”。有情有义，就会成就幸福人生。

这里有几个小故事，可以作为注脚：

陈佩英从娘家带来最值钱的嫁妆既不是钱，也不是物，是什么呢？

是家规！

她的娘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谁丢了东西，其他家庭成员要主动凑钱赔给他。

陈佩英从小到老丢的钱包不计其数。小时候丢了钱包，她爸爸赔她，长大以后丢了包，她哥哥赔她，当了妈妈以后丢了包，儿子赔她。所以她丢包以后尽管很难过，家人雪中送炭能让她很快从难过中解脱出来。而赔的人虽然出了钱，因为用于帮助亲人从悲伤中解脱出来，心里也同样不会太难受。

她只有在和黄克智结婚后，儿子还没能力赔她前这段时间没丢过包：因为没钱可丢。

有一年，女儿的结婚手表在西单商场被偷，当晚气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全家人凑钱买一只送她。她接受了，含着眼泪对母亲说："妈妈，我所得到的不是一只表，而是一份深深的感情，我会永远记住的。"

如今，这条家规也成了黄氏家规。

一次竞赛，成就了黄永强的终身兴趣和职业选择。

30年前，为响应邓小平的号召"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北京市要举办一次小学生计算机基本知识竞赛。小儿子黄永强在清华附小念6年级，很想去，黄克智夫妇也鼓励儿子去报名。从报名到比赛只有一个月时间，此前黄永强从未摸过计算机，家里也没有计算机（那时候只有单位才买得起计算机），如何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基本规律？只有全家总动员。

母亲陈佩英通过熟人找到清华热能系的机房，那里有一台早年的台式机，经协调在早6点到7点还没有上班前可以借给他们上机。因为时间紧迫，上课内容很多，孩子当场消化不了，父亲黄克智负责出面向讲课老师借来笔记，帮他复习。每天清晨6点由姐姐或哥哥轮流去现场辅导操作，母亲则负责准时在7点以前把早饭送到现场，全家总动员，辛苦一个月。

成绩是巨大的，永强勇夺北京市第一名！

自那以后他对计算机产生浓厚兴趣，乃至后来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博士，毕业后就职于Google（谷歌）总部。

1996年永强在斯坦福大学本科毕业，黄克智夫妇俩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大会突然宣布黄永强获得全工学院第一名的好成绩，并当场由美国福特公司颁发5 000美元奖金。听到这个消息，夫妻俩很激动，开心地看着儿子发了一笔小财。没想到永强接过支票后立刻转身递给了母亲，说道：感谢妈妈！

多么舒心的奖金啊！

两个大孩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继出国，当时条件非常差，学费靠的是全额奖学金，国际机票是从朋友处借钱买的，做父母的确实经济紧张，拿不出一张国际机票的钱，到美国的生活费更是要靠孩子们自己想办法。他们刚去时都住在地下室，过着很艰苦的生活，因此姐弟两人十年没有回过国。可是当小弟出去的那年，姐姐哥哥分别在麻省理工和哈佛拿到博士学位，并找到了工作，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于是，每年夏天，哥哥出路费让弟弟回国探亲。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情况大有改善，黄克智也开始带着老伴到世界各地参观旅游，这时候哥哥总是出钱让弟弟陪着父母同往，而他自己却从没享受过这一切。黄克智有一次问大儿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父母年纪大了，出远门有弟弟照顾更放心，另外我现在有能力了，我要让弟弟过得更好！”

儿子的这句话让夫妻俩心酸又幸福了很久……

现在大儿子黄永刚的条件很好了，一年总要回来好几次，其中七八月份他是必然要回来的，因为七八月份是父母的生日，他再忙也要赶回来，赶不上两个生日就赶一个，然后安排好另一个生日的日程。

每年年初，两个儿子都要把全家人的生日标在日历上，到时候谁也不会忘记互相祝贺。黄克智邻居非常眼红地说："我的儿子就在北京，也从不来给我过生日，你们儿子在美国还赶回来，真让人羡慕！"

陈佩英性格开朗，待人真诚、热情，生活中崇尚平等，但到关键时刻有家长权威。平时家人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孩子甚至可以跟大人开点没大没小的玩笑，但遇到重大、决策性问题，孩子必须首先听大人的意见。譬如考哪所大学，念什么专业，选谁做导师，都要全家来商量，尊重大人的意见，至今如此。

这样一来，黄克智夫妇和孩子之间建立了既是家长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又是家长和孩子的朋友关系，非常融洽。

现在陈佩英坚持每天清晨起来和孩子聊天，互相通报双方的情况。所以黄氏一家三代虽然分布在天南海北、地球的各个角落，仍然能做到对彼此的活动了如指掌。

这就是黄克智的家庭，一个和谐、团结、充满友爱的大家庭。

黄克智今年(2017年）90岁了。在纪念会上，黄先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一路走来的众人扶持和贤内助的鼎力相助。此话实不虚也。

黄克智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儿女出息。出息的标准因人而异，上美国名校或许只是其中之一吧，但三个孩子先后考上美国名校，又不忘祖国，也是佳话。姐姐入读麻省理工，排行第二的弟弟哈佛，老三更上层楼，同时收到哈佛、麻省理工及其他名校的录取通知书。

2017年3月份，黄永刚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父子两院士同为力学界国际知名专家，在业内传为美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有好儿女，先做好父母。信哉！

撞钟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般理解，是不负责任，混吃混喝等死的意思。

有一位清华校友，却撞钟撞出了经典。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科学院的很多科学家被下放到该院位于河南罗山的“五七干校”劳动，去向工农兵学习。清华物理系1936届毕业的才女何泽慧，当时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50多岁，本是出科研成果的年纪，却被认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发配到这里来向工农兵学习了。何泽慧身材娇小，田里的活儿干不来，干校分配她的活儿，是负责敲钟报时。从早六时到晚九时，每半小时敲一次钟。这工作看起来容易且枯燥，其实不然。读者诸君想想，要叫你朝九晚五，在办公室每隔半小时去趟前台，前后不准差一秒，一周一月一年，乃至数年天天如此，是什么劲头，何况她是“朝六晚九”长达15小时？这中间，就你一个人，吃饭、上厕所怎么解决？

何泽慧敲了几个月钟，方圆几十里的老乡就传开了：科学院干校老太太（才50多岁）的钟，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时一样准！每天早6时到晚9时，当中央台整点报时的“嘟”声响起，干校的钟声总是同时敲响，分秒不差。其后几年，中国科学院河南罗山干校的钟声，就成为方圆几十里人们对表的又一标准。

“文革”终成过去，我已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了。钱、何二位常来所里，我也常去钱宅拜访。平时只注意到她家里到处摆着钟表，达几十个之多，有一天想起此故事，到各屋认真查看，居然只

只时间都保持高度一致！向何老求证敲钟故事，没想到她淡淡地一笑，微微一挥手，说道："你也听说了？这有什么呀，我们做实验都是按毫秒、微秒级算，敲钟是秒级的，再敲不准，我算什么呀？"原来老人家是把敲钟当实验，一丝不苟地履行着科学家的职责哪。

敲钟如此，治病也照样不含糊。

某次我去钱宅，敲门许久不见人应声，拉一下，门却是开着的。打开门喊了一声"有人吗"，便听得老太太的声音："在这儿哪。"循声进了厨房，没见人；再问，在哪儿呢，还是那句："在这儿哪。"一转头，差点和老太太的脸撞上，把我吓了一大跳："何阿姨，您这是干啥？"只见何泽慧坐在椅子上，头伸在一个皮兜子里，正在拉脖子呢。

何泽慧见我一脸的惊讶，解释道："我在拉伸颈椎。"仔细观察，我才发现，房顶上安了个滑轮，一根绳子穿过滑轮，一头吊着个袋子，里面是大小不等的砝码，另一头连着皮兜子。兜子兜着老太太的下巴，靠砝码的重力把压缩了的颈椎拉开。是一种物理疗法。

既然是物理疗法，身为物理学家的何泽慧通过调节砝码的重量，不需要别人帮助，就可以在家里治疗颈椎病啦，而且收放自如！

老太太边说边乐，我却有点发毛，冷不丁地还以为因啥事想不开上吊呢！

何泽慧是江苏苏州大户人家的富家小姐，但她生活简朴，为人低调，从不将自己的家世公之于众，以至于她在清华读书期间，没人知道她的出身，甚至于出国留学的费用，她也是听说祖籍地山西阎锡山奖励乡亲，只要成绩优异，无论男女皆可获得出国留学机会，故前去投考，上榜得之。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家真的拿不出那三百两银子呢。当年不比今日，各省官费和庚款生名额只对男生不对女生，何泽慧就是不服这口气。最惨的是钱三强，直到两人结婚后跟她回家探亲

才知道“何大小姐”的家里是何等的排场，瞒他瞒得跟个外人似的！说“金山银山”夸张了点，“何半城”倒是满贴切的。

何泽慧对于衣着打扮从不讲究。在她家里，甚至能见到她的衣服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粥嘎巴，绝不在穿着上花时间，也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几次见到，去外面开会或是有重要活动时，她因找不到干净衣服，急了就向女儿“借”。大女儿钱祖玄故作认真状，说你身上这件都是我的，又来借，不借了！何泽慧笑嘻嘻地说记住了，记住了，下次保证不借了。过不了几天又如法炮制，态度还超好，谁都拿她没办法。钱三强则见惯不怪，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从不介入母女之争。

何泽慧懂吃，吃起来可像换了一个人。这点和我父亲一致，两人见面常交换某个饭店哪道菜如何如何，要不就是说某某餐厅新换了个厨子，大不如前。此时母亲和钱三强却充耳不闻，并不加入。母亲和她是留欧同学，同学物理，在德国短暂同居后就分赴德法两国，但那时候留学生本来就少，女学生就更是凤毛麟角，两人惺惺相惜，自然亲近。更有意思的是两人聊着聊着还聊出了亲情。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和何泽慧的父亲是拜把兄弟，外公英年突遭不测去世后，何泽慧的父亲还资助了母亲一家，但这资助情况母亲一家并不知情，因为外公死后母亲一家就靠外公的弟弟也就是母亲的叔父关照，叔父打着外公的旗号在外为孤儿寡母的生活费募款却瞒着寡嫂，还口口声声说养活了他们一家。

有了这层关系，母亲和何泽慧就如姐妹一般亲近。

对于何泽慧的外与内，母亲形容为，“何小辫呀，何小辫，你可真是‘身上乱糟糟，肚里赛花糕’。”何泽慧因梳两只辫子，被熟人昵称为“何小辫”。何泽慧回得更妙：“肚里要有货啊！”

何泽慧的字写得好，清秀隽永，值得收藏。到了晚年，她的名气越来越大，求她写字的人不少，为了免遭打扰，小女儿民协婉拒前来求字的各色人等。

清华校友总会想对刊物封面做些调整，希望能请学长何泽慧写一幅“水木清华”，打听到老先生的规矩后，又犹豫了，万一被老先生拒绝怎么办呀？

正在这时，《校友通讯》总编孙哲想起我来，知道我和钱、何一家的关系，托我问个话。我说没问题，“去中关村点心铺买了一盒点心来”。

我们在著名的中关村点心铺买了“松花蛋糕”“咖喱饺”“苹果派”这些她曾经常吃的西点，用透明礼盒装着。进了家门，她看着点心盒，一边心不在焉地和我们说着话，一边用手摩挲着点心盒。

馋了！

我开玩笑地对她说：何阿姨，吃点心可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吃一块松花蛋糕写一个字。

什么字？

水木清华。

行！

民协早在一旁笑弯了腰，大喊我诡计多端。这哪里是诡计？分明是阳谋，投其所好嘛。

走笔至此，联想到一则和钱三强有关的逸事。

1953年，钱三强任团长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团员有华罗庚、赵九章、何祚庥等。长途火车中闲来无事，大家谈古论今。华罗庚突发奇想，给大家出了个上联：三强韩赵魏。大家百思未得其解。最后还是华罗庚给出了下联：九章勾股弦！大家闻言掌声顿起，经久不息。

此事父亲在各种场合多次提起，以启发我们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他还进一步分析，此联可入选千古绝对。因为上联的三强和下联的九章，对应了钱三强和赵九章，此二人既同为清华校友又同为中科院所长，而且还同时在座！三强韩赵魏为三家分晋的著名历史故事，九章勾股弦为《九章算术》中的定理，为历史名篇，正合。父亲就此事引导我姐弟二人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要我们体会琴棋书画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境，揣摩唐诗宋词中字面隐含和影射的意思，也借此教育我们，东西文化是不同体系，各有优劣，不可偏废，要各取所长，融会贯通，兼容并包，各趋极致，才是上乘。

父亲讲解对联时，除了上述一联，他常举一例，我也借此机会和读者分享：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

每每回味，都能体会到中华文化确是博大精深，妙不可言。

缘分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逢”。人和人相识，讲究的是缘分二字。

1946年秋，父母从同济大学转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任教。初到，即有一位30出头的陌生人登门拜访。来人开门见山，问父亲是否还记得段永燏其人？父亲答记得，是师大附中的要好同学。来人便拿出一封信表示受段氏之托转交。原来是为一西南联大学生何东昌在北洋大学谋教职之事。此前在上海时，有上海交大教授赵韶熊（赵访熊之兄）也曾托父亲为一何姓青年谋职，难道是同一人？父亲虽心下疑惑，仍答应下来。

几天后，何东昌穿着一件补丁大褂应约来访。父母仔细问了他一些功课上的事，尤其是母亲，听说他是联大航空系学生，问了几个专业问题，甚为满意，当下便答应向北洋大学举荐。就这样，何东昌进入北洋大学，成为父亲回国任教后的第一个助教。

其实他们不知道，何东昌在西南联大时已成为地下党员，现在需要在蒋管区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来做掩护，父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他达成了这个目的。这也为后来两人和谐共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7年夏，父母受聘来清华，何东昌受此启发也和清华联系上了。他的专业本是航空，到清华后，在航空系改作母亲陆士嘉的助教，前后两年多，直到他脱产去做党政工作。

何东昌先后做过父母的助教，由此说来交情不浅。

母亲最常讲的，是何东昌刻蜡版的故事。

母亲开的空气动力学课，是一门新兴课程，理论性很强，在国内还没有教材，大多是老师提供的讲义。据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我国初教-6和强-5总设计师的程不时回忆，那时没有课本，很多老师也不发讲义，但是陆先生会发，而且是一摞一摞的。

那时出份讲义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复印机上一按，要多少有多少，字体大小随意改变；那时，除了抄写，只能靠刻蜡版，油印。干过的都知道，这活儿要求胆大心细，下笔要狠，不然划不破蜡皮，印不出东西，但是又不能太过，否则划过了头，印不了几张蜡纸就破了，费力不讨好。

在何东昌之前，有两位助教帮母亲，两个人轮流刻、印，每张蜡版只能印50张左右。从晚饭后开始，往往要忙很久，甚至到半夜，弄得满手黑，有时连脸上都是花的。何东昌接手后，蜡版刻得又快又好，字体均匀，字迹清晰，平均一张可以印250份，捎带还帮母亲做校对，晚上9点左右就能完成任务，手上脸上干干净净，真正叫一个顶俩！

后来才知道，刻蜡版是地下工作者的基本功，何东昌在西南联大时早就练出来了。

父亲常说，天桥的把式有三种：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又练又说才是真把式。何东昌就是真把式！他后来创建清华工程物理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治国强国的栋梁之材，成才率之高，在清华排在前列，是有目共睹的。蒋南翔退任前力排众议举荐何东昌接任教育部长，看中的就是他政治、业务双肩挑的能力。

无独有偶，1949年12月，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国际会议。中国派出两名代表参加，母亲陆士嘉作为女教师代表出席，清华心理系女生李卓宝是学生代表。会议持续了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李卓宝和母亲同居一室、朝夕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意思的是，李卓宝后来成了何东昌的夫人，不能不说两家人有着不寻常的缘分。

60多年以后，为迎接清华百年校庆，我们筹拍《水木清华》，这时何东昌已从教育部部长的职位上退下，又患帕金森症，轻易不见客。我们登门请何叔叔做该剧顾问，没承想他一口答应，仔细交代我们：“早年清华不是革命学校，不要把清华写成抗大，要掌握一个原则是‘一四七’，即抗战前在清华的地下党员不到100人，西南联大时期400人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700人左右，他们始终不是清华的主流，对清华的走向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关于清华校长，不要因为梅贻琦、罗家伦去了台湾地区就否定他们对清华的贡献。梅贻琦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说了，我要强调的是罗家伦对清华的贡献是决定性的，没有罗家伦将清华转为国立的贡献，也不会有梅贻琦后来的成就。”

谈完正事，何东昌指着我比画了一下，说：“你是5个月大小进的清华园，只有这么大吧？你生在天津一家德国医院，出院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哪！”说得我眼圈都红了。

顺便说说，当年向父亲推荐何东昌的老同学段永燏，参加革命后改名刘仁；那位奉刘仁之命来找父亲的，就是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国家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他们当年识拔何东昌于草莽之中，是何等眼力！今当用人之际，这段故事对如何识人用人，也许能有所启示？

金质奖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设立金质奖章，由校长蒋南翔亲自为优秀毕业生佩戴，既是永生难忘的荣誉，也是时代的骄傲。

时至今日，还能听人钦佩地说，某某是金质奖章得主……那么，金质奖章有多高的含金量？

1978年，清华电机系出身的陈陈在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任设计师，参加公派出国考试，拿下一机部西南地区第一名，远赴美国普渡大学作为“访问学者”进修。

陈陈的丈夫刘西拉毕业于清华土木系，在四川成都国家建委西南建筑科学研究所任工程师。刘西拉将多年积攒的论文交给她，让她到了美国后找合适的人给看看，有多大价值。

陈陈找到普渡大学土木系的一位名教授。阅后，教授表示可以资助刘西拉来美留学。

真可谓天上掉馅饼！既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又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一举两得。

有了普渡大学的经费保障，刘西拉很快获得“访问学者”的资格。陈陈也特意从美国回来料理家务，准备夫妻双双在美国过上几年。

行前，老校长蒋南翔邀请他们到家里去了一趟。

蒋说：“找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华的教学质量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是在清华读的研究生，等于做

过一段研究工作，你们代表清华‘文革’前研究生的水平。我要你们这次出去在他们的一流大学里拿一个博士学位，看看难不难。”

难。

首先是身份。“访问学者”是不能到国外拿学位的，但是有了蒋南翔的支持，教育部很配合，紧锣密鼓地为陈陈转了身份改为公派研究生，刘西拉因为是工程师只能公派，但因为有了美方教授资助，也转了“自费公派研究生”。

其次是学习本身。

二人到了普渡大学一看，中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台湾地区，人家二十几岁，自己已经40了，英语还是半路出家，压力就比较大。尤其当时美国尚未建立对中国大陆教育水平的评价体系，陈陈和刘西拉在清华的所有学分不能转到美国的研究生院来，读博士学位必选的16门课一门都不能少。

这是场硬仗。刘西拉抱着誓死一战的态度走进普渡大学。

那里的研究生正好讲完高等材料力学的“薄壁杆件约束扭转”，要考试。刘西拉一看这个内容曾经学过，他先做了个调查，然后找到教授：

我能不能尝试一下考试？

你没上课怎么考试？

你们讲的内容我在清华本科读过，我们当时讲的是符拉索夫“扇形正应力”的严格解，而你们现在讲的是简化解，我想试试。

见教授犹豫，他又请求：

“教授，您就多改一份卷子，多花20分钟，而我呢，就能建立一个‘坐标’，知道我在这个班上处于什么位置。”

说得在理，教授同意了。

成绩一公布，全班第一！刘西拉松了口气，清华的基础到底扎实！自己也小有得意，这些年来基础理论都没忘，有希望！

自此以后，刘西拉功课一路顺风，台湾同学大呼大陆学生不得了，把他们比下去了。最后16门课加上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刘西拉花了三年零七个月完成，顺利拿到博士学位，随后还得到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1985年结构科研奖（此奖每年在ASCE仅一项）。这是土木界的一个大奖，此时他的教授还没得过这个奖呢！

颁奖时，ASCE的主席问他：

> 您是清华大学的？
>
> 清华大学的。
>
> 您是哪个清华大学，台湾还是北京？
>
> 北京。
>
> 哦，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与此同时，一向“学霸”的陈陈更是突出，只用了三年零三个月就完成全部学业要求。

两人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向蒋南翔报告：校长，您放心，清华的教育没问题，“文革”前培养的研究生到美国一流大学拿个博士学位，不难！

此时的蒋南翔身体已不大好了，这话犹如一剂良药，使他舒心地笑了。

仅仅是在学业上让美国人刮目相看也就罢了，这两人在艺术上还有很深的造诣，更引起美国人的惊呼。

陈陈自幼弹钢琴，1956年以华东六省一市高考状元、数理化三个10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电机系，大学5年半所有功课都是5分，传为美谈。学习之余，清华送她到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部学习，这是专为各个大学培养音乐人才的地方。毕业时，陈陈得到清华大学和音乐学院钢琴系两张毕业文凭，蒋南翔知道后特别高兴，陈陈理所当然地成为金质奖章获得者。

刘西拉则是清华学生管弦乐团的小提琴首席，除了学习和拉琴，他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在那个讲究又红又专的年代，他的行为显然不合时宜。但是刘西拉善辩，他和大家展开激烈辩论时往往能把对方说得无回旋余地，因此被冠以“‘西风’辩论团团长”。这是带着贬义的，因为“东风”压倒“西风”嘛。

让刘西拉没有想到的是蒋南翔并没有因为他的“西风”思想而淘汰他的金质奖章，若干年后，每每想到这点他总是深深敬佩蒋校长作为教育家的眼界与胸怀。

来自上海的二人在清华园里因音乐相识、相知、相爱。

在普渡大学，陈陈和刘西拉发挥音乐特长，给普渡大学的学生介绍新中国的钢琴、小提琴名曲，还不断应邀参加不同场合的演出。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1984年，刘西拉去考最负盛名的拉斐特市交响乐团，真的考上了！开始指挥把他安排在第二提琴，刘说我在清华交响乐团可是首席小提琴，指挥试听后立刻把他调整到小提琴第一声部。

第二年，拉斐特市交响乐团成立35周年，里根总统为此还专门写来贺信。巴西籍指挥艾德瓦尔多博士找陈、刘商量，希望能演出一个中国自创的钢琴协奏曲。

二人商量后觉得可以接受，选择了刘诗昆的《青年钢琴协奏曲》，陈陈写信回国找总谱。等谱子寄到时却发现是为民乐写的，又

连忙把民乐总谱改成西洋管弦乐的分谱。

演出当晚，这是庆典交响音乐会上半场最后一个节目，指挥介绍，请听新中国交响乐。现场一阵骚动，陈陈登上舞台，用她精湛的技艺完成了新中国钢琴演奏水平的介绍。曲毕，全场起立，鼓掌，久久不息……没有想到，中国人第一次在美国演奏新中国的钢琴协奏曲，竟由一个清华电机系的学子完成。

这，就是清华金质奖章获得者的风采！

陈陈的钢琴弹得好，早在四川时就经过一次考验了。

当年为了解决两地分居，他们试过各种办法。反正陈陈干的也不是本专业，既然下放开刨床，干脆用第二专业，弹钢琴吧。

正好峨眉电影制片厂峨影乐团成立，缺个弹钢琴的。有人问，陈陈能不能来考一考？

先考《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又考钢琴伴奏《红灯记》。

第二天，四川省委组织部派人骑摩托到东方电机厂，调陈陈去峨影乐团伴奏。

东方电机厂一看，马上把陈陈调到设计科跟李蒙学长干。

两个人均太有本事，调谁到对方的附近都没有适合的工作，这两个人又都是人才，不能离开四川。结果，就只好辛苦刘西拉，继续奔波在蜀道上了。

上海交大举办120周年校庆时，校方要找一对教授老夫妻唱“当你老了，头发白了……”，希望二人在篝火前数脸上的皱纹，于是点陈陈、刘西拉的将。

刘西拉抗议：“我们不是这个心态！老师老了，是丰收的季节。这样不演！”

导演就动员刘，说这是我们考虑很久才定的。刘说你们就没考虑，老师老了是什么个心态？是：

“你属于我，我属于你，

朝朝暮暮在一起，

走千里，走万里，

还在你的怀抱里。

做一粒种子，泥土里埋，开花结果为了你……”

这才是知识分子，老了的知识分子！

导演无语。他不知道，虽然他是靠嘴吃饭的，但碰上了当年“‘西风’辩论团的团长”，他就算浑身上下都是嘴，也难取胜啊。

在2013年蒋南翔百年诞辰之际，大家在他的宜兴老家为他立了半身铜像。面对老校长，陈、刘二人和当年的学子们唱起了《飘落》。在他们心中，校长当年的一句句话语，就像秋天的一片片落叶，静静地飘落、飘落，覆盖着大地……温暖着他的学生们……

方圆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掀起了研究受控热核反应的热潮，美苏争相建造大尺寸的反应实验容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北京中关村已建了一个小型磁约束反应器——托卡马克6（简称T-6)它向中央打报告说，希望跟上国际潮流，扩大实验，在合肥郊外董铺岛建一个中型托卡马克（简称T8)。获中央批准同意之后，在全国调150人，由陈春先牵头，成立中科院安徽光机所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即今天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前身。该站从全国调集年轻的科研人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两地分居的20世纪60年代重点大学毕业生，也包括10个高中生名额。我有幸成为这10人之一，随陈春先、李吉士和邱力俭第一批到合肥建站。我的初期工作就是到合肥火车站接陆续前来的报到人员，帮助他们安家、报到，安置办公室桌椅等。

人员大批涌来，以北大毕业生居多，其次是清华、复旦、科大等。北大物理系的高才生来了不少，霍裕平、陈家驭、万源熙、胡希伟、余国扬、谢纪康、张澄等，清华的有王贵诚、吴季松、林文漪、王孔嘉等。年龄大都在30出头。有这么好的机会，大家都很珍惜，工作热情极高。初见面，免不了自我介绍一番，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介绍老师。

一般而言，这种介绍的套路，是从老师的老师说起，再涉及其毕业院校、学术成就、教学研究特点、学生某某某，等等，大同小异，时至今日多已忘却了。唯有王贵诚的介绍，别开生面，生动有趣，令人难忘。时至今日，一旦忆起，闭上眼，仍能回想起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和精彩的故事。

王贵诚说他1958年考上清华，第一堂课就是由大名鼎鼎的常迥教授来上。本以为学的是无线电，又是第一堂课，总要讲讲绪论，比如什么是无线电之类吧。没承想常先生一言未发，拿起粉笔，一转身，在黑板上随手画了个圆，然后转过身来，向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们开口说：“什么时候你们能不用圆规把圆画成这样了，你们的无线电就学好了。”下课后，同学们蜂拥而上，用圆规一量常先生手画的圆：嘿，分毫不差！那个佩服呀，从此以后，听常先生的课一个字都不敢落，生怕听漏了跟不上先生的思路。

见大家听得津津有味，王贵诚话锋一转，介绍清华无线电系的另一位教授马士雄画电路图也是一绝。马先生边讲边画，下了课学生拿三角板去量，个个都是直角。后来画圆、画直角就成了学生们的心病，没事就练，在清华6年也没谁练出常先生、马先生那两下子。

至于无线电系的开山鼻祖孟昭英教授，吹玻璃更是一绝：大小、薄厚就跟机器做的似的，摆在桌子上放齐了用眼一瞄，整整齐齐一条线。那时还没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真空管全靠玻璃车间的师傅吹，但没哪个师傅能吹得过孟先生的。

王贵诚说得唾沫乱飞，同事们听得目瞪口呆。后来王贵诚离开受控站去中国科技大学当教授，据说仍然喜欢举这几位先生的例子鼓励学生苦练基本功。

我家与孟、常二位先生宅仅一林之隔，不足百米，常家子女又与我年龄相仿，因此我是常家常客。就此故事请教常伯伯，他哈哈一笑：“有倒是有王贵诚这个学生，书念得不错，但他把我说神啦，哪能画得跟圆规一点不差呀。要是他们真因此苦练基本功，倒也是好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深信故事或有夸张，道理却是万古不变的。做人做事一理，做好了该做的事，打好了基础，方能发展成大事，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嘛。

常迥夫妇乃公认的忠厚之人，常家子女常放、常振工、常振明个个出息，应了“忠厚传家久”的古训。中信集团流传不少常振明的故事，更为神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

D Day

清华子弟中，早期成才的，以杨振宁、邓稼先、宗璞和熊秉明等为代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出生于20世纪而为我所知的，挂一漏万地数数，就有钟道隆、钟道新、施鹏飞、赵南元、陈小悦、徐经熊、常放、常振工、常振明、孙立哲、艾平、程远、杨卫等。

钟道隆的故事，极鲜明地反映了清华精神在他身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里先简单讲个小故事，其他的，如果读者诸君愿意听，我再找机会逐一展开了讲。

20世纪80年代初，钟道隆在解放军通信兵里是业务尖子，英语自学成才，有机会去英国参观考察。

由于解放军已于1965年取消了军衔制，此时尚未恢复，按规定钟道隆着便服出国。

其间主办方举行酒会招待参会代表。酒会进行中，由于他非常疲劳，没有怎么说话，就听见有人说：“你们看那边那个中国人，长着一副扑克脸(poker face)，不懂英文。无非是来英国旅游一趟，完了带一大堆材料回去交差罢了。”循声看去，说话的是某国一上校。钟道隆不动声色，自顾自地吃喝着。

酒会主人是一位英军少将，十分殷勤周到地和每位来宾碰杯，说上几句。当他客气地和钟道隆碰杯，说“To your health.Toast”（为了您的健康，干杯），钟道隆举了一下杯子，回了声“To your

health.Toast”。将军一愣，回过神来，忙问：“您懂英文？”“是的。”“刚才他们说的话，您都听懂了？”“是的，将军。”“啊，我为我下属对您的冒犯，向您道歉！作为弥补，我请您参加明天晚上的宴会，我来接您。”

次日傍晚，将军身着便衣，亲自开车到旅馆把钟道隆接到英军通信学校餐厅，与多位上校军官共进晚餐。席间，几位英国军官高谈阔论。钟道隆基本上不说只听，但是听得出来，他们正在讲D Day，说D Day说法是从诺曼底登陆之后才流行的，等等，还时不时看看钟道隆，眼里露出得色。将军和钟道隆聊了几句，听邻桌聊得高兴，便很客气地问：“您听他讲的这个故事，有兴趣吗？”“有兴趣。”“那么，据您看，他说的对吗？”“不对！”“啊？那，您愿意说说您的看法吗？”“可以。”

少将站起身来，摆手让大家安静，然后说：“这位钟先生对你们的说法有不同意见，请他讲讲他的看法？”人群骚动起来，明显觉得将军多此一举，这个中国人还知道D Day ？

钟道隆的第一句话，就把大家镇住了。“D Day不是从诺曼底开始的。D Day，是Decisive Day的意思，泛指某一特定的决定性的日期，早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以前就流行了。据考证，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登陆法国本土那天也称为D Day。”其中一位军官马上问：“先生，你这样说，有什么根据？”“《韦伯斯特词典》。”

将军立刻让下属拿来《韦伯斯特词典》，他翻到了D Day词条并念了起来。念完，一片静默。少顷，他打破沉寂：“钟先生，词典上说的跟你说的一样！”“不，将军，应该说我说的跟词典上一样！”话音甫落，掌声一片。

会议结束临行前，少将向钟道隆索要通信地址，他按照解放军的规定留下了地址。少将表示，他将送给钟道隆一份有意义的礼物，表达他本人对中国军人的敬佩。

此后10多年，钟道隆每年圣诞节前都会收到这位英国将军寄来的贺卡，以及按月收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1994年，钟道隆教授从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岗位上以少将军衔退休。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

知识就是力量！

给钟道隆以力量的知识，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刻苦学习得来的。

高中一年级时，学习优异的他，怀着报国志参了军，学习报务。虽然没有赶上打仗，但也练得了一手好功夫。

上通信学院，他学的是俄语。改革开放时他已经40多岁了，开始学习英语口语，真是困难重重。都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四十大几了要学英语口语，困难太大了。

在部队的营房里，每天晚上，结束了一天繁忙工作的钟道隆忙里偷闲挤出时间坚持英语的听说读写。旁边屋里，战友们用打扑克、下棋调节生活，喧嚣声不绝于耳；这边厢钟道隆捧着砖头大小的录音机重复着艰涩难懂的英文单词。默写的圆珠笔用光了一支又一支，难懂又难背的单词，听了一遍又一遍。

夏日的夜晚，燥热；隔壁的喧闹，撩人。时间精力都用了不少，英语学习却原地踏步。屋外篮球场上传来阵阵喊声，钟道隆放下手中的书，下去观战。回屋路上，无意中踢到了一个空的可口可乐罐。他捡起此罐，去掉上半，做成了一个笔筒。他跟自己说，要是这个罐子插满了用过的空圆珠笔还攻不下英文，我就承认自己不是学英文的料，放弃学习。

就这样，一年的工夫，空圆珠笔插了大半罐，收录机用坏了十几个，钟道隆进了英文的门。这以后，他每天收听英语广播，不放过一个不懂的单词，不留下一句不明白的句型，他的英文水平持续提高。

等到他陪崔伦将军去美国访问，在卡纳维拉尔角观看航天飞机发射时，已经可以完全听懂现场解说了。同行的翻译，英语专业毕业，尚有不少听不懂，却惊讶地发现，几年间，钟道隆已从英文的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啦。有些非常专业的词，连翻译都不甚了了，钟道隆却已能驾轻就熟地掌握。

在学习过程中，钟道隆发现收录机对于语言学习有很多不足。结合体会，他与两位教员一起，发明了复读机，并申请了专利。当他发现把专利变成产品将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不利于推广时，遂毅然放弃专利，将之公开，使之得以迅速进入市场，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利器。时至今日，复读机的销售业绩已经达几十亿元之巨，而钟道隆本人却分文未取。

自学英语取得了成功，尝到了甜头的钟道隆又扩大战果，在担任解放军通信学院副院长期间，由于教学管齐努力，把学院的英语教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钟道隆上任时，该院学生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通过率不高，一年后，该院的通过率成为南京第一，第二年成为华东地区第一，再一年100%通过。

用钟道隆自己的话说，这没什么稀奇，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笨鸟先飞，老老实实地下笨功夫。基础打实了，才能在上面添砖加瓦。

有位张姓学员，各门功课尚可，唯独英语不灵，完全找不到感觉。钟道隆上任后，提出新的毕业标准，经院务会通过后开始执行，英语不过四级不授学位。该生来自河北望都县一带，老家以出产豆腐丝闻名。得知此消息以后，班干部向钟道隆反映张姓学员萌生了退学的念头。细问之下，原来前几日有老乡来访，述说卖豆腐丝收入不菲。想想自己的英语这么烂，横竖得不到学位，还不如早做打算，退学卖豆腐丝算了。钟找到了他，问他："你是真的想放弃，还是因为英文学不好才这么说的？"答曰英语实在是太难了，自己已经把几乎

所有能用的时间都耗在英语上了，还是完全找不到感觉，上课连最简单的句型都像是听天书，根本不懂。

钟道隆遂问：

能不能暑假不回家，留在南京补习英文？

能。

那可就要下傻功夫、苦功夫。只要你按我的要求做，下学期开学你就能跟上班了。

要真能跟上，您叫我怎么干我保证不打折扣。

那咱们就从初中英语补起。从初一第一课开始背。

行。

原则是，背会了第一课，再背第二课。背第二课的时候，还要从第一课背起。背第三课的时候，要从第一、第二课背起，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课。

是。

钟道隆指定一位英语很好的研究生帮助他。

四大火炉之一的南京，寂静无人的校园，张姓学员的攻关开始得艰难无比。

初一英语第一课，用了两星期才拿下。第二课，10天；第三课，6天；渐入佳境。到暑假结束钟道隆回来测试，学员的初中英语基本背完了。

暑期后开学再上英语课，他居然大部分都听懂了！

英语一过关，其他功课也有时间深入学习了，他一下子跃入好学生行列。

浦东情

浦东，改革开放的成果，东方明珠。但是，最早提出开发浦东的人，却鲜少被提及。他，就是号称“预应力先生”的美籍华人林同炎。

20世纪80年代初，汪道涵任上海市市长时，率团到美国旧金山访问，住在团结广场一家五星级酒店。

林同炎听说后，连夜带着公司的人画了几幅图到酒店等汪道涵，一直到第三天，终于见到了外访归来的汪市长。林同炎自报家门，立即被请进了房间。林开门见山地讲明来意，建议上海开发浦东！随即在茶几上摊开图纸介绍自己的开发设想。汪道涵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提问，最后说道：“林先生，您这个建议，好是好，可是我们没有钱哪。这么宏大的计划，不要说上海拿不出这笔钱，就是国家，也不可能给上海这么大的一笔钱哪。”

林同炎笑了：“土地就是钱呀，尤其是靠海的地方，你看世界上的国际大都会，哪个不是靠海靠河发展起来的？纽约、伦敦、巴黎，都是靠出租、出售土地筹集建设资金发展起来的嘛。上海浦东临海靠河，条件不比它们差，加上上海人精明，善于学习，可以学习它们的经验，先划出十亩地，用这十亩地筹到的钱……那时就不愁没钱喽。”

汪道涵听明白了，急切地问：“依您的意见，如果我们下决心开发浦东，第一块地选在哪里好呢？”林在地图上黄浦江拐弯的地方一指：“陆家嘴！这个地方是交通要冲，运输也方便，把这里建设好

了，大家都看得见，有广告效应，以后向外发展就会省去很多口舌。”

…………

这毛遂自荐的一席话说得汪道涵激动不已，回国后汪道涵就向邓小平做了汇报。

及至朱镕基当上海市市长时，浦东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开发，浦西、浦东之间的交通成为制约浦东发展的瓶颈。修桥还是打过江隧道，各方争论不休。朱镕基率团来到旧金山，见到林同炎直接就问这个问题。林同炎的回答十分干脆：“修桥！桥是城市的脸，是地标。你看纽约、伦敦、巴黎的明信片上都是桥，哪有印隧道的？修桥是多花了钱，但是造出漂亮的桥来，就是城市的景观；来上海旅游的人，会以桥和黄浦江为背景留影；没人会在隧道口照相。隧道里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就是大事故，要是再着了火，发生了爆炸，生命财产损失不说，处理起来费时费力，再说，修复隧道也是要花很多钱的呀。”

……

父亲和林同炎为唐山交通大学校友，均是茅以升爱徒，交情匪浅。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佐治亚理工学院硕士毕业后就到林同棪国际公司做工程师。20世纪90年代初某天，林伯伯将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看封信。

信来自上海市政府，决定在浦东划出若干亩地，由林同炎主持开发。

我喜出望外，机会终于来了！此前，上海金茂大厦征集设计方案，我们公司为此埋头苦干上上下下忙活近两个月，光做模型就花费近20万美元，设计出超现代化的弧形镜面大楼，最后却因上海市政府要求民族风格，连第一轮都没进就被淘汰了。大家都埋怨林同炎不找上海市政府公关，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不是老天有眼，天上掉馅饼么？

没想到，林同炎笑了笑，淡淡地说，他已经谢绝了上海市政府的美意，并说出一番让我至今不忘的话，大意是：“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回国做事，给国家出主意，是希望用我们的本领，帮助国家早日强大起来。可人家总以为我们是为了赚钱。我们开公司当然要赚钱，但是赚钱的路子有千千万，要靠平等竞争。因为我出了主意，浦东的事情做成了，划块地给我开发让我赚钱，我很感谢。但是我要是接受了，就等于承认我当初提议是有私心的，有违我的初心，所以我不能要。”

说实话，直至今天，每当我想起林伯伯说这话时掷地有声的音容，还是会热泪盈眶、激动不已。这就是国士吧，名与利，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林同炎原名林同棪。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首次回国时，恩师茅以升跟他说，你那个棪字不好写，干脆去掉木字旁，炎黄子孙嘛。他欣然采纳，从此写作林同炎。

我曾经问了他个很傻的问题：“您当年为什么没上清华上了唐山交大？”他的回答很巧妙：“1928年我同时考了清华和交大，清华我考第一，交大只得了第五。你说我该上哪个？当然是交大啦！那儿有比我更棒的人值得学习嘛。”确实，1928年清华刚由中等学校改为大学，教学实力还不像今天这样有名。

林同炎大学毕业后被分到陇海铁路潼关段，很快遇到了一件事。几位老工程师讨论一座桥的设计方案，林在旁边听，不知天高地厚地插话，提出不同意见，当场遭到工程课老课长的训斥。可过了没多久，老课长把他叫到办公室，通知他接替自己来当工程课课长！原来老工程师们讨论后发现，林同炎的意见不但正确而且在技术上具有前瞻性；老课长当即给上级写报告，退位让贤，推荐这位20多岁的青年才俊接下这副重担！林同炎自此在工程界崭露头角。

抗战期间，林同炎参与了滇缅公路建设，主持完成了成渝铁路的勘测设计。由于缺少资金，未能开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渝

铁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勘测设计了三条比较线。经与林同炎主持设计的旧线相比，无论土石方量和桥涵设计，都不及林的方案。最终，成渝铁路是按林案施工的。

林同炎夫妇抗战后赴美，任伯克莱加州大学土木系教授直到退休。林同炎在此已完成他关于预应力混凝土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和工程手册，把比利时人关于预应力混凝土的理论变成可以应用的具体方法，并且身体力行，用预应力混凝土设计建造了无数桥梁和房屋，真可说是出神入化，留下了很多标志性作品，也因此在业内获得“预应力先生”的称号。

他设计了连接亚洲和北美洲的白令海峡大桥。1986年，他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奖状上的赞词写道：“他是工程师、教师和作家，他的科学分析、技术创新和想象力丰富的设计，不仅跨过了科学与艺术的鸿沟，还打破了技术与社会的隔阂。”当里根总统向他颁奖时，他向里根递交了自己设计的白令海峡大桥设计图纸，认真地说，你的“星球大战”带给世界的是战争，我的大桥却可以连接美苏，带给世界和平！里根手拿图纸，哭笑不得，一时传为笑谈。

1987年，林同炎得到另一个奖。此奖至今还没有第二个华人得到，是由美国咨询工程师学会授予的杰出成就奖。此奖每年只发一人，得奖者都是大腕。两位美国总统胡佛和艾森豪威尔也曾分别获得该奖。

我在林同棪国际公司工作期间，帮他开车、提皮包，随他出席了几十场演讲，介绍他的作品，解答预应力混凝土应用方面的疑难问题。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件大作。

——位于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美洲银行大楼。在1972年的大地震中，马那瓜全城一片废墟，唯此18层大楼奇迹般屹立不倒，俨然纪念碑。而且，只经过简单修复，就恢复使用了！林同炎介绍，他考虑到当地是地震多发区，遂把电梯安排在大楼4个角，电梯间用钢板桩直

接打入地基，外面用钢索捆绑焊接，形成刚性连接，抵抗海风。地震一来，钢索被震断，四个电梯间成为四个独立的柱子，又因钢板有弹性，能吸收地震波，大楼随地震摇晃而不致倒塌。地震过后，除掉断掉的钢索，重新焊接上新钢索，便可再用。

——美国罗卡巧克桥。该桥曲面斜拉，极具特色，虽因故未建，却是建筑界一致公认的和环境结合得最完美的一座桥。峡谷中，山高谷深，公路开在半山，隔河相望，无回旋余地，传统的建桥方法均不适用。林同炎想出了绝妙办法，将桥设计成U形，钢索锚固在两边的山体上，像网一样拉着桥体，极为壮观。该桥因其设计奇思妙想，得了国际建筑大奖。工程设计仅凭设计，并未建造出实体就能得建筑奖，一时传为佳话。

——位于中国的台湾关渡大桥。是一座三拱红色桥，造型简洁大方，跳跃着的旋律恰似一首小夜曲，和周围苍翠的群山相映又形成一首和谐的奏鸣曲。由于其美丽的外形，被台湾地区印在邮票上。

——波多黎各体育场遮阳棚。该体育场建于20世纪50年代，遮阳棚采用薄壳技术，预应力混凝土材料，从看台向场内斜伸出去，中间没有柱子支撑，长16米，厚度只有4厘米。设计时按功能性考虑，只是单纯遮阳，上面不附加任何东西。到了20世纪60年代，电视开始普及，使用方希望能在遮阳棚前沿加装照明灯和摄像机。望着既长又薄、下面毫无支撑的波纹形棚子，人人皆曰不可。无奈，请来林同炎现场指导。林携夫人来到现场，二话不说，拉着夫人的手，登上遮阳棚根部，向前走去。众人紧张地盯着逐渐弯曲的棚板，看他们从容地一直走到距顶端几十厘米处，此时棚板向下弯曲已达到20厘米左右。在场的人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都替夫妇二人捏着把汗。突然，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林同炎居然和夫人在棚的前端跳起来了！遮阳棚在他们有节奏的跳跃下上下震荡，前端振幅高达40厘米！就这样表演了几分钟，林才结束了冒险，在掌声中和夫人一起微笑着回到大家身边。他告诉大家，其实遮阳棚在设计时就已经把以后加载

的可能考虑进去了，只要均匀加载，每一波段上加两三百公斤，不会有问题。这就是预应力混凝土的优点，可以预先设计加载量。

——旧金山马士孔尼会展中心地下展览厅及停车场。该中心地下停车场分南北两个。北部的由其他公司按传统设计，里面到处是得二人合抱粗的大立柱，柱子上满是车子剐蹭的痕迹。南部的则由林同炎主持采用预应力混凝土后张技术设计，宽敞明亮的停车场无一立柱，几百辆车进出停放均十分方便。该展览厅建成若干年后，旧金山市政府感觉地面上的大片绿地太可惜，想加盖大楼，找林同炎探讨。林微微一笑："我早就算到会有这么一天，已经预留了载荷给地面建筑，在上面加盖四层楼，不会有问题！"事后，林伯伯就此跟我说："这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智慧，老祖宗早就教了，一鱼两吃嘛。"

——爱莫利维尔居民大楼。此楼位于旧金山对岸80号公路边，从北向南行快到海湾大桥时一眼就能看到左手耸立的一座白色30层三棱形居民楼。在此之前，工程界早有定论，由于旧金山湾区属于地震高发区，高层建筑只能是钢结构的，不适合钢筋混凝土结构。因为混凝土自重大、刚性差，地震时会垮塌断裂。林同炎不信这个邪，把这个楼的停车场设计成地下6层，每层又特别加厚，如此一来，下盘有足够的重量，地震来时，就像个不倒翁，任你怎么晃，我也不会倒。上层三棱形结构，地震力从哪边来，都有另外两边顶着，不跟着你晃，就不会散。1989年旧金山大地震，海湾大桥一块上层桥板因为晃动过大而掉落，而距离大桥不过两公里的此楼却安然无恙、毫发无损，验证了林同炎的设计理念的正确。

除了白令海峡，林同炎还将视线投向了直布罗陀海峡、台湾海峡。

位于欧非两大陆之间的直布罗陀海峡，水深流急，被桥梁专家视为造桥的难点地带。海峡最狭窄的地方，中间有一块小小高地，离水面有几百米。林同炎打算利用这块凸起作为中间点，造个人工岛，运去土壤种上花草，再从岛上向南北修桥，把两大洲连在一起。他把图

纸画好了，桥也设计出来了，就等哪一天，有人愿意出钱来把它实现。

台湾海峡最窄处有120公里。林同炎认为以今天的技术，修个连接两岸的大桥不难。他设计了一个原则性的方案，希望中华民族的后来人能将之实现。

林同炎和夫人高训铨伉俪情深，成就63年夫唱妇随的佳话。

林同炎18岁时，回家探亲，遇到父亲同僚——同为北平高等法院法官高某的女儿高训铨，此女时年方8岁，惊为天人。林同炎当时即对自己说：此佳女，将来我一定要娶她为妻！

10年后，这位高士其的堂妹已在西南联大读书，是外文系才女。已是青年才俊的林大哥来到昆明向高小妹求婚：嫁给我，跟我去美国吧！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民风淳朴，生活开放，好莱坞名人的住址，被印成小册子到处有售。林夫人在夫婿陪同下，常常按图寻觅，捧着厚厚的签名簿登门访求。名人们大多来者不拒，应铃开门，满足陌生人的要求。他们因此积攒下好几大本签名。当年我听说此事，十分好奇，觉得今日名人收集的昨日名人签名，文化意义非凡，希望有缘一睹。可惜经二人数日翻找，未能找见；二人说，肯定没丢，只是年代久远，册子或许静静地在家中哪个角落睡觉罢了。如今林伯伯已仙逝，林伯母今年(2018年）也九十有六，如能找到此宝，该是何等珍贵！

索画

1962年，母亲参加第二次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和父亲一起住在民族饭店。某日半夜母亲突发心肌梗死，她推醒父亲，自感不久于人世，冷静交代了后事，之后很快手脚冰凉、口不能言。事出仓促，父亲惊得手足无措。幸得住隔壁的杜庆华（杜宪之父）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要母亲平躺勿动，节省能量；同时及时通知会议医疗组医生到场抢救。母亲获救，转入北京医院继续治疗。此前，梅兰芳也因同病处于危险期在北京某医院住院，几日后不幸在如厕时因大便干燥用力过猛引起再度发病而去。有鉴于此，北京医院方面十分警惕，对母亲的饮食格外注意，让她保持大便通畅易排，加上其他种种措施，母亲顺利度过了危险期。

出院后不能马上恢复工作，需要疗养。母亲祖籍浙江萧山，从1954年起，便被选为浙江省全国人大代表。虽然生于苏州长在北京，但有此渊源，与浙江省人士倒也不生疏。时任浙江省省长周建人便邀请母亲去浙江疗养。母亲也觉得身为浙江人大代表，可借此机会与祖籍山水亲近，了解浙江民情。经请示北航领导获得同意后，母亲就到浙江医院疗养去了。

住在人间天堂杭州，母亲安心养病，身体恢复得很快。同时在该院疗养的还有江青。母亲和她住得不远，抬头不见低头见。江青从不和人打招呼，母亲不卑不亢，也没有主动结识的意愿。一年之间，两人见面互相点头，竟无一语交谈，也算是奇事了吧。

不少朋友得知母亲疗养的消息后前来探望，其中来得较勤的，就有国画大师潘天寿。潘每次来，母亲和他海阔天空，谈古论今，却从不问画。在此疗养将近一年，母亲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回北京了。潘

天寿知道后，很好奇地问：“陆大姐，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又一直不好意思问。现在你要走了，我怕再不问就错过了，你可别怪我啊？”母亲说：“我有那么吓人吗，什么问题呀？”潘犹豫了一下说：“认识我的人，都跟我要画。有的人绕很多弯子，目的就是来要画。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常见面，你却从没开过口，是不是看不上我的画啊？”母亲一听吓了一跳，赶忙解释：“不是不是，你那么大的画家，我又不懂画，哪好意思开口呀？听你这么一说，我要是不跟你要，倒是瞧不起你了，那就麻烦你给画一张吧？我这里先谢过了。”

一周过去，潘天寿却没露面。母亲心里嘀咕：这下坏了，没跟人家要画，把人给得罪了，该怎么赔罪呢？正寻思着，潘带着画来了！

展开一看，母亲傻眼了：一尺多高四尺多宽的白纸，右上角画了两只小鸡，左下角盖着一方红印章，写了几个字，其他什么也没有！她心想，他弄这么个东西糊弄我，肯定是生气了，而且气还不小！心里想着，嘴里却谢着。潘天寿见这架势，没坐多一会儿就告辞了。

回京后，母亲给父亲讲了画的来历。

父亲也不懂画，觉得既然是潘天寿送的画，出于礼貌，应该把它裱起来。

父母去了荣宝斋。画一展开，装裱师傅大吃一惊！仔仔细细看了几遍，小心问道：“您跟潘先生关系不一般吧？”父亲问此话怎讲，师傅接着说：“我见过潘先生的画多啦，却没见过他画鸡，更没见过画得这么好的鸡！”母亲一听，连忙问道：“怎么个好法，您给说说？”师傅解释道：“中国画最难的是留白。您看这两只小鸡，回头望向远处的红印。寥寥几笔占了右上，一方红印占了左下；小鸡的目光，则从右上向左下穿过整幅画充满了空间，令全幅不空！看似空白，却饱满，精品哪！”

再见到潘天寿，母亲连连道谢：“谢谢你的精品！”潘哈哈大笑：“那天我一看你的表情，就没敢多解释。为了这幅画，我整整想了5天哪！送陆大姐的画，必须拿得出手嘛！”

家教

钟道隆从小随母亲和哥哥生活在浙江农村老家。他父亲钟士模，抗战前就在清华任教，“七七事变”后随学校去了西南联大，随着国土的沦陷，通信中断，音讯全无。他母亲小脚加文盲，独自带着两个儿子在老家。耳旁不时传来关于丈夫的各种传闻，有人说某人某天在某处看见了他，身旁有个女人，又有人说看见他怀里抱了个孩子……道隆母亲相信自己的丈夫，觉得丈夫不是那种移情别恋的人；直到有一天消息传来，家中亲戚亲眼看见丈夫在西南联大操场上打球，旁边还有一个不大的孩子，他在外另娶了。道隆母亲非常绝望，整日以泪洗面。幼小的钟道隆知晓母亲的心思，亦步亦趋，生怕出现意外。果然，有一天母亲在河边洗衣服时欲投河自尽，道隆紧紧拉住不放，救下母亲一命。

道隆这时明白了，父亲是天。

抗战胜利后道隆接到父亲来信，才知道他获得了进修的机会，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和博士。母亲那颗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博士和文盲，能生活到一处吗？1947年夏天，获得博士学位的钟士模只身回到老家准备带全家去北平生活，各种传言不攻自破。这时的道隆觉得父亲像座山，是全家人的靠山。1948年，钟道隆随父亲来到北平进入成志中学（清华附中前身）。母亲带着大哥仍留在老家。

来到北平，家里就两口人，便和几位无家室之累的教师常迥、唐统一、李丕济、褚士荃等搭伙，偶尔章名涛与其儿子章扬忠也来光顾，专门请一位名叫柴善清的中年厨师，就在钟家起伙。说起这位柴师傅，手艺十分了得。道隆那时年纪小，只知道好吃，并不知道究竟有多好。可惜之后散伙了，柴师傅去了北京饭店！这几位教书匠凑在

一起，饭前饭后免不了谈天说地，纯正的国语中不时夹杂着英文。道隆开始听不懂，有时问父亲，父亲也不理会，并不多加解释，让他慢慢揣摩。道隆懂事，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辩论，渐渐地他能听明白了，又过了一阵，大概能听懂他们在谈论什么，再往后为他们争论哪门课该如何讲哪个词该如何解释感到敬畏，有时候看到这几位争得脸红脖子粗，也不免替他们捏一把汗。争归争，吃归吃，清清楚楚，吃完饭、嘴一抹，大家啥事没有。

道隆人是到了北平，一张嘴却是满口浙江土语，不会说北京话；换作今日，还不急坏了钟士模？但他对儿子的学习不是只看眼前，而是从学习方法入手去解决根本问题。例如一日，有道数学题，道隆怎么也做不出来，便起身走到父亲面前请教。钟士模闭着眼正在听京戏，没有直接回答那道题应该怎么做，而是要求他回到原地大声读题。道隆这边读题，钟士模那边照听他的京戏。读完一遍，钟士模仍然无动于衷，只是说："再读！"读到第三遍，道隆告诉父亲，我懂了。钟士模此时才开了口："做题，首先就是读题。教科书上的题都是针对学过的内容出的，只要读懂了题，应该不难。所谓做不出来，基本上都是没读懂题就急着下手，要有读懂题再做的习惯，才是会学习，才能举一反三。"

道隆大受启发，从此养成了认真读题的习惯，那些所谓的难题多读上几遍往往就解开了。

初二时道隆学平面几何，老师先从书名讲起，称明朝徐光启等人非常巧妙地把geometry译为"几何"，它既是音译，又是意译。接下来，老师又介绍"平面"二字是针对"立体"说的，将来你们上了高中，就要学立体几何……钟道隆回家把这位老师讲课的情形说给父亲听，父亲称"这位老师讲得好，学习就应该这样，首先要搞懂书名"。初三学平面三角时，钟道隆问老师，什么时候学立体三角？老师答不上来。回家问父亲，他才知道平面三角是相对于球面三角而言，并没有立体三角。父亲非但没有责怪他问这种刁钻的问题，反而

对他这种举一反三的“问题”大为欣赏，很是夸赞了一番，鼓励他说：“今后就要这样学，只有问到老师都回答不出来，才算真正学会了。”自此之后，钟道隆养成了“每事问”的习惯，经常问老师各种问题，因此深得老师喜欢。大学高等数学口试，满分5分。主考的老师给了钟道隆6分。别人问为什么？老师的回答令人叫绝：“我问的问题他都回答得很好，他问我的问题我有的回答不上来，所以6分。”

道隆功课日进，面临上高中了。那时清华还没附中高中部，他在思考报考哪所中学好呢？

我家那时与钟家住得不远，父母晚饭后散步顺便拐去钟家坐坐是常事。因父母皆是北师大附中毕业生，钟士模便将此事请教。母亲陆士嘉一路北师大附小、北师大女附中、北京师范大学，皆为头名，对母校推崇备至，当然推荐母校。他们走后，钟氏父子有一段对话：

张伯母说北师大附中好，你就考它吧？

不。

为什么不？

考不上。

为什么考不上？

太难。

有考上的吗？

有。

为什么不是你？

……

那晚，躺在床上，道隆翻来覆去想父亲最后的这句问话，最后下了决心，非考上北师大附中不可！还真就让他考上了。

这成了钟道隆一生的转折点，北师大附中的优秀教师们更进一步教会他如何学习。此后，他养成了事事争先的习惯，要做凤毛麟角的优秀者！高一参军后，钟道隆与高二、高三的同学编在一起，仍然成绩优秀！

在北师大附中，钟道隆养成了钻研的习惯。

有的问题，他从初中一直钻研到大学毕业。比如，他在学习了严济慈编写的初中物理的“球体表面积最小”一课后，仍有疑问，直到工作，方知一般大学里所学的微积分课程解决不了此问题，要学习更深的数学知识才行。

大学毕业后授衔，按规定一般授少尉军衔，钟道隆和另一位成绩优异者直接授中尉军衔，随后不断进步，直至少将。

他45岁开始学英语口语，一年中用坏了十几个录音机，由此发现录音机的不足，发明了复读机，而后又放弃专利，为的是让广大学生能尽快用上它。

钟道隆到解放军通信学院任副院长，到任后三个月，他便能背出学院所有教员的名字，不仅如此，还能把他们一一对号，谁和谁是夫妻，家住哪里，电话号码是什么……为此，他翻烂了6本干部花名册。半年之后，大部分学生的名字他也能叫上来了！

聪明、勤奋、有方法、会学习……都对。但是最主要的，是好学肯问。

为了把人和名对上，钟道隆除了学和背，见到老师或学员，就自问“他是谁谁谁”，然后与随身带着的花名册对照。如果错了，就连续纠正20遍。古人早就教导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真正把这古训落实的能有几人？面子、地位、年龄，太多因素让人张不开嘴。钟道隆只关心真本事，一门心思要把工作做好，其他都不在话下。

知易行难，行胜于言，钟道隆做到了。

……

随着年龄的增长，钟道隆越来越觉得，是清华提倡的严谨、蒋南翔强调的求实，是父亲的言传身教，为自己提供成长的沃土、动力的源泉。

唯才是举

父亲对好学生有偏爱。在他整个教学生涯中，如果碰到优秀的学生，总是不遗余力地出手帮助，创造机会，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清华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学校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和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老教师纷纷到一线讲课，课堂常常人满为患。

其时，中国科学院已在严济慈、华罗庚等老科学家的建议下，于恢复高考半年前办起了业余科技大学，把北京地区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学习大学课程，毕业后充实到科研第一线；我也因在物理所工作，才有机会再次走进校门。

李欧是清华数学教研组的头牌老师，父亲要我去旁听他的高等数学课，并嘱我尽量往后坐，不要惹人注意。

提前进阶梯教室，选最后一排中间坐好，眼看几百学生鱼贯入场、坐定；待李欧往讲台上一站，喧嚣的大课堂立马鸦雀无声！

我听得全神贯注，旁边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人坐下后不久即对李欧的讲课有所反应，先是摇头叹息，似乎很不满意，后来发展到小声嘟囔“怎么能这么讲？”“这段讲反喽。”我感到很气愤，几次扭头愤怒地盯视他，却全无效果；这是个什么人？不像是来听课，倒像是来挑毛病的。

回到家吃晚饭时，父亲问我听课情况。告知李欧讲得确实好，不但条理清晰，板书也好，美中不足是有一讨厌之人，不时在旁边品头论足，批评李欧，而且不知收敛，提醒无效，十分扫兴。

说话间，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门开处，赫然站着他！

父亲放下饭碗，走向客厅沙发，我凑在父亲耳边小声说这人就是我刚才提起的那个“不知趣的人”。父亲哈哈大笑，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张克澄；这是袁传宽，华罗庚的高足，北大数学系68届高才生。”坐定之后，袁传宽就仔细向父亲汇报李欧讲课的优点和他认为可以改进之处。听到后来，我明白了，袁传宽即将接替李欧讲微积分大课。

“文革”期间，袁传宽在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临夏中学教书，要问他教得怎么样？当地流传这么一个故事：

临夏军分区司令员想请袁老师辅导自己的儿子，为此亲自登门拜访。不巧，正值袁传宽在午睡。警卫员立即就要去叫醒他，被司令员伸手制止了，“让袁老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才能教好孩子”。司令员愣是在门外静候了一个多小时，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程门立雪”。

听了父亲的介绍后，我将信将疑去听袁传宽的课。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平心而论，他讲得确实比李欧好，原因是他对中学生的问题拿捏得很准，了解他们的心理和水平，对“文革”中入学的这批基础不整齐的大学生而言，更是能把学过的知识调动起来，真正地做到深入浅出！加之他一口标准普通话，一手漂亮的板书，人又长得帅气，学生们都被他吸引住了，课堂秩序好，气氛很活跃。

听完课后父亲照例问我的感受，我不禁好奇：“他是一个北大毕业生，你怎么这么了解他？”

父亲莞尔一笑：“这是华罗庚专门写信向我力荐的人，华先生推荐的人应该错不了。”

父亲当时是清华主管教学科研和外事的副校长，也许华先生觉得父亲能把袁传宽重视起来，因此把他推荐到清华而不是让他回北大。

在那个时代，要从外地调个人进北京，比登天还难，更别说一家5口了。

甘肃闻知清华来调人，始觉袁传宽是宝贝，坚决不放，并立即安排将他调往兰州大学以示重用。若要一般单位也就知难而退了，父亲偏不，他想方设法和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联系上了，经过几番斡旋，宋平同志亲自批准，才把他们一家，还有另一位数学天才祁力群一家，接进北京，来清华。

在证明了袁传宽确实是个数学才子后，父亲和数学系系主任肖树铁商量，安排他出国深造。

谁也没想到，本以为顺理成章的事还闹出个一波三折来。

系里通过了此事，该往学校上报名单。名单到了父亲手里，他一看，怎么没袁传宽？就问外事组经办人小×:“数学系有个袁传宽，怎么没在名单里？”小×回答：“他不合格。”

父亲奇怪了：“系里报上来的人，你们只要照录照报就好了，怎么还有合格不合格一说？再说了，合格不合格是我的工作，不该你们管呀？把他报上来！”

袁传宽的名字总算报上来了，学校也通过了，下一步就是把这些人送到语言学院进修一年。进修名单报上来，父亲一看，袁传宽又不见了！

怎么回事？

还是这位小×，理由是：没经费。

父亲想想也是，数学系没有科研项目，确实没有太多经费，小×说得有理。但袁传宽是个人才，这样的人不送出去培养太可惜了。便对小×说：“你只要负责把他加到名单里就可以了，至于有没有经费，是学校考虑的问题，由学校负责解决。”

父亲觉察到这事里面有蹊跷，回到家便叫我把袁传宽找来，问道：“你和小×有什么矛盾，他为什么三番五次阻拦你呀？”原来，他们同住一个小院，院内只有一间厕所，袁家人多，孩子们每日早上

占住茅坑就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弄得别人怨气冲天。明白了缘由，父亲乐了：“这个小×，他也是想不开。他应该积极送你出国才对呀，你走了，还少个人跟他抢厕所嘛！”

要到语言学院去培训了，袁传宽先要填写报名表，全英文的。袁怕自己填错了露怯，拿来请父亲审阅。父亲拿过来只看了一眼，便将它放到袁面前的小茶几上，用手轻轻点着，说：“袁传宽哪袁传宽，这表上的单词，可都是最基本的英文啊。就这些词你还不认识，还要在旁边注上中文，你可要加油了！”

许多年后，听过袁传宽流利的英文演讲后，我夸他的英文真棒，他不无感慨，就是因我父亲当年轻轻敲在小茶几上的那几下，像锤子一样把他敲得羞愧不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英文学好！虽然语言学院离清华只有公交车一站地，节假日他也不回家，埋头苦读，一年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从此就自由了。他说：“真感谢张先生当年那一敲呀。”

经过这一波三折后，袁传宽终于进入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拜在一代数学大师樊玑教授门下，获得博士学位。

说起这位樊玑，非数学界人士可能不知道，我简单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留法学习科学的最高成就是拿到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一共有4位得此殊荣：严济慈、钱三强、汪德昭，再加上樊玑。前三位都是物理学家，唯独樊玑是数学家。由于他学成后去了美国并长期居美，因此不大为国内所了解。20世纪中国数学界中，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大家一共只有三位：华罗庚、陈省身和樊玑。

袁传宽原是华罗庚的学生，现在又成为樊玑的博士生，足见他实力不凡。

拿到博士学位后，袁传宽准备回国。束装就道之前，他给旧金山中国总领馆寄去一张支票，将自己当年向总领馆借的钱还上。教育领事赵珍兰收到支票非常惊讶，因为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公派留学生借

了总领馆的钱主动归还的事发生。她向总领事汇报后，总领事也很意外，非常重视，派赵珍兰和另一位领事专门开车几百公里到圣塔芭芭拉看望袁传宽夫妇，表扬他们的爱国行为，还赠送了一笔路费以为奖励。对于这笔意外奖金，袁传宽至今也没想明白，当年说的就是“借”，不是申请补助，之后我有能力了，把借的钱还上，难道不应该吗？当年那些借了中国驻外使领馆钱的公费生，如今定居海外或回国高就的成功人士们，这笔账是否还挂在那里？

袁传宽回到清华，正赶上一个月后有个国际数学会议在伦敦召开。清华数学系苦于没有合适人选和经费，有人提议派袁传宽去，但也有人意见很大，认为怎么好事都让袁一个人占了？父亲知道了，力排众议，认为正是因为袁刚刚回来，熟悉外面情况，英文又好，去开这个会，把关系接上，学校和数学系都受益，还是让他代表清华去参会了。

这以后，袁在数学系的教学科研上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做出了不少成绩，很快获得提升，成了正教授，登上数学名人录。

顺便说说袁的夫人郝凤岐，她的哥哥姐姐都是刘仁手下的地下党员。郝初中还对数学无感，考试常不及格；高中考上了北师大女附中，突然对数学开了窍，高二时拿到北京市数学竞赛第一名，其后又考上北大数学系，和袁传宽成了同学。郎才女貌互相看对了眼，结为夫妇，自此相夫教女，形影未曾离。

袁传宽母亲去世，带给他无尽的悲伤。此后他性情大变，深居简出，最后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将近10年，大家也没有他的信息。我逢人便问，仍未能知晓。

2013年父亲百年诞辰纪念会时，我以为袁传宽会来，因为他曾跟我说过，他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两位先生就是华先生和张先生，没有他们就没有他的今天。可是直到会议结束，也未见他的身影。

2017年年初，从一朋友处偶得他的邮箱地址，尝试发出邮件。

同年，4月的某一天，我在洛杉矶的家中忽然接到他的电话。畅聊了几个小时方知，他们定居在硅谷南边一个祥和的小镇，安度着晚年。当他听说我在为父亲的传记忙碌时兴奋地说，他们夫妇俩现在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把樊矶先生留下的大批材料搬回了家，每日笔耕不辍，希望早日为中国读者奉上《樊矶传》。

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

1991年返美路过东京，我在机场转机正推车走着呢，冷不丁被人拍了一下肩膀！我一激灵猛回头，嘿，万万想不到是孙立哲！更想不到，他一张口竟是："我老婆得癌症刚走，我也得了癌症，还有一年。"看他红光满面笑呵呵的样子，我是疑八信二。见我不信，立哲直跟我急。不管怎样，我们在成田机场照了张相算是作为留念。

我跟立哲吧，说不熟，见了面握手拍肩有说不完的话，数数也是几十年的交情；说熟，一只手能把交情算出来的事就那几件。一直到近几年为了救陈小悦[注]，傍在一块儿一年多，才真算是彼此知道心肝肺都在哪儿啦。

2017年1月5日，是发小陈小悦70岁整寿。思及此事，小悦最后与恶疾奋斗的日日夜夜，又涌上心头，特别是和孙立哲及常氏三姐弟一起为救小悦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那几个月，过去7年了，仍然难以忘怀，常常在梦中萦怀。朋友们每每提起，稍一触及，便痛彻心扉，难以下笔。前段时间，小悦生前在云南勐海经营的，一个本着环境保护理念建立的原生态茶园——勐缘茶园，遭到当地恶势力的侵入，引起小悦生前发小、朋友和学生的愤慨与关注，也由此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2008年春节期间，我突然在美国家中接到立哲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上来就问我，能不能安排时间紧急回趟北京？

"什么事这么急？"

“小悦病了，病得很重，需要马上找施小墨开药。号太难挂，也只有你陪着才能找到他。”

两天后的晚上，我在清华甲所六号厅外，见到了小悦、立哲和谢毓泉。让我十分意外的是，小悦一如既往地健康、健谈，丝毫不见病容。立哲和谢毓泉把他的病形容得很严重，同时，我又听两个大大夫都如此说，不由得我不信；当即联络表舅施小墨，第二天就陪小悦去看病抓药，开始中西医兼顾的治疗。

再往后，赵伟国捐了两百万，立哲及常氏三姐弟常放、常振工、常振明和我组成了一个5人小组；常振明联络各方大员，常振工找钱，立哲、常放找药，我负责管钱、联络各有关方面及清华子弟，我们开始与时间赛跑，抢救小悦。

2009年七八月，正是抢救小悦较劲的时候，我跟立哲几乎一两天见一面，商量对策。他每天只睡3小时，最高纪录一天发100多封电子邮件跟全世界的医学专家讨论小悦的病情，研究治疗方案，但精气神却比我们所有人都好。忙成这样，他还同时指导一群学生做投资研究。一晚，他把我和陈小茁（陈小悦的弟弟）叫到房山的一个研发基地听他讲课，讨论常放新找的一种药物，分析此药的利弊。

立哲站在白板前写写画画，手里的笔划在板上嗞嗞作响，嘴里不停地讲，比较各种可能。

我眼前突然闪出17年前的东京成田机场候机楼，想起他说的“我还有一年”，却怎么也无法和眼前的这位得过癌症、浑身是病，但表现得生龙活虎的人联系在一起。听着那洪亮的嗓音，望着那发光的面庞，我问自己：这就是18年前说自己还有一年的那个人吗？这分明是个仙嘛，孙大仙人！回家我赶紧找出当年的照片，发给认识他的亲朋好友，名字叫“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

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立哲的影子，从小到大直到今天。一晃又是11年过去了。到今年3月19日，小悦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据说，医

学的进步已经离战胜癌症只差一步之遥。

神人孙立哲，经历过“文革”的劫难，抗争过癌症，还活得好好的，继续着他跨过这一步之遥的努力。

立哲加油！

---

1. 陈小悦（1947—2010），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前院长。——编者注

第四辑

传承

清华园里每一棵树、每一片草都有我的足迹，我的根就在清华。

旗帜

清华105年校庆时，习主席的贺信开头就称“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这句话让从小在清华园里长大的我眼眶一热，不禁又想起了那渐渐远去的年代及那个年代的人与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学习苏联经验，为了面向工农办学，在大学开设工农速成中学。苏联在大学办工人系，专门招收工农学生，学制三年，主要补习中学课程，三年后进入大学。中国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工农速成中学，1951年开始先是北京大学，然后是人民大学，接着是清华大学。

蒋南翔来清华前，工农速成中学已办，但问题不少。

蒋到任后，非常关心大学向工农开门，就把李卓宝调到工农速成中学任副校长兼党组书记。为此，蒋专门找李谈话，指出办好此校的意义和重要性，鼓励她担负起领导责任，主管教学，把学校办出水平、办出成绩。

李到任后，先做调查，发现学生中多为老干部、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但大多数文化水平低，真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的不多，此外学生年纪偏大，还有家庭负担。因此，要用三年时间完成中学六年的学习任务，困难重重。但这些学生说：“我们是受阶级的委托来上大学的。”所以他们学习非常的努力、刻苦，结果很多学生都患了神经衰弱。

老师们也认为，三年完成六年的任务太困难了。教材是普通中学的教材，只好进行压缩，把几个定理合成一个定理来讲。也因此，学生学起来更困难。工农速成中学本是为了大学向工农开门而创办的，

调来的都是好老师，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老师普遍觉得这些学生教起来太困难，很是苦恼，有些不安心教学。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延长学制呢？

李卓宝通过调查掌握了这些情况，就去找蒋南翔，指出：工农速成中学按现在这样办不行，六年任务三年完太困难。这些工农干部文化水平偏低，教材、教学计划等也不合适。因此，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又指出，要是给教育部写报告的话，等批下来，会拖很长时间，但这是个迫切的问题，拖下去，既不利于学生成长，也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学校的发展；要不然的话，就降低要求，让学生到时毕业就完了。

蒋南翔听完汇报，沉吟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首先，这些工农干部来学习很不容易，我们不能降低要求，相反要严格要求。我们还是要按照既定的办学目标，把他们从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到大学的水平；少数确实难以提高到上大学水平的，也扎扎实实地给他们补文化课，他们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将来回到工作岗位也可以很好地工作。我们千万不要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让他们毕业，那是对他们不负责任，是对党的教育事业不负责任。"

李说："可是在三年时间内无法让学生达到预定的目标呀。"蒋指示："这样，你现在回去，就把学制改为4年，教学计划、教材、课程等，你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改。"又叮嘱说："你一定要做好老师的工作。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安心工作，为工农教育事业献身服务。"李卓宝听了心里头打鼓，很有顾虑，想："没经教育部批准，我们就改学制，是不是不妥？我是党组书记，要是做好了还好说，要是做不好，影响可就大了。"蒋看出了李有顾虑，就说："作为共产党员，做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很明显，苏联的三年学制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因为，第一，我们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比苏联工人低，苏联的工业化程度比我们高，他们教育水平也比我们高。既然三年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共产党员就不应唯上，只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

而要从实际出发。我知道你有顾虑，这样吧，你回去只管大胆地干，干好了是你的功劳，办不好我蒋南翔负责，你没责任。这事不能拖，你现在马上就回去干。”

李卓宝据此，团结师生，把学制改为4年，教学计划、教材、课程等也都改了，效果很好，学生和老师都非常满意。蒋南翔把教育部工农教育处处长师唯三请到清华工农速成中学视察。视察完后，蒋南翔才提出工农速成中学原来的学制、教学计划、教材、课程等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都得改，否则学生和老师都受不了、吃不消。师唯三根据视察的情况接受了这个意见，并指导全国的工农速成中学都进行了改革。清华因为改得比较早，近半数的学生都上了大学，其中34%的学生考入清华大学（都是通过参加统考上的）；没有考上的，也提高了文化水平，回到工作岗位后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1954年工农速成中学最后一届招生，这届学生毕业后，学校就停办了。李卓宝本来是学心理学的，就准备回心理学岗位搞业务，遂到北京大学听巴甫洛夫心理学课。北大心理学系主任周先庚看到李卓宝，想让她到北大去，科学院心理所也提出要她去，蒋南翔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李卓宝找到他家里去谈话，动员她抓清华大学基础课工作。

时值1957年，国内正在进行反右斗争。运动中，清华基础课受到严重冲击。基础课党总支和物理教研组党支部的主要干部都被错划成右派，党组织瘫痪了，不能开展工作。李当时一心想搞业务，不愿意。蒋南翔说：“心理学确实很重要，但这个学科还不成熟，最重要的对我国当前来说，心理学不是最迫切需要的。我国正在努力实现工业化，迫切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人才，而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基础课是很关键、很重要的。共产党员在选择岗位时，不能完全从个人兴趣出发，而应更多地从国家和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接着，他语气一转，面色凝重地说：“其实，我要你到这

个单位去，你真正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讲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我相信你定能不负所托，把工作搞好。”

蒋南翔一直非常重视基础课教学，他这样安排一是信任李卓宝，二是要李从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才培养的高度来看清华基础课教学的重要性和意义，三是要让李懂得共产党员应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来考虑工作岗位。李卓宝的思想很快就通了，加上被蒋南翔这一激，挑战困难的雄心也勃发出来，于是，李卓宝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任务。

李接手基础课工作以后，立即用上调查研究的法宝，发现问题千头万绪，但根本上是因为大家对基础课的认识不够，要彻底扭转这种局面，让大家重视基础课，首先必须提高思想认识。于是，李卓宝找搞基础课教学的江丕权商量，从为什么基础课是培养工程师的关键、为什么要先学好基础课着手解决问题。

问题归结为四：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古典理论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哲学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何东昌又在此总结的基础上帮助众人学习马列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分析这些问题。不久，何就写出一篇文章。蒋南翔知道了，要了稿子看。他看得很细，稿子上改得满满的，并对李卓宝说：“你们做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很重要，的确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我们一定要坚持基础课的重要性，坚持基础课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蒋、何指导下，李卓宝等又把文章做了进一步的修改。《红旗》杂志知道了，要发表这篇文章。李卓宝又找蒋南翔，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好啊，这就说明你们做得对啊。”但他又特别地指出，关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基础课改革的问题不用登。他说：“你们做的是对的，需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基础课改革。但我提醒你注意，《红旗》一登以后，全国的基础课教师都会跟着学，但全国的基础课教师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是不同的，差别非常大，教基础课的教师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不多，搞得不好，很容易简单化。所以，这一段你先不要发表。”关于基础课与专业的关系，原文

是基础课要结合专业，蒋南翔建议改成基础课要面向专业，因为“按我们的提法容易导致把基础课原有的系统打乱，而‘面向’就不一样，基础课还是基础课，保持原来的系统。加强基础课是要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这很重要，不要把学生培养成完全是实用性的人才”。这篇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后影响较大，不少学校的基础课教师都来联系，要学习清华的经验。

李卓宝从工农速成中学调到基础课时，正值“反右运动”，基础课党总支和物理教研组党支部都是重新组建的，干部都很年轻，思想也比较“左”。李卓宝根据蒋南翔的要求，团结这些年轻干部，说服他们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她一去就召开辩论会，辩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辩论会上，有的人说这些教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敌对阶级，因此这些教师都是敌对的，不能够团结。还有人说有些教师的历史、社会关系复杂，他们不能作为团结的对象，只能作为改造的对象。李卓宝就根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一批驳。通过几次讨论后，大家的思想终于比较统一了。李卓宝把基础课党总支讨论的有关情况向当时主持学校党委的刘冰做了汇报。刘冰说，“你抓得很好，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并让李在一个干部会上做了介绍。参会的市委来人写成材料报上去，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材料，专门做了批示，说“宁左勿右”不独清华，全国都是有的，要求“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毛主席的批示下达后，蒋南翔刚从外地回来，就到基础课教研组来，详细了解有关情况。李卓宝把大致的情况跟蒋汇报后，他决定在基础课党总支蹲点，说：“以后你们总支开会都告诉我，我有时间就来参加。”说到做到，尽管校长工作千头万绪，不能事事顾到，但只要李去找他汇报，他总是能很好地帮助解决问题。

基础课教研室有一位老师俄文非常好，曾在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过。让这么一个人来教俄文，很多干部反对，怎么能找一个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过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呢？这个人不能要，赶紧把他调

走。李卓宝就跟他们讲："基础课的老师比较缺，这位老师尽管历史比较复杂，但已经坦白交代了，他的俄文又那么好，我们应该用他。"个别干部就是不同意。她只好去找蒋南翔说明情况，蒋南翔说："这是政治上的洁癖，要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他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过有什么关系啊，都已经坦白了嘛，都改了嘛。改了就好，一样可以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解放战争时，我们俘虏了国民党特务，有搞情报的，有搞电台的，都放手使用。他们有那么好的技术专长，有什么不敢用的？今天，你们一定贯彻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好这些人，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接着，他又对基础课教师队伍的状况做了分析，认为，基础课教研组虽有几百人，但全校所有的学生都要上基础课，各科教师的任务十分繁重，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我们正迫切需要高水平的教师，这位老师俄文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呢？蒋南翔又开导李卓宝："我知道基础课教师中有的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所以一遇运动，就冲击得厉害，伤及学校的教学。你作为党总支书记要想继续把工作做好，就始终记住一点，团结百分之百的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蒋南翔敢说这样的话，需要何等的勇气！

蒋南翔非常注意听取群众特别是老教师的意见，严格按教育规律办事。当时"左"的思想流行，有行政领导曾提出"天天改，堂堂改，满堂红"的口号，发动教师搞教学改革，基础课的教师提出有困难，就被认为是保守。有老教师说："基础课的教学内容有一定的系统性，比较稳定，教学改革应经过认真的研究，有计划地进行，不能天天改、堂堂改。"李卓宝将此向蒋汇报，他说："要尊重老教师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反映了一定的教育规律。"经过共同讨论，双方达成了共识，就不再提这个口号了，从而保证了基础课教学改革有计划地进行，教学质量得以稳步上升。

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粮食短缺，人人吃不饱。学校发现女生身体普遍不好，蒋南翔很担心，专门找来李卓宝嘱咐她抓此事。

李卓宝是清华党委成员，曾做过女生工作，细心又有担当。接受任务后，她立即组织一个由校团委女生干部、校医院的妇科主任组成的工作小组着手调查研究。调查结果令人很震惊：70%的女生闭经，60%~70%的女生患有浮肿病。

这么大面积的病状，妇科主任也没想到，她面露难色地说："一个个治，太难了！这样下去会耽误事的。"

李卓宝带人进一步深入调查：兵分两路，一拨人查文献，另一拨人走访学生。

英文文献中无记载，俄文文献上仅记录苏德战争时期有大量妇科病发生，原因是营养不良，却没有治疗方法。

学生走访的结果也出来了，总结起来：首先营养不良，其次不讲科学。

"营养不良"容易理解，在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不讲科学"却是从何谈起？清华大学可是一所传播科学的高等学府。

这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人们思想普遍比较"左"，宣传男女都一样，男同学能干的，女同学也能干，造成女同学即使在生理期，也不愿说、不敢说，生怕被人指责，咬牙跟男同学干一样的重体力活儿，长此以往落下妇科病。此外，还有个让人始料不及的原因——厕所。

这又从何说起？

原来在设计厕所时，男女宿舍设计的都一样，其实这种设计方案不仅在清华，全国皆如此。调查人员注意到：每天早上，男厕所进出通畅，满足使用，女厕所门口却排起长龙，有些女同学排不上队就憋尿，结果就憋出病来了。

李卓宝带着小组成员找到协和医院林巧稚大夫，林说：“这是大面积营养不良引起的病。”

林的判断没有错，虽然学生吃饭国家有定量，但男女一起吃，同样的饭费，男生饭量大，吃得多，女生饭量小，吃得少，一大半主食都被男生吃了。菜本来就不多，偶有肥肉，女生不爱吃，男生则无所谓，肉也都给男生吃了，这样一来，女生的营养跟不上，渐渐就浮肿了。

林巧稚接着告诉她们：“从营养上说，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女生应该多吃豆子、花生、芝麻等种子类食品，男生就不一样，有鱼、肉就足了。”临走之际林巧稚又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再让女生参加重体力劳动。

听完李卓宝的汇报，蒋南翔也很紧张：“这可不是小事，要尽快想办法解决。马上停止女生的重体力劳动，另外，可以专为女生办食堂，和男生分开，还有，增加女生厕位。”

清华是不是第一个在厕所上做到男女有别，有待考证，但是，清华女厕所厕位的增加确实从实际出发，解决了大问题，给全国高校做出了榜样。

办女生食堂，想法很好，阻力却很大。首先是后勤觉得麻烦，不愿意干；其次有些女生反对，说男女都一样，我们不搞特殊化；一些女干部提出，吃饭时要跟男同事交换意见，搞女生食堂，这是培养女生的娇气！

反对声中，蒋南翔决定先选一两个系试办。少供肥肉，多供豆类食品，主食方面也花样翻新。没了男生的争抢，女生每天能吃到8两以上。试办一段时间后，有些女生的月经马上就正常了。大家一看，这个办法好，纷纷改变看法，女生食堂就这样在全国推广开了。

几十年过去，李卓宝回忆这段经历时感叹：“蒋校长那时候身体也不好，却一直惦记着女生的健康。我当时正抓基础课，负担极重，

加之十几年没搞学生工作，表示有困难。没想到蒋校长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这些女学生不仅要培养成为红色工程师，将来她们还是母亲，共和国的母亲，她们的健康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后代！”

好一个“共和国的母亲！”蒋南翔心中装着的是国家民族的未来。

重视实验是清华的传统，蒋南翔更是在1963年7月12日清华大学第二次实验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没有实验室的水平，就没有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技术的水平。清华大学之所以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成为国内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第一流的大学，与其重视实验室建设密切相关。

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清华大学教工队伍中，地位、工资最低的人却是管理实验室的实验员。这些实验员以中专毕业生居多，与他们同期、相同学历，分配到工矿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不少已相继晋升为工程师甚至高级工程师，而他们来到高校，却死死地待在实验员的位置上不变。这大大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矛盾就像火药桶，遇火即爆。

实验室负责人蒋景华和奚和泉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们将实验员的情况写成调查报告，交到学校。常务副校长滕藤和主管副校长张维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想要稳定这支基本队伍，必须设法解决他们的职称问题，可他们文化水平确实不高，不能为了解决矛盾而违背国家政策、降低晋升标准呀。经过商讨，学校决定：由实验室科牵头，请数学教研组和外语教研组为实验员开设高等数学和外语课，考试通过者可以升级。

方案一出，立即令实验员们觉得有了出路。恰在此时，清华发生了一件大事。1981年世界银行向中国大学提供一笔贷款，清华得到1/10，是龙头单位，贷款以实验室设备的形式发放，价值约1 350万元人民币，这可是清华实验室建设史上一次空前的投入。

可是，世界银行对中国十分担心：中国大学能否消化得了这笔巨款，能否通过验收？

清华十分重视这次验收。实验室科为此加班加点准备了许多文件，可是这些设备的每一项说明书都需要翻译，千万字的翻译工作由谁来完成？

实验室科的奚和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翻译工作全部由实验室教师和实验员来承担。如果教师能完成30万字，实验员能完成15万字，并通过验收要求，即可作为晋升副高职称和中级职称所需外语考试通过的凭证。这个方案被校方接受。一时，实验室科学习外语、钻研外语的气氛空前高涨。当负责验收的美国人再次来到清华，看到所有的外文资料全部译出，验收文件放得整整齐齐时，伸出大拇指说“No. 1”。

清华的这个方案很快被其他高校效仿，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大学的高深不在于一两个专业的突出，而要像钢琴一样，各个音键都能发出和谐悦耳的声音。在这方面，清华确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

清华香肠

清华人讲究吃，由来已久，清华的香肠好吃也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了。

据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国学院成立，杨步伟随夫君赵元任入住清华园。杨本身是医生，大家闺秀，内外兼修，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做得一手好菜。她联合几个太太合资在清华园开了一家“小桥食社”饭店，由于饭菜可口得到众人称赞，尤其是其自制的香肠，独特的配方脍炙人口，吃过的人无不流连忘返。杨步伟为人豪爽，小桥食社里常常传出她爽朗的笑声。“稀客，稀客，今天我请客！”一时，食客盈门。

没过几个月，在杨医生的“豪爽”下，小桥食社因经营亏损关门了，但真材实料、风味独特的香肠却传了下来，成为清华园美食的代名词，从此流传。

至20世纪30年代，梅贻琦任校长后，发表著名的“重师轻楼”之语，礼贤下士，广揽名师，清华之学术，逐渐在国内外有了佳评。随着学校地位上升，校中同人中有人开始表现出对他人的不屑。其时，清华因庚子账款的缘由，本就财大；学术水平上升后，难免气粗。

梅贻琦做人素来低调，见此情形，便告诫同仁要谦虚谨慎。所举例子，便是清华香肠。梅说，清华香肠好吃，清华人都知道；须知大街上也有卖香肠的，我们不必到处去宣传，外人在尝过清华香肠后便知清华真正的味道。

父亲1947年进入清华时就听说了这个典故，觉得妙不可言。

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先后办了三所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历尽艰辛，筚路蓝缕，在边陲之地昆明，成为一所闻名中外的大学。其他两所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半途而废，何也？盖因人难和。

西南联大之三校，有公立与私立之分，经费来源不一，又常常不能及时到位。这中间，清华财源充足、人员整齐，三位常委又只有梅贻琦长驻昆明主持校务。梅若计较起来，这摊子有一百个散伙的理由。人称寡言君子的梅贻琦，并没借机大卖“清华香肠”，而是放低身段，少说多做，一切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校一碗水端平，把个联大办得像一家人，无问西东、不分你我。

无独有偶，蒋南翔1952年底回到母校当校长，彼时院系调整已近尾声，清华除几个工科系外，数理化生文史，几个叫得响的学科院系，都已分出去了。蒋南翔痛惜晚来了一步。

但他没有抱怨，更没有放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建立前沿专业和系培养国家急需的工程师和未来的科技领军人物。到1958年，无线电系、自动控制系、工程化学系、工程物理系和工程力学数学系先后建立起来，填补了国家在国防前沿领域人才稀缺的空白。同时他结合自己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经验，在学校建立辅导员制度，走又红又专、理工结合的道路。

1960年前后，院系调整后的大学毕业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经过五六年学习的清华毕业生表现如何？蒋南翔极为关心。

经调查得知：清华学生上手快、动手能力强，听话、出活儿，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说明学苏这几年，加强实习比重，安排学生下工厂、工地实际操作和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收到了积极效果。同时也有人反映，个别清华学生骄傲、自满，难管理。这种情况引起了蒋南翔的高度重视，他开始在不同场合强调，清华人要注意和周围同事搞好团结，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不可贩卖“清华香肠！”

他告诫同学：“到了新单位，不要急着亮清华牌子，要放下身段，虚心向老同志、工人师傅学习。真要是有本事，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时知道了你是清华毕业生，你就给母校争了光，那时候清华因你而骄傲。你就是‘清华香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华毕业生，绝大多数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成绩，让全国人民逐渐认识到“清华香肠”的妙处，也有的人因缘际会转行，进入新的领域。曾任司法部部长的自动化控制系1965届毕业生张福森曾笑对我说，当年若不是汪家镠极力动员他服从工作需要转行，留在七机部搞技术的话，以他的水平，一直干下来，应该也是个院士了。

说到底，清华是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摇篮。

清华在“一二·九”和“文革”后出了一批领导人，因此外界有人把清华说成是抗大、是党校，是培养领导人的地方。何东昌说这种认识是误解也是对清华的歪曲。

父亲到旧金山湾区参加清华校友聚会时，逐个询问在场校友的经历和成就，问他们作为“清华香肠”在美国有多吃香？台湾新竹校友初闻此言大感兴趣，追问缘由。父亲就此介绍梅贻琦和蒋南翔二位校长注重内修、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一贯作风，并借题发挥说时代不同了，清华香肠不仅要内香，而且也要外香，要让世界都知道“清华香肠”的妙处。

金国藩当了系主任后，请教父亲如何做好工作。父亲给了他一句话：做清华系主任，要敢为人先！金说，张先生的这句话极大地鼓舞了他，要勇于创新，不拘于现状，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来工作能顺利开展，实现科研走在前列，全靠这句话。金还说，这句话直到今天都是系里的准则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过增元去联邦德国做访问学者，这是“文革”后中国派往联邦德国的第一批访问学者。彼时西方和中国互相不

了解，联邦德国教授没把这个中国来的“讲师”放在眼里，未安排研究内容，指着书架上的一排书让他随意读读。

这堆书里不仅有学术著作，还有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

过增元认真拜读该论文，发现其中一个错误，为慎重起见，他反复推演，查阅相关文献，最后确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教授确实是错了。

怎么办？说还是不说？过增元想起了临出国前父亲对他的嘱咐：

“到了德国，最重要的是自信。德国人非常讲究实事求是，你认为是对的，一定要坚持，要敢于和德国人争论！”

过增元带着结论走进了教授办公室。经过几十分钟辩论后，教授坦承，这确实是个从未被发现的错误。第二天，教授郑重地宣布一项决定：延长过增元的访问期限，同时，作为感谢，个人赠送他一份礼物。过增元怎么也没想到，教授送他的礼物竟然是回中国探亲的往返机票！

大礼堂草坪前日晷上刻的“行胜于言”，被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奉为圭臬，塑造出特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新时期的清华人，是与时俱进、营养丰富的上品香肠么，请读者诸君证之。

熏陶

清华前副校长解沛基，结婚成家的时候是一大家子家累，除了父母外，还有婶婶、弟弟和外甥女，解沛基夫人左世斌坦然地接受了。解的外甥女是姐姐的孩子，其姐夫是国民党空军军官，抗战时牺牲了，留下遗腹子，为了方便姐姐再成家，解沛基接过烈士的孩子抚养。解的弟弟曾过继给叔叔，叔叔不在了，弟弟生活不能自理，婶婶和弟弟都来到了解沛基身旁。其实在这六人中最让解沛基操心的是弟弟，17岁开始其弟双腿感到不舒服，渐渐行走不便，解沛基一到休息日就用自行车推着他到处求医问药，几乎把北京城跑遍了。最终其弟还是没能治好，腿肌萎缩，瘫在床上。

经济紧张一直困扰着这个大家庭。左世斌是医生，能治人却不善治物，一到月尾家中常常就揭不开锅了。弟弟虽然残疾，但头脑精明，他觉得自己能胜任管家一职。解沛基很开明，尊重他的提议，让他先试一个月，结果到月尾时全家有饭吃。就这样，夫妇俩的工资全交给他，由他统一开支。左阿姨说，我自己要用两块钱还得和他要，虽说有时感到委屈，但全家的肚子远比面子重要，也就想开了。

解沛基两个儿子在这样的家庭成长，非常重亲情。二人在美国留学成家后事业有成，经济宽裕了，希望父母来美国长住。可是解沛基夫妇放不下弟弟，担心保姆不能很好地照顾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俩从来没有同时去过美国，总是留一个在家照顾弟弟。这样的照顾从其弟17岁那年开始，延续了整整70年，直到给弟弟送了终。

大儿解明明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决心回国开公司，方便照顾家。现在解明明的公司开得风生水起，实在是家里的风水好。

小儿解强也不遑多让，说服妻子儿女，放弃世界第二大药厂的高薪，孤身回北京在六环外找了家公司，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为的是每周末回清华看望父母，并为90高龄、余年不多的父亲亲手洗个澡！

有这样的好兄弟、好嫂子，就有这样的好儿子，一代一代，代代相传！

赵访熊的儿子赵南元（小名嘟嘟）在父亲去世后，在母亲房间摆了张行军床，搬来和母亲王繁同住，谢绝清华大学返聘教授的邀请，决心退休后主要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阅读那些以前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母子俩过起简单而充实的生活。

熟悉赵南元的人谁也想不到他竟是这般孝顺。幼时的赵南元在清华园里是个多么淘气的孩子啊，下河摸鱼，上树掏鸟，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为此赵访熊夫妇没少嘱咐他注意安全。有一次，赵南元爬上树梢，看得旁人胆战心惊，赶紧跑去报告赵访熊："赵先生、赵先生，你们家嘟嘟爬到树梢上去了！"赵访熊并不惊讶，小声嘱咐来人："你们别大声叫，他一会儿自己会下来。"

这就是赵访熊，了解自己的儿子，信任自己的儿子，相信他能掌握好分寸。

在王繁生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我每次回国都要前去看望她，免不了问起她的饮食起居，赵南元都如数家珍，向我详细介绍这几天她吃的什么、吃了多少、晚上起了几次夜等等，细心到无以复加。王繁则坐在一旁安详地看着儿子，笑眯眯的，眼中全是知足。我对赵南元说，你妈有你这么个儿子，一定长寿。

再平凡不过的一个夜晚，王繁要起夜，赵南元扶她起床，回来后老人说背上痒，让赵南元给她挠挠，挠完之后王繁说"真舒服，谢谢"，就睡去了，这一睡就再也没醒来，享年96岁。

赵南元很欣慰，母亲走时说的最后五个字是："真舒服，谢谢！"母亲安详地离去，没有遗憾。

章名涛也有这样孝顺的儿子，老二章扬恕退休后搬来和母亲姜涓长同住，老太太每天按时吃药、按摩、晒太阳、看电视、读报都是他安排，饮食起居很有规律，喝的水、洗脸洗脚的水，都是他试过温度才端给母亲；万一遇到自己有事需要出门，打电话让媳妇来接班，家里万万是不可断人的。姜涓长最后活到97岁，无疾而终。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清华园里还有很多很多。

1962年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7年后，迎娶了和女儿梁再冰同龄的林洙，遭到儿女的强烈反对；清华园和学术界同仁一片质疑声，很多人认为林洙是冲着梁思成的钱和地位去的。

关于钱，林洙觉得不可思议，结婚时梁思成只有1 000元存款。对于这个说法，梁再冰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我爸爸哪有钱？他的钱都买古籍和珍品了。可当时有几个人听得进去？

林徽因的母亲一直跟随她在梁家生活，是梁家基本成员。梁思成再婚时，梁再冰担心外婆会受到林洙的慢待，提出要把外婆接走，可外婆不走，外婆说，我哪也不去，林洙对我挺好。

是呀，“文化大革命”中，梁思成被当成资产阶级教授典型代表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工资停发了，全家5口人靠林洙每月五十余元生活，这时的外婆还维持每天半斤肉的生活水平，一直到老。

梁思成病重，林洙既要照顾病人又要照顾外婆，还有两个半大的孩子；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妇道人家，承受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可想而知。若说她当初嫁给梁思成是冲着他的地位去的，那这时的梁太太连个普通的主妇都不如。

1972年初，梁思成病逝，林洙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外婆，怕她承受不了。外婆久不见梁思成，问起，思成去哪儿了？林洙强压内心的悲痛说他出差了，在外面带学生搞研究，一时回不来。外婆似乎明白，从此不再问。梁思成去世后，外婆仍活了几年，林洙一如既往照

顾她，为她养老送终，没有辜负老人家“我哪也不去，林洙对我挺好”的判断。

一个人能有始有终，就是难得的好人。

清华建校100周年时，很多老子弟回来庆祝。熊庆来的公子熊秉群看见林洙主动上前打招呼，向她表示敬意，林洙并不知他是何人，客气地应对着。后来熊公子告诉我，有一次名人展览中，林洙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作品事迹整理得清清楚楚交给主办方，其中关于她自己的情况一个字都没有，连一张小照都没出现，这种分寸和低调让人肃然起敬。

粉碎“四人帮”后，林洙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理梁思成、林徽因的手稿上；资料不全的，她去查阅、考证，有时为一份资料她甚至到古迹实地去考察取证，十分不易。相继出了几本书，署名皆是梁思成。没有林洙的默默奉献，梁思成后来的这几本专著不会这么容易出版。独居几十年，林洙将自己和梁家的情感写成了一本《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深受读者喜爱。

行胜于言。

几十年的行动证明，林洙和梁思成的婚姻不是为了钱和地位，她是梁思成生命后期的寄托和依靠，实实在在。

清华园里人才辈出。

这里不仅传播高端的科学技术，也传承中华文化。

遗憾

时光飞逝，屈指一算，我为《水木清华》杂志写专栏文章，已有三年。

因为文章涉及的大多是清华的人和事，不断被问道，你们家三代清华人，大部分不是在清华教书就是在清华上学，真正的清华世家，怎么独独你没上清华呢？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其实我本有机会上清华，但终因阴错阳差，生生地被自己错过了，如今想来，没能上清华成为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干脆竹筒倒豆子，把陈年往事原原本本从实招来。

第一次，已经站在清华门槛边，却轻飘飘地错过。

1977年2月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从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站对调回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到八室高宗仁麾下报到。对调对象是一位在计算所工作的安徽籍复转军人，但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都是通过双方组织部门联系的。

在安徽光机所工作期间，我经常到北京物理所出差，先是为受控站收集资料，筹建图书资料室；后来为受控站争取到一台DJS-130小型计算机，就被派在物理所计算机房实习，为接收该机做准备，也因此与在物理所工作的许多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相识。

上班后很快发现，原来相熟的年轻人一个也不见了！多方打听才得知，严济慈、华罗庚等老科学家于打倒“四人帮”后提出，为解决“文革”造成的科研力量青黄不接的问题，要办一所业余科技大学，把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下属单位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学习科技知识，

毕业后充实到科研第一线。为此，各所已经把年轻人集中起来复习高中数理化各科，将于4月初进行统一考试，然后开班上课，他们将亲登讲台传道解惑。

物理所按此原则，腾出几间屋子做教室，所里年轻人集中在那里脱产复习准备考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闻此消息，真如五雷轰顶，我赶紧申请加入，又到处找人借书，等一切齐备，离考试只剩三周了。心想，死马当活马医，抓紧每一分钟，尽人事听天命吧。那几周真是这些年少有的紧张，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进了考场，头都是晕晕的。

第一门考数学。头一道题不会，第二题也不会，再看第三题，还是不会！这下傻了，脑子嗡的一下，心脏狂跳，咚咚声自己都能听见。持续了几分钟，我冷静下来，再一想，反正也是做不出来，先捡会的做，能拿几分拿几分吧。最后一题分数多，就从它做起，倒着一题一题解答。说也怪，注意力专注在解题上了，心情放松下来，脑子也好使了，刚开始觉得不会的题，也都答出来了！全做完，时间居然还有富余，反复检查，觉得没问题，还是等到收卷子才交上去。走廊里乱哄哄的，都在对答案，居然没几个和我一样，闹得我极为沮丧。

理化考试情况也差不多，好像比想象的容易。看着别人信心满满的样子，总觉得时间太短，准备得不够充分，不然应该还可以好一点。

忘记过了多久，两三个星期吧，所人事处干部张小惠把我叫去办公室，说让我准备在开学典礼上发言！我？为什么选我？据说是我考了个第一名，而且分数比第二名多不少，上级决定由我代表新生发言。那年头一切实事求是，咱自己没想到，也没人提个醒；我虽然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若干年，在这方面并没什么长进，不知道事前请示事后报告，自己琢磨着写了个发言，在开学典礼上，居然直接就上去照本宣科念了一遍。现在想想，中国科学院业余科技大学，“文革”后开办的第一所经过正式考试，按分数高低录取学生的大学的开学典

礼，我有幸代表新生发了个言，哪怕讲得再不靠谱，今天若是能把发言稿贴出来大家瞧瞧，也是个历史文物，是个念想啊。

参观钱学森图书馆，看到钱老珍惜身边之物，即使当年他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时的行李签都不丢，作为历史见证展出，用实证告诉后人，自己是如何一步一印，惜时惜物，最终成为历史巨人的。

相比之下，我走过历史，见证历史，却不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其来有自，自不待言。

这是第一次也是这辈子活到现在，靠自己本事唯一一次，在大庭广众前发言。再后来就是在父母的纪念会上了。没出息至此，也难怪家中晚辈要瞧我不起了。

科学院业余科大正式开学，24个班，每班50名学生，老科学家纷纷上台亮相，当时可谓一时之盛。中关村的各个角落书声琅琅，学习气氛浓厚。

半年过去，国家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来临：恢复高考！

对当时还在插队的下乡知青，这是重大利好，对于已经坐在业余科大课堂、年龄偏大的我，几乎没感觉。班里年纪小的同学纷纷报名参加高考，我没报名，回家跟父母简单报告了一下，他们也没给意见。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面前，我居然懵懂地似三岁孩童毫无知觉。

1977年高考发榜，我的发小陈小悦、华苏等上了清华；业余科大有1/3的人考上清华、北大，24个班剩下了13个。老科学家们积极性大受打击，不来上课了，我有些微后悔、沮丧。但想想已经进了科学院工作，免了将来毕业分配分到外地之苦，也就释然了。

我就这么轻飘飘地与清华擦肩而过。

之所以对这件历史大事如此麻木，也源于陈春先早年的一句话。受控站刚成立时，为了鼓励大家的士气，他曾经激情澎湃地说：“打

乒乓球，我们有国家乒乓球队；搞物理，也需要国家队，我们就是物理国家队！”

陈春先说的没错。物理所的老一辈如严济慈、施汝为、钱三强等，中年的如管惟炎、章综、郝柏林、于渌、陈春先、杨国桢、赵忠贤等，当然是物理国家队队员，就是当时尚年轻的受控站几大主力，霍裕平、万元熙等，后来也纷纷当上院士，也进入物理国家队。而我呢，充其量也只是管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出成绩而已，连个替补队员都算不上，竟然也感觉良好，有这么个改换门庭的机会，却不知好好把握；殊不知没上正规高校，得不到严格训练，今后不可能有大用。

第二次，幼稚的自尊心害了自己。

1978年又逢高考，我动了报考之心。小悦说了一句：“欢迎你来当学弟！”

我的眼睛瞪得老大：凭什么？我们是发小，幼儿园同班，小学同学，中学同列前三名进了清华附中，不分伯仲，难不成到大学却成了他的学弟！那种无来由的自尊心生生地使我放弃了报考。

这次发榜的结果是，13个班大半考到清华、北大，只剩下几个大所的大龄学生还坚持着，点点人头，不够5个班。科学院也意兴阑珊，不想再费劲了，把这5个班转到电视大学了事。我这个当年的状元也就成了一名没有学位的电大毕业生。

第三次，婉拒林同炎的建议。

彼时出国留学已渐成风潮，但仍是公派的多自费的少。我那时也动了这个念头，觉得在国内错过了念一个好大学，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到国外去读个研究生把它补上，堤内损失堤外补嘛。刚开始的时候父母对我出国一事并不积极，直到有一天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来访。母亲问起他们的孩子情况时，吴健雄说儿子现在美国读博士。待袁氏夫妇走后，母亲用少有的后悔口气对我说：

“是我害了你，如果我们当年没回国，恐怕你也在读博士啦。儿子，你想走就走吧。”

出国的事就这么定了。刚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Tech)航空系教授吴振远来访，非要认母亲为老师，热心地帮我联系了该校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一番信件来往，对方同意收我去读硕士。剩下的事就是照章办事，准备出国。说是照章，其实经办人有很大的余地决定让不让你过关。每填一张表就是过一次关，其中的甜酸苦辣，远非话难听、脸难看那么简单。等拿到护照，腿都遛细了。

到美国第一站是旧金山，父亲的老友林同炎教授女儿林伯那接我，直接开到林办公室。见面握过手，话没说几句，林伯伯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我，说是没能帮我担保，这是一点支持之意，不多，1 000美元，以后就得靠你自己啦。我感动得差点没哭出来。听说我要去佐治亚理工学院，林伯伯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南方的学校对将来发展不利，要我留在旧金山，等他帮我安排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我那时很单纯，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一根筋，听完他的建议后连考虑都没考虑，就说：“吴振远已替我安排了一切，亚特兰大那边连接我的人都已与我联络了好几回，不去恐怕不好交代。”见我如此，老先生也不再坚持。

后来我才知道，伯克利不仅学术水平高，它和清华还是友好学校，两校学术交流频繁，我又一次远离清华。

两年后毕业，林伯伯把我招到他公司，一直干到公司解体，转而进入硅谷。这里佐治亚理工学院校友不少，但远比不上伯克利校友遍地都是。同时我惊讶地发现，清华校友也是遍地都是！我这个清华幼儿园、小学、中学校友如鱼得水，和他们相处甚欢，融为一体。此时的我，已然非常后悔为什么没上清华和伯克利。

回首往事，我渐渐悟出我的老家就在清华，这里的一草一木我熟悉，这里人更亲切：有些人看着我长大，有些人我看着他们成长，还

有些人陪着我一起长大，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是我的亲人；清华园里每一棵树、每一片草都有我的足迹，我的根就在清华。

退休后我做出了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回国，回到清华。

如今的我，将余生投入到清华历史文化的搜集整理和传播之中，实实在在进了清华，为清华的文化传承尽着微薄之力。

如有来生，一定要上清华！决不能再有缺憾！

附录一

在“思钱学森清华情缘，育新百年创新人才”会议上的发言

张克澄

2011年4月16日

谢谢庄茁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盛会并且发言，来班门弄斧一下。

当年钱学森班主讲教员钱伟长，杜庆华子女钱元凯、杜宪因故无法出席今天的盛会，要我转达他们的祝贺并且表示争取参加今后活动。

我本无资格在此发言，只是作为张维、陆士嘉之子，有幸在清华园里“被长大”，得沾仙气。机缘巧合，能接触到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教育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比如周培源、蒋南翔、“三钱”、梁思成、林徽因等等，得以领略他们的风采，愿在此与各位领导、来宾、航院和钱学森班的师生们分享。下面就我自己的体会讲几点粗浅的看法，错误之处，请指正。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清华先贤对清华和国家、世界的贡献，有目共睹，让今人缅怀、仰望。但是他们也是从青年学生开始成长，自己努力加上把握机会，才成就了一番事业的。我无缘见到他们的学生时代，虽然听到的故事不少，却也和各位差不多，都是如何如何努力

刻苦之类。我斗胆总结，这些已经被捧为大师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成长道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忘我工作、爱国奉献、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他们被捧上神坛以后，不是顾盼自如、藐视群雄，而是自惭形秽、手足无措。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教育家的真面目。古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希望同学们辩证地理解这句话，不为名利所累，让名利成为事业的伴生物，而不是做人、做事的目标。

我近来做清华校史研究，用电视剧的形式讲清华故事，用4部片子，力争再现百年清华历程，把清华人爱国、救国、兴国、治国的故事，讲给国人，希望能引起今人对清华历史和清华精神的关注。第一部《水木清华》，请朱镕基题写的片名，百年校庆后，要在校园里组织一次观片活动，欢迎大家参加、指正。

我们以为，清华与国内外大学的最大不同，是她诞生于国耻，是列强欺侮中国的产物。早期虽享受到庚子赔款提供的优越条件，但虎皮墙内完全西化的环境与墙外圆明园的断垣残壁、贫弱的农村、目不识丁的国民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园内这一切来自全中国的民脂民膏，使年轻的清华学子们一刻也不敢或忘为国雪耻，这激励着他们刻苦学习，强健体魄，争取早日放洋，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清华人的社会责任感伴随着国耻，成了清华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钱学森清华情缘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人无不为清华而自豪，但是也一贯注意对外要低调，要“偷着乐”。蒋南翔曾经告诫清华人，出去不要贩卖“清华香肠”。清华人都知道清华香肠是好东西，但是外面的人不一定承认。要人家也承认这是好东西，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进了钱学森班的年轻人，是天之骄子。我盼望你们，继承老一辈清华人“行胜于言”的好传统，少说多做，成为真正的“清华香肠”，不但好看，而且好吃，在下一个一百年的清华历史上，在清华先贤的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谢谢大家！

附录二

在张维塑像揭幕式上的答谢词

张克澄

2013年12月18日

各位领导、嘉宾、老师、同学：

首先谢谢大家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参加我父亲的塑像揭幕式。

我试着总结父亲的为人处世，用16个字来概括，就是：不卑不亢、实事求是、量力而为、知足常乐。

不卑不亢——顺境时，父亲待人平等，从不欺负人；逆境时，保持人格自尊，绝不接受被人欺诬。

实事求是——父亲做事做人，一是一二是二，绝不含糊。清华的人叫他张校长，他总要纠正：“副校长”；不熟的人还要加上“校长是蒋南翔”。学生的论文，如果是父亲选题，学生做的，他一定不署名。如果是父亲和学生共同选题，他参加指导，做了工作的，虽署名但坚持不在第一位。记者采访，父亲审稿时会划掉著名二字，去掉各种溢美之词。他最反感人为拔高，反对穿靴戴帽。

量力而为——父亲做事，要求自己尽心尽力，有十分力要出十分力，看不起偷懒耍滑的所谓“聪明人”。父亲认为对国家、对清华、对学科有利的事，一定想方设法，托人找关系，拼命也要促成。由于父亲从不为私事开口，所以大家也愿意帮忙，事情往往能够推动起来。

知足常乐——按世俗眼光，父亲头衔一大堆，算是功成名就了。他却淡然处之，认为是时势造英雄。尤其经过“文革”的大起大落，父亲更深刻认识到个人再有本事，离开清华这个平台，也将一事无成。父亲自从1947年进清华当教授，就没离开过清华。所以父亲最常带在身边的一种名片，只印清华大学教授，其他头衔一个没有。

交通大学是父亲挚爱的母校。他16岁进交大，20岁毕业。在这里父亲度过了他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在这里他从青年长成人。在交大所受的教育，则影响了父亲的一生。常跟我们回忆他的交大岁月，讲交大的先贤，讲他的老师、同学。仅我耳熟能详的就有詹天佑、黄寿恒、茅以升、罗忠忱、林同炎、林同骅、严恺、刘恢先、李文、黄万里、陈能宽等等。父亲对交大的培育之恩，终身未忘，常思回报并力行之。

今天，这么多领导、嘉宾、老师、同学来到美丽的西南交大校园参加父亲塑像揭幕式，又讲了这么多溢美之词，父亲若泉下有知，一定是深深一揖，说：谢谢大家，张维愧不敢当！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张维家属，向为保证此仪式圆满成功劳心劳力的西南交大校领导、西南交大校友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会的各位嘉宾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附录三

在陆士嘉实验室命名式上的讲话

张克澄
2017年3月18日

各位领导、嘉宾、老师、同学：

今天，这么多领导、嘉宾、老师、同学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到北航校园参加陆士嘉实验室命名仪式，讲了这么多溢美之词，母亲若泉下有知，一定会连连摆手，说："谢谢大家，陆士嘉实不敢当！"

在儿子的眼中，母亲是个低调的人。

作为普朗特的学生，母亲在学术界的辈分很高，也因此从她进清华园，园子里就流传着"陆士嘉的学术水平比张维高"一说。此说法据云源自钱伟长。钱先生是大力学家，曾师从冯·卡门，应该言之有据吧；小时候，张光斗先生每次看到我，总要摸着我的头叫我"陆克澄"，然后说："你应该姓你妈妈的姓！"在我的记忆中，力学大师周培源周老是父母的老师辈，但周老一直尊称母亲为"陆先生"，称呼父亲却是直呼其名。为此我问过父亲，为什么有区别？父亲说母亲在德国学术界的影响远超过他，一则母亲是普朗特的学生，普朗特以收学生严苛而著称；二则母亲既是洪堡学者又是德国一等博士，而父亲自己只拿到三等博士学位。

母亲并不因此盛气凌人，不管对谁永远都是客客气气、谦恭有礼。

母亲只讲奉献不问收获，名利于她如浮云。在座的很多人知道，母亲曾两获学部委员提名，却推辞了这荣誉。严济慈严老知道了很不高兴，批评母亲：“别人想要我推荐我都没做，你却推掉了！”

钱学森先生多次来家里力邀她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母亲觉得位置太高自己不能承受，加之北航领导挽留，最终未去。

她曾和父亲同被评为一级教授，却坚持按二级教授的待遇领取工资。

母亲始终保持低调，低调得几乎没有身影。

母亲对北航有深厚感情，对风洞有深厚感情。她的在天之灵看见众多学生和亲友来为自己亲手建立的实验室命名揭幕，应该是欣慰的吧！

母亲对资助自己留学的舅舅施今墨有深厚感情，对一同为祖国航空航天事业奋斗的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林士谔、宁晃有深厚感情，她的在天之灵如果看见他们的后人代表他们的父辈，来参加今天的盛会，应该是欣慰的吧！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陆士嘉的家属，向为保证此仪式圆满成功劳心劳力的北航校领导，向前来参会的基金委、中国科协、清华和北师大及其他单位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会的各位嘉宾和北航师生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